

给我的全家  
为了终生的爱、忠诚与力量  
给我的女儿们和外孙们  
为了他们给我带来的欢乐

## 无声世界的骄傲

## 第一章 “美国小姐，就在这里！”

1994年9月17日

由于陪着海丝参加了一场接一场“美国小姐”的竞选，我的心情一直处在既紧张又兴奋的状态，现在临到她进入决赛，我却感到平静松弛下来，不知为什么这种轻松从容反倒又让人有些不安了。此时此刻，在亚特兰大，正在进行着竞选1995年美国小姐的最后一轮决赛。我的女儿——一个从咿呀学语就生活在无声世界中的残疾姑娘——她的命运到底如何？是攀上难以置信的梦想的顶峰，还是突然坠入失败的谷底，今晚就将一见分晓。整个晚上，我内心深处充溢着上帝所给予的一片宁静，而宁静中又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

甚至就在“美国小姐”电视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宣布了五名决赛选手的名单之后，我还保持着这一片平静。即使在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海丝·怀特斯顿，亚拉巴马小姐”时，我依然没有感到更多的紧张。最后，五名决赛选手走上舞台，在中央排成丰姿绰约的一排，就要开始进入随机问答比赛之前，在那例行的一连串让人感到无休无止的广告插播中，作为母亲，我的心情才开始一阵比一阵更强烈地焦炙起来。

海丝，我的重度失聪的孩子，你排在什么位置上？哦，上帝，全凭您的旨意了，让她离主持人近些吧，千万别让她排在紧靠边儿的位置上，只有这样她才能更容易听懂每一个问题……噢，太好了！她是站在第二位，太棒了！

现在，五个如花似玉、光彩照人的决赛选手婷婷玉立在各自的位置上。预示着决赛即将开始。优美的管弦乐曲骤然响起，巨大的表演大厅一下变得鸦雀无声。我的心突然狂跳不止，我想，也许这咚咚的心跳声，恐怕就连坐在楼厅里的人也能听得到。

当乐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在大厅的上空飘逝后，整个晚上我保持着的那种镇定自若的心境已经荡然无存了。海丝优雅的晚礼服表演，是根本不必令人担忧的。她着泳装表演的神态举止也同样令人叫绝。在特长竞赛时，海丝随着桑迪·帕蒂的“哀伤之路”委婉的乐曲跳了一段叫人神魂萦绕的、反映耶稣受难的古典芭蕾舞，那柔美传神的舞姿，彻底征服了所有观众的心。

现场问答是选手们向观众和裁判展示自我才能的最后一次机会，每一个小姐都要即兴回答主持人的现场提问，并由裁判评定打分。对海丝来说，这最后的几分钟将是整个表演中最困难、最关键、最难以预料时刻。海丝当选美国小姐的梦想能否成真，就在此一举了。

聚集在我身边的三十几位家人、亲戚和朋友大概也都像我一样感到说不出的紧张。我父亲可能是感受最深的人。因为在我下意识地、不顾一切地死死抓住他的左胳膊时，我母亲则紧紧地抓着他的右胳膊，我们把提心吊胆的紧张劲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他。我们共同体验过海丝竞选“亚拉巴马小姐”时的心情，我知道此时我的妹妹斯蒂芳妮准保又在急切地祈求上帝的保佑，我似乎听到了她的祷告在大厅中的回音：“啊，上帝，请保佑海丝能‘听见’、能理解主持人的问题吧！请赐给她清晰的发音和趣味横生的答词吧！”

台上的主持先生在说：“好！请大家注意，我们的五名决赛小姐都已作好了准备。现在，我要针对她们不同的讲演内容，问每人一个她们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满分是十分。我们将根据每个选手的总分作出最后裁决。不过，各位小姐，在正式开始前，我想与你们谈谈，随便聊聊，先互相熟悉一下。”

他首先问的是佐治亚州小姐：“请问您对今年决定采用赤脚泳装表演有何感想？”佐治亚小姐笑盈盈地说：“反正我修过三次鸡眼，赤脚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方便。”一阵笑声平息后，主持人转向了海丝：“大家知道，亚拉巴马州小姐海丝·怀特斯通的听力受损，一只耳朵已完全失聪，另一只仅有百分之五的听力。因此，我很想知道，您的舞姿如此优雅动人，可是您能听到音乐的旋律吗？”

海丝含着楚楚动人的笑意，诚挚地说：“我用助听器只能听到一点点儿声音，事实上我是用心在感觉音乐和倾听音乐……我默数着音乐的拍节，并记在心里。我就是这么做的！”

当赞许的掌声雷鸣般响彻大厅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海丝听懂了第一个问题，回答得既自信又清楚。感谢上帝，让她的开头这么顺利。

第一轮的热身问答很快结束了。主持先生接着转过来又对佐治亚州小姐的关于“如何解决家长虐待儿童行径”的演讲，提了几个问题。

跟着就又轮到了海丝，主持先生说：“海丝，您演讲的题目是‘有志者事竟成’。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像您一样，冲破重重障碍，发挥所有的潜力，尽善尽美地展示自我呢？”

海丝略带疑惑：“您是问……我们怎样冲破障碍吗？”

喔——噢，上帝，她没有听懂！但我又马上安慰自己：我们一直谆谆告诫她：重复所提的问题，这样可以避免误解。但愿她能记得！

主持先生已经在重复了：“您怎么理解‘有志者事竟成’呢？”

这时，海丝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答道：“乐观的生活态度使我度过艰难的时光，人生的自尊自信帮助我克服重重困难。我认为要取得成功，应该采取五个步骤，这样就创立了我的‘星光’项目。”

主持先生又问：“什么是您的‘星光’项目？”

海丝对答如流：“星星有五个角，所以我想它可以帮助人们记住通向成功的五个重要步骤……。”

“您认为您的生活智慧，也必然会有助于其他人吗？”

海丝点点头：“哦，我想是的！我每天都这么做，它对我很有帮助！”

当热烈的掌声再次平息下来后，一股宽慰的热浪漫过了我的全身。海丝已经越过了她的最大障碍。多少个寒来暑往、日日夜夜的艰辛努力和冗长乏味的学语矫治，终于为海丝铺垫了一条通向梦想的道路。其他参赛小姐还在继续各自的即兴问答演说，接着电视台播放今晚最后一轮广告节目，我们除了等待、祈祷、等待，似乎再无事可做。

一时间，件件往事如潮水般地涌上心头……

二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仅仅十八个月大的海丝得了重病，躺在亚拉巴马州多森一家医院的儿童病房里，医生在检查病情，确定治疗方案。从这个可怕的时刻起，我就不得不面对无穷无尽的有关海丝的问题，并作出一个个具体的回答。海丝的耳聋是由于当初的病情造成的？还是因为服用的药物反应引起的？即使医生对此也是各持己见，没有定论。家长该如何抚养教育重度耳聋的孩子？我已经咨询过许多五花八门甚至彼此迥然不同的观点。专家劝我们不要指望海丝的学业能超过三年級以上的水平，这是最使人肝胆俱裂的断言。然而，这样的断言是否可信？为什么一名失聪的孩子不能学习舞蹈？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只注意孩子的缺陷？而看到孩子自身潜力的人却简直寥寥无几？海丝是否有希望回归主流社会？在有声世界中取得成功，

享有幸福？我一直自信海丝能行，至少她必须去努力奋争。但我有时也总免不了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亚拉巴马州小姐选美机构会同意评选一名有生理缺陷的人当“小姐”吗？我们曾为此呕心沥血、劳心苦争地整整努力了三年。一个失聪的女孩能够梦想成真，赢得“美国小姐”的桂冠吗？答案就将在今晚揭晓！

在插播电视广告的时间里、在主持小姐和主持先生与上届美国小姐的穿插交谈中，所有这些无尽的记忆、万般的感慨源源不断地掠过我的脑海。

分数终于统计完毕，评委们作出了最后的评判。

这时，我可怜的爸爸，他的胳膊在我和母亲拼命的紧抓下，双手已经僵直，我猜想得请一个带有救生钳和爆破装置的抢救班来，才能把他从我们手下解救出来。这时台上的五名参赛小姐在作最后的相互介绍，爸爸和我们一起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无暇顾及、甚至根本就没有感到他的手有什么异样。

信封打开了，主持先生高声宣读：“第四亚军，印地安纳州小姐蒂法尼·斯托姆。”观众的欢呼声四起，我的血压又升高一点儿。“第三亚军，佐治亚州小姐安德列亚·克瑞。”还有三名选手在舞台中央手拉着手。“第二亚军，新泽西州小姐珍妮佛·亚历克西斯·麦卡斯。”

当欢呼声渐渐静下来时，主持先生继续道：“现在还有两位小姐，是亚拉巴马州小姐和佛吉尼亚州小姐。”

主持小姐大声接着说：“她们之中的一位漂亮小姐将得到两万美元奖学金，继续学业，另一位将获得三万五千美元奖学金，并赢得‘美国小姐’的称号和桂冠。此外，‘美国小姐’所在的大学将从美国小姐选美组织和沃特福德·奎斯托得到两万五千美元的奖学基金。好，现在就请里吉斯先生来宣布这一结果，请。”

“好，”主持先生里吉斯高声宣布：“现在，诸位女士们、先生们，两万美元奖学金的获得者（第一亚军）是……佛吉尼亚州小姐卡伦·约翰逊。新的1995年‘美国小姐’的获得者，是亚拉巴马州小姐，海丝·怀特斯通！”

亚特兰大会议中心的一万三千多名观众爆发出一阵撼天动地的欢呼。从海丝面部困惑的表情，我看出她没有听懂，直到卡伦·约翰逊指着她，作出“是你！”的口型，并紧紧地拥抱她表示祝贺时，海丝才意识到她自己胜利了。

随后又发生了些什么，那一切在我眼前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我只记得海丝在流泪，我在流泪，我的母亲和妹妹也在流泪，海丝的两个姐姐斯苔希和梅丽莎在欢声高叫、雀跃不已。斯苔希半岁的女儿特萨在她妈妈的臂弯里颠上颠下，她的幼小生命也在经历着一场狂涛般喜悦的震颤。海丝所有的长辈和兄弟姐妹们都在欣喜若狂地放声欢呼、拼命鼓掌，我父亲沉浸在欢庆海丝获胜和双臂突然解放的惊喜中，高高地举起僵硬的胳膊，连连狂呼：“好啊！好啊！好啊！”

我猜想两位主持人肯定已经在唱：“美国小姐，就在这里……”因为海丝正往下走到了甬道上，并且在向观众挥手致意。但是我和家人及朋友们只能听到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其中有自己的，也有周围每个人的。

当海丝优雅地转身返回舞台时，我看到她边走边在人群中寻找家人。我奇怪她为什么不能立即发现我们这一小堆不顾一切地欢叫、不停跳跃的人。我们三十几个人群情振奋，拼命挥手，频频打着海丝熟悉的“我们爱你”的手势。当她终于发现我们时，也举手向我们示意“我爱你们”，于是大家的

喊声拌着激情更加高昂起来。

当其他决赛小姐在台上围着海丝，向她表示祝贺时，一名美国小姐护卫人员来到我们的座位旁，领着我、我父母和其他两个女儿朝后台走去，带我们去出席海丝荣获桂冠后的第一次官方新闻发布会。

我们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向后台挤去。我父亲多年来一直不厌其烦地提醒我，应该把我们与海丝经历过的种种喜怒哀乐，桩桩件件都记录下来。此刻，他转身向我咧嘴笑着，用一种“听我的准没错儿”的腔调说：“现在，你必须开始著书了。”

## 第二章 美满生活

我们原来希望海丝能在情人节那天降生。但十天过去了，到了1973年2月24日，我们仍在等候着她的到来。那天下午风和日丽，我懒洋洋地依在草地的椅子上，沐浴在亚拉巴马南部温暖柔和的阳光下。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阳光，使我减轻了从早上开始，渐渐增强的阵痛和不适感。

清晨，当宫缩开始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是的，时间到了！”于是，我就给在商店上班的比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的阵痛开始了。这已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因此我对所有的征兆一清二楚。虽说还要过一段时间才需要上医院，比尔仍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家。现在，他和两个女儿正一块儿“洗车”，与其说三岁半的斯苔希和刚刚两岁三个月的梅丽莎在“洗车”，不如说大部分时间她们都在和爸爸嬉戏。当爸爸故意把水管中的细流溅到她们身上，逗引她们时，她们就尖声又笑又叫地沿着车道跑上跑下。这一切，更增添了浓浓的春意，使我深深地沉浸在欢快愉悦的天伦之乐中。

家人的欢声笑语带给我难以言传的幸福和满足，而且，今天家里就又要增加一个新成员了。我感叹不已，生活实在太美好了。

我把一只手轻轻放到肚子上，抚摸着安卧在里面的婴儿模模糊糊的轮廓，像所有的母亲一样默默作着纯朴的祈祷：亲爱的上帝，请保佑今天一切平安，保佑这孩子尽善尽美。当这个小生命降临人间时，请您与我们同在，为我们指点迷津。

大约晚上七点钟，我对比尔说：“我们最好叫人帮忙照看一下女儿们，我想现在该去医院了。”晚上九点三十一分海丝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看到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宝贝儿的个头真大！

斯苔希出生时体重是六磅，梅丽莎只有五磅十盎司重，小得几乎用一只手就可以托住。相比之下，七磅四盎司的小海丝就显得个头很大了。

又得了个女儿，我并不觉得意外。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怀的是个女孩儿，当我作了孕妇检查后，就更确信无疑了。那位为我作检查的医生，一边用听诊器听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这女孩的心跳很好，很有力。”

“这么说，您认为是个女孩儿？”我问。

医生为自己的唐突，显得有些扭捏不安，他耸耸肩：“别这么说，但根据心跳，我猜测您可能会生一个小女孩儿。”

我已经告诉过比尔自己的猜想，所以，我对医生的话欣然认同，但比尔却仍然坚持希望是个男孩儿。

因此，我一看到海丝的第二想法（在“这宝贝儿个头真大！”之后）就是：“希望比尔不要过于失望。”这决不是说，我也从来没想到，他会不喜欢我们的女儿，会不喜欢第三个小女儿。但我十分了解比尔，他是家中的长子，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让父母心满意足。当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儿时，我公公曾非常明确地向比尔表示过他大失所望的心情。

老人家要有个孙儿来继承家族的姓氏，这在比尔的老爹赫伯的眼中至关重要。但比尔和我已经决定只要三个孩子了。

我非常明白，我的小女儿永远也成不了赫伯特·威廉·怀特斯通三世，三个女儿在这方面都无能为力。

正是因为家人们这种明显的失望情绪，我准备把孩子的出生作为一种挑战，要竭尽全力帮助海丝和她的姐姐们向世人证明，女孩儿一点儿都不比男

孩儿差。

在比尔陪他父亲去苏格兰旅游之前的几个月，我和他就已经给女儿起好了名字，叫“海丝·利”（“Heather”译意为石南花）。他们从苏格兰回来时，带回成摞的照片和明信片，从中可以看到漫山遍野到处盛开着紫色芬芳的小小的石南花。这些花外表看去是如此纤弱娇嫩，似乎很难在苏格兰高原的严酷环境下生存。再看其它照片，我又被苏格兰孩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儿所吸引，所有的孩子看上去都那么幸福快乐、健康强壮。从此，在我的心目中，海丝这个名字就与苏格兰繁茂的石南花和孩子联系在了一起，它标志着美丽和健康，是我们即将诞生的可爱的小女儿最理想的名字。

我们家终于迎来了最后一名小成员——海丝，阖家圆满了。

当我们从医院把海丝带回家时，两个女儿异常激动。我猜想大女儿斯苔希会和小妹妹亲如手足，但拿不准二女儿梅丽莎会作出什么反应。这孩子刚两岁多一点儿，我早些时候曾对她说：“妈妈很快又要有一个小娃娃了。”那时她恐怕根本就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我告诉她：“梅丽莎，你要当姐姐了，你该怎么做？”

她一副浑浑沌沌的样子。

“你喜欢有个小妹妹呢，还是有个小弟弟？”

“不。”她在这一点上观点鲜明，对自己喜欢什么心中有数。

“我喜欢小马！”她说。

“哦呵！妈妈没法子办到这事儿。”我向她解释：“如果妈妈不能给你一匹小马，那么你喜欢有个小弟弟呢，还是小妹妹？”

“小妹妹。”她终于让步了，这样我至少可以满足梅丽莎的第二个选择。

其实，我一点儿都不需要担心两位小姐姐的态度，她俩立即就喜欢上了她们的小妹妹。在她们看来，海丝是家中人见人爱，谁都想玩的活的布娃娃。只要我一坐下来喂海丝，或轻轻地摇她时，斯苔希和梅丽莎就会坐在我身旁，也跟着喂或轻轻地摇她们自己的布娃娃。能够抱抱海丝，或帮我为海丝作点儿什么事，是她们最大的快乐。

当然，一下子要养育三个年岁相当的女儿，不是件轻松容易的事。就拿采购来说吧，带着她们一块儿逛商店，就常常使我手忙脚乱，难以招架。为了帮助我，比尔的祖母织了一条红色带白饰边儿的挽带。它像一条小缰绳，后面还带着一个小金属环，用来控制我们这个娃娃队。它使我既能够掌握控制权，又允许斯苔希有一定的活动自由。然后，我把梅丽莎背在背篓里，把海丝放在婴儿筐中挎在我的胳膊上。

当我们四人结伴在城里闲逛时，人们投给我们的除了好奇的目光外，更多的是微笑。但并不是人人都如此，有一件事在我心中至今记忆犹新。一天，在一家百货店里，有个陌生女人走到我面前，批评我居然用挽带牵着斯苔希，“就像对待一条小狗一样”。

我真恨不得地上裂条缝儿，让我立刻钻进去。可是当这位爱管闲事的女士，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斥责我时，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对不起，这位女士，”我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极礼貌地打断了她，“我只是想让三岁的女儿安全地待在我身边，防备她突然跑进停车场，被汽车撞上。”

那位女士气急败坏地回击我，继续唾沫横飞地唠叨了一两分钟。最后，我只得转身走开。在这种氛围下，我极力尽自己所能，以最庄重的神态举止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次采购。然而无论如何，三个宝贝女儿带给我的欢

乐远远胜于烦恼。生活就像一出出纷乱嘈杂而又让人兴奋激动的剧目，使我感到满足而又充实。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希望家庭平和，事业顺利，然后在生活中深深地扎下根去。

这就是我在认识比尔之前所梦想的幸福。我和比尔是在塔斯卡卢萨上大学一年级时，在亚拉巴马大学校园中相识相爱的。二年级结束后我们结为夫妇，于是我便退学参加工作，挣钱补贴家用，支持比尔继续完成学业。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另一个梦想，即取得教学学位。比尔曾许诺，一旦他能够挣钱养家时，我就可以马上返校读书。

可等到比尔1969年春毕业时，我正怀着斯苔希，已有五个月的身孕了。比尔便要求推迟一年到后备军官训练队服役，并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我们回到比尔的家乡多森住了一年，比尔在他父母开的一间怀特斯通家族的家具店——“乡村之家”里工作。斯苔希就在这年的5月1日出生在多森。

第二年的夏天，当比尔开始在部队服役时，我怀上了梅丽莎。部队分配我们去佐治亚州的本宁堡驻防，开车两小时就可抵达多森。这一年的十二月，我们的佐治亚小美人儿金发碧眼的梅丽莎降生了。

比尔似乎很适应部队生活，我们曾探讨过在军队谋职的可能性。对此，比尔从他的长官那里已得到过许多肯定的答复。军旅生活确实不乏诱人之处：免费医疗服务、住房补贴、高薪、每年三十天休假等等。

幸运的是，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降级，比尔从来没有被指派到国外去作战，他实际只在本宁堡处理管理方面的事务。然而，当军队开始同意年轻军官们“提前退役”时，他决定放弃军旅生涯，回家和他的亲属们搭伙经营家具零售的生意。

我们再次回到亚拉巴马的多森，这一回的情形很不错。

上大学期间我曾到过多森，比尔带我去见他的家人。那时，我用新奇的眼光打量着多森，它那四处洋溢着“温馨家庭”的情调，确实打动了我的心。小城中运动场和教堂星罗棋布，比比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无处不在的棒球场。当我们第一次开车进城去比尔家时，一路上经过了足有半打的球场，而且每个球场都有人在打棒球。

我一直难以忘怀那个春光融融的下午，我第一次到多森，只见到处盛开着姹紫嫣红的杜鹃花和山茱萸，夕阳掩映在西天，余晖透过松柏郁郁葱葱的华盖穿射而来，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柱。我听到内心深处一个细小的声音，或许是灵魂的渺渺回音在说：这里是我们的成家立业的福地。

多森远远地盘栖在亚拉巴马州的东南角，是个中等大小的美丽城镇，既不会有许多大城市存在的通病，也不会像小城镇那样叫人感到孤陋寡闻。

附近的区域是亚拉巴马著名的花生加工业和畜牧业发达的地区，多森因此而物阜民康，经济实力格外雄厚。离多森几英里外就是瑞克要塞，所以城里总是驻扎着一些装备精良的军队。我想这或许是使多森成为这一地区的医疗中心以及“维格拉斯地区的商业中心”的部分原因，多森确实是亚拉巴马州南部地区名副其实的枢纽。比起绝大多数四万多人口规模的相同城市，多森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完美的服务。

虽然我是在比多森大得多的城市伯明翰长大的，但我依然爱上了这个第二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这里的地理位置首屈一指，离西北部的蒙特格默市只有一小时半的路程，当我们想参加“大”城市的文化活动、想买大量的用品，或是想滑雪时，便可随时开车到那里一游。而且离我自己的家乡

伯明翰，也只有三小时多一点儿的行程。最值得炫耀的是，只要向南开两小时车，就可以到达佛罗里达州巴那马城那洁白美丽的海滩。

事实上，所有途经佛罗里达窄长地带的卡车司机和旅游者，人人皆知多森又叫“环路城”。因为在多森的城郊绕城筑有一大圈环形公路，用来分流来往于佛罗里达的川流不息的车辆，以减轻公路繁重的运输负荷，“环路城”的绰号便由此而生。

比尔离开军队后，我们反复权衡了种种利弊，回到了多森，全家皆大欢喜。接着又贷款买了自己的第一座房子。这是一座有三个卧室的牧场主式的新房子，因为它位于环路以外，所以那时被认为是座落在多森的荒野里。其实，从这里开车只要四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城里比尔父母的家，以及比尔工作的家具店“乡村之家”。

第一座自己的房子使我们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有一种安家落户的坚实感，我们为此而欢欣鼓舞。回到多森后，我在瑞克要塞附近的特洛伊州立大学的附设校园中恢复了学业，这更让我激动不已。

然而，比尔并不完全理解我求学的迫切心情，当然也不鼓励我返校读书，但他还是履行了以前我退学支持他读书时他所作的承诺。那年夏天，我们一回到多森，我就开始上课学习。我每周要上两个、有时是四个晚上的课，这时比尔就在下午匆匆赶回家，照顾女儿们吃晚饭，陪伴她们晚上活动，安顿她们上床睡觉。海丝出生后，我停了三个月的课，随后又重新开始了学习。每当我上课时，比尔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照顾三个女儿的全部家务。

我们的生活紧张而忙碌，但很快乐。我有一个好丈夫，我们有三个美丽健康的女儿，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三个女儿的年龄相当，自有她们的优越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可以时时观察到她们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多数情况下，她们更像是朋友，而不是姐妹。常常是一个要干什么，另两个也依葫芦画瓢地要干什么。

记得海丝出生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也是我们搬入新房以来的第二个年节，女儿们一直为房子没有烟囱而忐忑不安，担心圣诞老人会因此没法给我们送礼物。于是我买了一个立体的小硬纸板壁炉，又折又弯又剪又拼插地一阵忙乱，把它组装到一起，还在涂染着橘红色“火焰”上方的壁炉架上，安了一些小蜡烛和一点儿圣诞小饰物。

圣诞树和壁炉消除了女儿们的担心，给她们带来浓郁的节

日气氛，即便如此，我继续怀着极大的热情，大张旗鼓地张罗着装饰整个房子。

因为我觉得每类物品都需要买三份，所以每次采买都超量。比如，虽然海丝只有十个月大，无法用斯苔希的小自行车，也无法用梅丽莎的小三轮车，但我还是根据有轮子这一共性，为海丝买了一个可以乘坐的玩具学步车，既可以推着到处走，又可以乘坐。

海丝是第一次过圣诞节，自认为她是圣诞节的主角，当然，所有的人也有同感。

事实上，海丝头十八个月发育之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无论是学爬、学走，还是学说话都比两个姐姐早。现在用更加客观的态度回顾，我想这并不见得表明她的天赋就一定比别人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两个年龄相近的姐姐，处处为她树立了榜样，这种早期刺激使她不得不努力赶上姐姐们的步伐，否则就会被孤立在这个群体之外了。

没用多少时间，梅丽莎就感到她的小妹妹像当初她想要的小马一样招人喜爱，而大姐斯苔希却似乎总想像“妈妈”一样去呵护海丝。梅丽莎和海丝从一开始就成为亲密的朋友，心心相印。三个孩子中，斯苔希是当然的领袖，总是扮演着劝诱、说服的角色。梅丽莎则是个活跃好动、敢作敢为、一刻也不安分的顽皮女孩儿。不论梅丽莎干什么，不论她去哪里，海丝总是亦步亦趋地跟着。

我的眼睛简直一刻都不能离开这三个小家伙，即使在自家的后院也依然如此，一不留神儿，其中的两个可能就会钻进屋后的树林里，进行什么伟大的探险。也是由于她们那种无时无刻、无处不至地到处探寻的好奇心和那股踏遍四荒八极寻求新景致、新刺激的劲头儿，我便尊称她们为“刘易斯和克拉克”。海丝出生的第二个夏天，每逢去海滩，我们都格外小心，因为梅丽莎从来不知天高地厚，每当她高声尖叫着，冲入滚滚的波涛时，海丝准会蹒跚着紧随其后也扑进去。

幸运的是，海丝大部分时间都在热切地模仿她心目中的“偶像”大姐姐，这种聪明的作法，使人省却了许多烦恼与焦虑。从海丝身上，我一时无从断定，她是受梅丽莎的执拗劲儿感染呢，还是承袭了大姐姐颇似懂事的举止。但至少作为一个一岁半的幼儿，海丝可以尽情地两位姐姐撒撒娇、嘤嘤嘴。每当我摆出母亲的严厉时，海丝永远是和梅丽莎保持一致的。譬如我说：“我数到‘三’时，你们必须赶快动作（拣起玩具，或其它诸如此类的事），否则……”这时，斯苔希——我最听话的好孩子，每每在数到“一”、最迟不会超过“二”时就会遵命而行，而梅丽莎和海丝则在数到“二”之前是绝对不会动窝儿的，常常是在我数出“三”的一半，另一半就要出口时，她俩才开始动作。

海丝模仿姐姐时，有一股子百折不挠的倔劲儿。每天晚上，我给斯苔希和梅丽莎卷头发时，海丝也缠着我给她卷。即使在她的头发还裹不住粉红色的塑料卷发卡时起，就要求天天如此。

海丝在1974年9月初斯苔希过五岁生日那天和姐姐们游戏的情景，至今仍活灵活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按照斯苔希选择的生日主题，我安排了一个游戏，所有邻居家的小客人们应邀而来共同游戏，庆贺这个快乐日子。我与几位母亲在一旁悠然自得地看着这群欢天喜地的孩子们，这时海丝从人群中走过来，抱住我，把头放在我腿上，扬着脸冲我甜甜地一笑，在确认了母亲的关注之后，又急急地加入到游戏当中。同得到许多新玩具和生日礼物的斯苔希一样，海丝和梅丽莎也享受着同样的幸福和欢乐。

晚上，安顿女儿们上床睡觉，看着她们疲倦而又心满意足的小脸蛋儿，再次感到我有三个如此聪明漂亮的小宝贝儿，实在是太幸运了。那天下午一股寒流正经过亚拉巴马州南部，天气冷飕飕的。离开女儿们的卧室前，我去关窗，一阵冷风迎面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刹那间，我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过后回想，这也许是上帝在警告我，而我却全然不觉。我只是关上窗子，熄了灯，离开了沉浸在晚会、礼物、快乐游戏梦境中的女儿们。

万万没有料到，我们这个普通人家的美满生活，顷刻之间就要经历一场暴风雨的袭击了。

### 第三章 海丝，我的宝贝儿你怎么了？

9月14日是星期六，海丝一早起来就有些发烧，我并没有过分担心，因为这孩子的身体结实，我又有带斯苔希和梅丽莎的经验，知道蹒跚学步的孩子发烧38.3℃时，会有些烦躁不适，但父母不必为此过分不安。这次的发烧，似乎只是多森托儿所中，孩子们常见的那种无关痛痒的小毛病，一两天就会过去的。

比尔离家上班后，两个大女儿在看她们最喜欢的周六电视动画节目，我坐在椅子上抱着躁动不安的海丝，尽量使她舒适一些。海丝躺在我的怀中，病情似乎在渐渐加重。无精打采，什么东西也不吃，到上午九点半时已濒临半昏迷状态。接着，海丝的病情就急转直下，体温升到了39.5℃，我万分焦急，打电话向儿科医生咨询，医生吩咐必须立即带她去看病。

我马上给邻居多莉丝打电话，请她的女儿吉娜帮忙照看一下斯苔希和梅丽莎，又匆匆打电话告诉比尔家中发生的一切，然后心急火燎地赶进了城。等我带着海丝坐在儿童诊所的候诊室时，海丝已浑身无力，昏昏沉沉地躺在我的怀里了。

医生很快给海丝作了检查，仔细听我叙述了病情迅速恶化的过程。医生严肃的表情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孩子病情严重。他似乎对海丝颈部发僵的现象格外担心，担心着什么我尚未察觉的危险。

“她最近刚打过预防针，”我向医生报告，“会不会是接种疫苗的反应？”

“有可能，”医生回答，“但我们必须首先找找其它原因，您现在就带海丝到隔壁佛劳斯医院的急诊室去，我这就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马上过去，请他们准备一张检查台。等检查完，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给比尔打电话告诉他目前的结果，他说他很快就来医院帮助我。我抱着海丝，大步流星地跨过停车处，穿过医院急诊室一道又一道的门。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把我引到一间空无一人的诊室里，帮我把一动不动的海丝放在检查台上，一会儿医生也走了进来。

“夫人，”医生说：“我们治疗时，请您帮助扶一下您的小女儿，千万别让她乱动。”护士向我示范怎样握住海丝的胳膊和腿，使她能稳稳当地躺在检查台上。其实我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海丝好像麻木了。医生准备好注射器，用手指仔细地顺着海丝的脊椎骨往下摸寻找着注射点，然后将吓人的巨大针管深深地插入她的脊柱中，此时，海丝几乎没有一点疼痛畏缩的反应，我的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整个过程顷刻之间就完成了，我和护士松手放开了海丝的四肢，可海丝仍一声不吭，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医生把抽出的脊髓拿给我们看，“可能稍微有一点儿混浊，”他观察说，“但总体看她的脊髓液还是清澈的。”

“这会有什么问题吗？”我问。

医生对我笑着点头：“我们马上就会化验脊髓液样。但根据外观判断，您可以放心了，您女儿没有得脑膜炎。”

脑膜炎？医生从前提过吗？就算提过，这场厄运总算没落到我们头上。上帝啊，感谢您！可海丝到底怎么了？我们对此如坠烟雾，一无所知。

这时比尔来了，我们一起带着海丝返回儿童诊所。医生报告了脊髓液化的最后结果，“现在我们至少可以把脑膜炎排除了”，他说。接着又对海丝的虚弱无力表示担心，指出如果海丝继续呕吐，就有可能发生脱水。他建议

说：“为了谨慎起见，应该让海丝尽快住院，这样就能对她的病情变化，随时进行观察监护，可以使她更好地康复。”

我们急急忙忙赶回家，与比尔的父母商量，请老人来暂时将另两个女儿接走。又沿着城边的环路开车到东南中心医院——那里的儿科医生享有绝对权威。

那天下午一点刚过，我们领海丝作入院检查，她已经烧到近40℃了。护士立刻配好退烧药，开始静脉注射。由于海丝烧得全身无力，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所以根本不必采取什么保护输液针管的措施。海丝整个下午几乎都在昏睡，我搬了一把椅子紧靠床边坐下，握着她的手，不时理理她的头发，用冷毛巾擦擦她的前额。当她偶然睁开眼睛时，我便微笑着对她轻轻细语。可海丝对这一切置若罔闻，毫无反应；她目光呆滞，好像服用了麻醉药。我反复试着让她拿起奶瓶，她根本无力去拿。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晚上，医院进行周六的例行查房，儿科医生再次对海丝进行了检查。

“她正静静地休息，药物会使她保持稳定，”医生告诉我们，“我怀疑她感染了什么病毒，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在二十四小时内会出一些疹子，然后高烧将退去，病情就会有好转。”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告诉父母海丝生病住院的消息。母亲立即要来帮助照看其他孩子。我劝她暂时不要来，因为医生认为烧很快会退下去。最近几个周末斯苔希和梅丽莎可以同比尔的父母呆在一起。

晚上，比尔的父亲赫伯来医院看我们，询问海丝的情况。睡觉前，比尔急急忙忙到医院餐厅为我买回晚饭，但我一点儿胃口都没有。

整个晚上，护士每隔一定时间就来检查一次海丝的状况，我和比尔呆在医院病房里极不舒适的椅子上，彻夜难眠。星期日早上查房时，海丝的体温仍然较高，医生仔细察看了她的颈部和身体中部，告诉我们：“还没发现疹子，大概很快就会出来了。”我只得用医生的话来安慰自己。

中午，尽管一直在用着退烧药，但海丝的体温再次升到了39℃，护士担心她会因久卧不动而生褥疮，便帮助我连带着输液针管将海丝抱在怀中。整个一下午，我都在想方设法让她感到舒服点儿，并不时地察看是否有出疹子的迹象。结果一无所获！我怀中往日可爱的小女儿，此时毫无生气就像是个布娃娃。那天，唯一令人宽慰的征兆（如果能这么认为的话）就是，海丝能够发出一些隐约可闻的呻吟了，这是她生病以来第一次以这些微弱呻吟对自己的病痛作出的唯一反应。

我打电话向老师请假，解释明早不能上课的原因。这时医生来进行晚间查房，我和比尔问为什么除了退烧药，不用其他的药。他告诉我们，他仍怀疑是病毒引起的疹子，而且现在疹子“随时都可能发出来”，在未作出最后确诊之前，他不能贸然给海丝用其它任何药，“否则，这些药会把一些症状掩盖住，干扰治疗。”

星期一清晨，比尔离开医院，赶回去送斯苔希和梅丽莎上幼儿园。他刚走，另一名儿科大夫来查房，我焦急地询问高烧为什么一直持续不断，医生只简短地回答：“有些病毒感染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可事到如今还是不见疹子的踪影，连医生也沉吟难断，无法解答。

海丝入院时已经验过血，可医生又要求再作一次全面的检测，“星期四检测结果就会全部送来了”他告诉我说。

星期四！天哪，可今天才星期一，我暗自寻思，还得等多久？

作为母亲，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头了，不能坐以待毙。几分钟后，一名医务人员进来取海丝的血样，“一位生病的小姑娘是在这儿吧”。他温和的语气中透着关切和从容，可我焦虑的心情却有增无减。

午后不久，海丝的体温上升到了40.3，我开始考虑：如果这里无法诊断海丝得了什么病，对采取什么治疗措施还是举棋不定，也许应该把海丝转到伯明翰的儿童医院去。

那天下午，海丝唯一的变化就是，每当我们一抱她，或是变换她在床上的姿势时，她就会痛得蜷缩躲避。我明显感到，她的病不仅一点儿没好，反而愈加严重了。一阵惊慌掠过了我的全身。

那天晚上在病房里，我对比尔和他的父亲赫伯讲了自己的重重忧虑，希望尽快带海丝到离此三小时路程远的伯明翰，转到那里全国闻名的儿童医院去治疗。

赫伯回答：“这儿的医生很不错，和伯明翰的医生一样好。”比尔则重复着医生早些时候所做的解释，什么在作出正确诊断前，不能随使用药，否则会掩盖症状等等。

于是我打消了转院的念头。但当我孤立无援地看着小女儿软弱无力地躺在病床上那可怜的样子时，心中真犹如刀绞一般。

夜色已深，我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几乎是边说边流着眼泪，告诉了她们海丝的最新状况。“这次你不要阻拦我，”母亲坚决地说，“明早我就出发去你那里，其实我昨天就该在你身边了！”

星期二一早醒来，我发现海丝的左手和左手腕有点儿肿胀，我把护士请来指给她们看，她们觉得没有什么异常，认为是由于我拼命想发现海丝身上出疹子而产生的错觉。医生来后，也没看出任何肿胀，像护士们一样，立刻就把我的担忧置之脑后了。

但是这三天以来，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握着、抚摸着女儿的小手，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肿胀，这绝对不是臆想。

刚过中午，母亲就到了。她走进病房，一看到躺在床上的海丝，刹那间脸上露出震惊惶恐的表情。但立刻她又试图把这悲痛掩饰起来，显然，她不愿让我的痛苦再雪上加霜，可她很快就再也克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后来，母亲承认，当她第一眼看到海丝时，犹如万箭攒心，“我简直不能相信那就是我们的海丝，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顺着面颊止不住地往下流，真觉得肝肠寸断，几乎要被悲痛压倒了。”二十多年后，每当提起此事，母亲仍然声音哽咽，泪水盈眶。

母亲的反应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使我不再怀疑自己的担忧是否正确，心书感到有了依托。三天来我一直惶惶不安，觉得自己的焦虑不但不能引起别人的共鸣，反而轻而易举地就被医护人员，甚至被比尔否定掉了。母亲的担忧惊恐倒带给我一丝安慰，至少我知道，现在我不再孤立无援，有人能够理解我的想法了。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长时间地站在一起、相依相靠，用泪水来抚慰彼此的痛苦。眼看着海丝身陷绝境，我们却只能束手无策地呆在旁边，相互宽慰哀伤。

星期二，又是一个忧虑、难眠的夜晚过去了。星期三一早，我觉得海丝的左手肿得更厉害了。到八点钟查房时，医生敷衍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告诉我什么问题也没有。

九点钟时，海丝的手就像吹气球似地涨了起来，足有平时的两倍大，皮肤又红又亮。我随即叫护士，护士马上与儿科办公室联系。

中午时分，两名医生来到了病房。他们迅速对海丝作了检查，然后带她去作“进一步的血液检验”。当他们几分钟后回到病房时，我问医生是否发现了为什么发烧和肿胀的原因。其中年岁稍长的一位医生立即回答：“要翻十二本医学书，列出我胳膊这么长的表，才‘有可能’解释清楚海丝的病情。”

一时间，医生这种出人意料的“我就是告诉你，你也未必懂”的傲慢态度，弄得我张口结舌。但当他走出去，到大厅与他的同事作进一步商讨时，我的火气“腾”地一下冒起来了。于是等他回来后，我问道，我们是否能请教一下他的同事中的高级医生，请他的同事来为海丝看病。

他突然满脸变色，气冲冲地说：“显然，您根本不相信我的话！”说完，鞋跟一拧转身大步走出了病房。与他一块儿会诊的医生留下来，竭力息事宁人，解释说他们的主任医生现在出去了，星期五才能回来等等。

我到商店找到比尔，把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他后，心中的忧虑却一点也未减轻。那天下午，海丝的体温猛升到40.5，她的右手和左脚也开始发肿，我心里更加惊恐慌乱起来。

我不知道那天医生是否回来又为海丝检查过。即使来过，我也没遇见他们。后来我看了护士的记录，从中并未发现任何常规记录，能够说明儿科医生那天晚上为海丝作过检查。

星期三的晚上，情况就更糟了，根据医生的嘱咐，在那天下午撤去了海丝的静脉注射。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或许是因为海丝胳膊肿了的缘故。

由于海丝不再通过静脉注射得到滋补营养，护士便给我一个注射器，让我试着往海丝嘴里喷射营养液，一次几滴，我每次都千方百计地尽量使海丝能吞咽下去几毫克。这时海丝的关节肿得很厉害，只要一碰她，或帮她在床上翻翻身，她就会疼得不住地呻吟、啜泣。

望着床上衰弱的女儿，我为自己的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伤透了心。但这已不再是最让我悲伤落泪的事了，现在，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我们，我担心将会失去海丝。我甚至连抱一抱她都办不到，因为那会给她带来更多的疼痛。

我能作的全部事情，就是来来回回地在屋子中徘徊，无穷无尽的忧虑、哭泣、祈祷：上帝保佑，噢，上帝请不要让她死！我知道上帝就在我的心中，我相信他会听到我的声音。那一晚，在医院的那间病房内，我像海丝一样，感觉异常痛苦，不知所措，而又无法解脱。我一生中从来还没有如此恐惧、绝望、孤独过。

星期四早上，医生查房时，肿胀已经蔓延到了海丝的胳膊上，甚至右脚也开始发肿，身体不能触摸，即使盖一层薄薄的床单，都会使海丝因极度疼痛而啼哭不止。当医生看到病情加剧，却连任何新的医嘱也没留下就离开了时，我简直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了。

有好一会儿，我怒气冲冲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越走越快，越走越快。上午九点。我对这种毫无反应的态度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比尔徒劳地想劝我平静下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冲比尔喊着，“我不能再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海丝死去！”

带着这股怒气，我冲出房间，气呼呼地穿过大厅，闯入护士工作站，“请您现在就拿起电话来。”我冲着桌子后面那个大吃一惊的女人高声嚷着，“马上给医生打电话，告诉他们，除非他们在几小时之内，能够给我们一些答复，

或是对海丝采取什么治疗措施，否则我要给海丝转院，带她到伯明翰儿童医院去，那儿的医生会给我女儿看病的！”

“但、但、但、是，没有医生的允许您的孩子不能出院。”那个可怜的女人惊惶失措地答道。

“咱们走着瞧！”我边说边一扭身，目不斜视愤怒地回到了海丝的房间，我敢肯定那女人一定在给医生打电话。

护士刚给医生打完电话，比尔接着也给他们打了电话。“达芙妮说话是算数的，”他说，“她说得到，做得到！”

上午十点，护士接到了新命令，要求我们在家长意见书上签字，同意院方给海丝注射两种抗菌素。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必须采用发脾气的方式，才能让医生对海丝的病情作出反应。但不管怎样，事情总算有了变化。

记得那时我心中认为：既然要求我们签字，就表明给海丝用的药肯定对孩子有伤害。我不记得有什么人曾告诉我，准备给海丝注射的是氨基苄青霉素和庆大霉素，也不记得有什么人曾解释过，这药用后可能会产生相当的副作用。也许这些都列在了要家长签字的意见书中，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我想，当时只要有人指出其中潜在的危险，我想我们是会改变决定的。然而当时我深信，那天上午海丝正处在死亡的边缘，必须采取某些救治措施，而且一刻也不能耽误。

医务人员很快来给海丝打了两针，其中一针的针头就像兽医给马打针用的那么粗大。看着海丝打完针，自从进医院起的五天来我一直绷紧的心总算有了片刻的松弛，摆脱了悲观失望。中午时分，海丝的体温又上升到了 40℃，这次我不再为此而担惊受怕，我知道抗生素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会大展神威，遏制住高烧了。

谢天谢地，没到二十四小时，好转的迹象就出现了。下午下班时分，我发现海丝的肿胀有些消退。晚饭时，海丝甚至吞咽了几小口米糊、苹果酱和香蕉泥，这是她近一周来吃的第一顿“饭”。

晚上医生来查房，也为这初示的好转迹象而欣喜。他说验血结果说明在海丝的血液中有嗜血性流感杆菌，发烧就是这种杆菌引起的。至于手脚发肿，可能是斯蒂尔氏病造成的，或是蜂窝组织炎。（他当时没有解释这两种情况。）

现在好啦，总算有了一些答案。我不禁对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情形惊讶不已，为什么近一周以来什么病况诊断说明也得不到，今天却突然时来运转，得到了如此多的病情诊断结果？为什么现在才得到这些信息，是因为我当众大吵一场，采取强硬行动的结果吗？无论怎样，至少海丝正在康复！感谢上帝！

那天晚上，海丝第二次注射了抗生素。

星期五一早，她的热度已退到了一周以来的最低点 37.2℃，虽然白天又有些回升，可我确信危险已经完全过去了。她的手脚还有些发肿，但肿胀正在缓慢地消退。同时，她的食量也有所增加，睡觉也更安稳了。这一天，医生又给她注射了两次抗生素。

我的心情渐渐地松弛了下来。星期六，医生不再给海丝打庆大霉素，说是只用氨基苄青霉素就完全可以控制嗜血性流感杆菌了。事后我们才知道，庆大霉素比氨基苄青霉素的副作用要大，这恐怕也是及早停打它的原因。

接下来是星期六、星期日，海丝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尽管病情明显改善，医生还是不同意海丝出院，他们说体温必须连续二十四小时保持稳定才

行，海丝现在虽然不再发高烧，但一天之内体温的波动仍然较大。

现在，海丝已彻底脱离了危险，我却有一周没去上课了，如果再请假缺课的话，整个一学期的教学课程便会付诸东流。我和比尔重新商量作了安排，我母亲决定让我父亲和我的妹妹、小弟弟（那年他俩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在伯明翰继续自己管理自己一段时间。这样，白天由母亲在医院陪床，我去上课。下课后，我每天下午去幼儿园接两个大女儿，和她们在一起呆一会儿，再由比尔把我送到医院去陪床。晚上，当海丝昏昏睡去后，我开始准备自己的教案，直到支持不住睡着为止。这段时间，由于我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已筋疲力尽，使我成了一名在椅子上睡觉的好手，尽管是由于我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已精疲力尽所至，但这套功夫仍让人惊诧羡慕不已。

随后的几天，海丝的病继续日日见好，可她的身体离康复还十分遥远。她对每日两次注射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一见穿白衣服的身影就吓得失声尖叫。她的腿上打针的部位，变得又青又紫，惨不忍睹。因此，大部分时间她只愿意静静地躺在床上，或是乖乖地呆在母亲、比尔或者我的怀里。

到了第二个周末，海丝的体温终于稳定下来了。星期五查房时医生说一切都很正常，星期六早上，他们告诉我们可以带海丝回家了。离开医院前，医生嘱咐，回到家要继续给海丝口服抗生素，一周后带她到医院复查，要注意的事项仅此而已。他们还说，几天之内海丝的腿仍会酸痛，使她的运动受限制，但两三周之后，海丝就会四处跑动，完全恢复正常了。

真是个好消息！

那天早晨，我抱着海丝走出东南中心医院时，感到一种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愉悦与宽慰。一生中最可怕的严峻考验终于过去了。

然而，这只是我一厢情愿而已。

## 第四章 1974 年的圣诞节

那一晚，把三个小女儿安顿上床睡觉后，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全家已经很久很久没像今晚这样团聚着在家睡觉了，这两周似乎有一生一世那么久远。

一整天，我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感谢上帝使海丝回到了家中。睡觉前我想再看海丝一眼，便踮着脚尖来到她的屋里，静静地在小床前站了几分钟，默默祈求上帝保佑我的女儿尽快康复。

在医院的第二个星期里，海丝的状况虽然相对改善，但看上去仍叫人感到疑虑重重。回到家后的头几个小时，虽然到处弥漫着合家相聚的欢乐气氛，但现实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海丝离康复还差得很远很远。自从海丝从死神的魔爪中挣脱出来后，她与从前那个好动、爱冒险的小姑娘简直判若两人。这一点，从她和小姐姐们的交流中一眼就能看出。

小妹妹又回家了！欣喜雀跃的斯苔希和梅丽莎几乎整个下午和傍晚都与海丝在一起，把她喜欢的玩具塞给她，不停地和她说话，不断地想逗她游戏。而海丝呢，对两位小姐姐的格外关注，除偶尔报以感激的微笑外，唯一的反应就是伸出手去，有气无力地摸摸自己喜欢的动物布玩偶。

显然，她没有真正的生命活力，神态中没有一点儿灵气和精神，眼睛暗淡无光，大部分灵魂似乎已经从小小的身体里漂走了。我只有不断地祈祷，竭力让自己相信上帝会把从前那个活泼泼的海丝带回给我的。上帝，请让她快点儿回来吧！

海丝目前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们把她送到托儿所去，即使那里的阿姨能照看生病的孩子也不行。而两星期前，我母亲已回到伯明翰她自己的家中了。我便考虑，决定自己留在家中照看海丝。我想即使海丝能像医生预期的那样尽快康复，我也根本无法完成本学期的教学课程了。然而，由于我的近邻——好朋友多莉丝·贝尔文的帮助，我很幸运地取消了这个决定。她在海丝住院后的第二周就定时到医院替换我母亲，为海丝陪床。接着，在随后的几周里又每天自愿来照看海丝，她说：“我很高兴这样做。如果我家有事脱不开身，我可以把海丝带到我家。我希望帮别人做些事。”

上帝赐予了我多莉丝这样的朋友。我们接受了她的帮助。不幸地是，海丝已出院一周了，不论是多莉丝、比尔，还是我，谁也没有发现她的状况有什么改善。她不仅不试着走路，甚至不想自己坐起来。多莉丝说：“她在地板上的毯子上一躺就是几小时，看上去好像很愿意这么躺着似的。”

星期四晚上，我发现海丝的膝盖周围有点儿肿。第二天早上红肿仍在。因为儿科医生曾建议我们每周带海丝复查一次，所以，一早比尔就与医生约好，带海丝去检查。

回来后，比尔详细地描述了检查经过。他说：一位年轻医生为海丝做了诊断，认为肿胀是蜂窝质炎引起的，蜂窝质炎是一种慢性病症，与关节炎的症状相似，但它除了影响关节外，还会使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炎。

医生告诉比尔：“我以前曾遇到过三、四个这种病例，往往无法诊断病人的关节周围哪里会不舒服，以及会发作多长时间。因为它是迁延性的，这次是关节周围红肿，下次可能会影响到肘部。服用阿司匹林疗效不错。从我治疗过的病例看，到孩子十几岁时，这种病就会完全痊愈了。”

比尔忧心忡忡地告诉医生，海丝出院后，虚弱无力，不断地昏睡，从不

活动，也不说话。医生宽慰道：“海丝的感染与一般的感冒和病毒感染不同，所以不会很快痊愈。”还解释说，由于海丝的腿上注射的次数太多，她不愿多活动也就不足为怪了。医生认为，应该继续让海丝服用几周抗生素，到时身体自然就会恢复正常。

我像比尔一样，愿意相信一切诊断，而且两周多来时时都在这么努力着。我日日盼望着海丝好转，但每天得到的总是失望。转眼已经十月底了，我心中的焦虑与日俱增。虽然海丝腿上的青肿已消退多日了，可是往日那个四处跑动、到处探奇的活泼的小姑娘，仍然一步不走，甚至没人帮助就坐不起来。生病前的海丝总是不停地张着小嘴咿呀学语，常常能说出三、五个字的句子（例如，“我爱你，妈妈”，“我和梅丽莎玩”，“我想吃”，“来这儿，妈妈”，“我看见了梅丽莎”），可出院后，至今只字未说。

我始终与母亲保持着电话联系，转告海丝的近况。母亲再三建议，“达芙尼，亲爱的，你应该把海丝带到伯明翰来，让汉佛莱斯医生检查一下，我们只能依靠汉佛莱斯医生了。”

十月的最后一周，我终于同意了，“明天请与汉佛莱斯医生联系，”我告诉母亲，“请预约给海丝检查的时间。”

我家两代人始终对约瑟夫·汉佛莱斯医生深信不疑，他二十多年来作为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的家庭儿科医生，赢得了全家

的信赖。父母对他的信任，源于他曾挽救过我弟弟吉姆的命。吉姆比我小六岁，那时他才两岁半，由于种水痘而引起了严重的血液感染。母亲打电话给汉佛莱斯，描述了吉姆的症状。他立即赶到我家为弟弟治病，并且取消了当天所有的其它预约，守在弟弟的床边，直到确信吉姆安然脱险为止。

我们全家认为约瑟夫·汉佛莱斯不仅是位才华横溢和富有同情心的医生，而且还是我们的亲密朋友。他在同事中也倍受尊敬和仰慕。当我们决定请他为海丝看病时，他已经是亚拉巴马州儿科协会主席。在他为海丝检查之前，我就已经把全部信任与希望寄托于他了。

到伯明翰作检查的日子，预定在11月9日。因此，我们需要一份完整的海丝的病历复印件，供汉佛莱斯医生参考。当比尔打电话给医院儿科办公室联系复印时，这一例行需求遭到了拒绝。尽管比尔解释，这不过是带女儿去伯明翰，找以前的家庭医生进行一次简单咨询，但一位儿科医生却回绝他：“若要得到你女儿的病历，除非你提出诉讼，让法庭裁决。”

这当头一棒，弄得比尔和我目瞪口呆，气愤难忍。现在回想起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那些医生患得患失，生怕承担医疗责任，因此把向新的医生提交医疗记录、以便为海丝提供最佳治疗的应尽职责置于了脑后。

面对医生的无理态度，比尔便与律师联系，希望通过法律程序得到海丝的病历。律师认为，我们可以提出渎职诉讼，但这是一个又长又烦人的过程，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了结。我们请求律师立刻着手开始起诉。结果，第二年我们就得到了海丝的病历，紧接着我们也就撤诉了。在这期间，我们只能在没有正规病历的情况下，带海丝去伯明翰看病。

第一次与汉佛莱斯约见时，他告诉母亲和我，仅仅根据表面观察，他认为目前海丝的体内存在大面积感染。我把海丝生病以来，前前后后的一切症状细述了一遍，汉佛莱斯耐心地、专心致志地听着，随后他为海丝作了彻底检查。接着又问道，以前医生是否给海丝开过维生素之类的辅助药品，或是进行过生理治疗，以促进海丝康复。当他听到我的否定回答时，露出非常惊

讶的表情。

汉佛莱斯认为“目前有许多问题必须考虑和解决”，但最迫切、最直接的威胁是肌肉萎缩。他强调，刻不容缓的是要让海丝的四肢经常活动和用力，尽快恢复功能。具体作法看上去简单易行：在浴盆里盛上舒适的温水，把海丝放在里面，然后活动她的胳膊、腿、腰、肘、腕等，每天坚持几次。“现在她的肌肉几乎一点儿也不运动，”他说，“我们第一步是要让她重新使用自己的胳膊和腿。”此外他还开了一些维生素类的辅助药品，促进海丝羸弱的身体和免疫系统得以恢复，并建议一个月后带海丝去复查。

当时，汉佛莱斯特意私下同母亲谈了他的诊治计划，他认为海丝对环境的反应，以及所能作的区区可数的一会儿运动，即不平衡又不规则的动作，极有可能是脑损伤的表现。所以，待我们知道怎样解决海丝的运动问题后，他将会推荐一名神经科专家作有关的检查。这些我是数月之后才知道的，我将终生对此感激不尽。

然而，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是怀着振奋鼓舞的心情走出汉佛莱斯办公室的。那时，我满心欢喜，以为终于找到了让海丝重新站起来的办法。但一想到具体的操作，不免又有些焦心。我不想给多莉丝再添麻烦。这看去极为简单的治疗办法，真正作起来却非常费时烦人。而此时我正进入最后几周的教学课程，需要对一个六年级的班全面负责，白天要整日和学生们在一起，每晚要准备强化教学的教案。而海丝又需要我付出自己的全部时间，去精心看护她。对此我束手无策。

当我向母亲倾诉自己的困难与不安后，她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让海丝到伯明翰和我住在一起吧。”

“噢，不行，”我回答，“海丝已经遭受了这么多坎坷，我不想再与她分开。”

“那不过是你去学校时，暂时分开一下而已，你可以每礼拜五到这儿过周末。你自己不是说过，不知该找谁来照看海丝吗？她在我这里会像在家一样。我陪海丝看过病，知道怎样照医生的嘱咐做。你爸爸和妹妹也能帮助我。斯蒂芬妮会觉得很有趣。我们会做得比你在家时更周到。一旦有什么问题有困难，我们还可以就近找汉佛莱斯医生。”

母亲说的不无道理，尽管我心中仍有些不情愿与海丝分开，最后还是同意道：“好吧，那就先试一个礼拜看看。”

每晚我都要与母亲通电话，母亲告诉我治疗日渐有效。当星期五晚上，我开车带着斯苔希和梅丽莎到伯明翰会见海丝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一周来她发生的变化。海丝自己能坐起来了，每当把她抱成站立的姿势，她就跃跃欲试地想走路。

母亲提出再当一周海丝的“体疗师”，我欣然同意。这样我每晚可以放心地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教学计划，再坚持几周的教学课程，我便可以大学毕业得到学位了。那时，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照看海丝了。

到第二个周末，海丝已试着自己迈步，尽管步态缓慢、摇摇摆摆，却被大家视为是非凡的进步。

12月1日母亲和我带海丝去汉佛莱斯医生处检查，这时的海丝不但能坐会走，甚至急不可待地想跑。她的平衡机能仍然失常，一迈步就往右歪，往往走不了直线。汉佛莱斯说这可能是脑损伤的另一种症状。他对海丝的进步表示由衷的喜悦，并建议我们继续照此治疗下去，待下次复查时，根据情况

再增加或修改治疗方案。

于是，我带海丝回到家，在我完成学业前，仍由多莉丝来护理海丝。海丝行走和跑动的能力日复一日地增强，虽然不如第一个周末在伯明翰看到的那样令人惊叹不已、难以置信，但确实是稳步地在一天一天好转。让人惴惴不安的是海丝一直闭口无言。我只得安慰自己，女儿大病一场，身体尚未痊愈，各种技能或许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恢复。我相信，海丝一旦开口说话，她的语言能力一定会像学步一样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飞快提高的。

这时，海丝又能常常与姐姐们一起玩耍了。然而，我发现海丝屡屡显得神思恍惚，似乎置身于周围的事物之外，一心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她的执拗的老毛病看上去要比从前明显多了，有时当我叫她时，她根本就不予理会。几个月来，与海丝共同度过了种种磨难，当她不能尽如人意地迅速做出反应时，我已学会以极大的沉着和耐心来承受这一切了。这时，我隐隐预感到第二次可怕的打击就要来临了。

1974年的圣诞节将至，我感叹着这个节日令我别有一番感慨。当我们准备庆贺耶稣诞辰之时，我心中也默默感谢上帝带给海丝的奇迹般的再生。海丝在一天又一天、一步又一步地向着康复迈进。在全家人经历了种种风霜雨雪之后，我决定在圣诞节一定要真正地合家团聚一场。

节庆将是前所未有的隆重！我们首先要带着女儿们去比尔父母家，共享怀特斯特家族传统的圣诞夜的欢宴，女儿们在爷爷奶奶家将打开她们的第一份礼物。然后全家尽快返回到自己的家中，迎接连夜驱车赶来的我的父母、妹妹斯蒂芬妮和弟弟迈克，我们合家喜迎新年清晨的来临。这晚，家中亲友团聚，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圣诞老人再次神秘地穿过壁炉走进千家万户，带来叫人眼花缭乱的圣诞礼物。第二天清早，兴奋异常的孩子们都惊喜地找到圣诞老人送的种种小礼品，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整栋房子到处都洋溢着欢乐气氛。

后来，我父亲、比尔和迈克跑到门外玩投球，斯苔希和梅丽莎穿着新旱冰鞋在车道上边滑边为他们鼓掌加油。海丝静静地坐在圣诞树旁，迫不及待地打开一套色彩鲜亮的玩具炊具（一些画有各种笑容可掬的小人儿的盆盆罐罐）津津有味地玩儿着。母亲和斯蒂芬妮开始拾掇四散的杂物，我准备去做早午合餐，自从我家住到多森后，三年来总是将圣诞节的早餐和午餐并为一顿吃，这已经成了怀特斯通家的惯例。

实际上许多准备工作已事先完成，宴席上的水果拼盘、圣诞甜卷等美味早已备好，比尔百吃不厌的火腿软饼稍稍加热就可食用。但是，我仍要赶在他们回来之前，万事齐备。我着手最后一道工序——煮开冲泡干乳酪的开水、在大碗里调搅两打鸡蛋。

为了赶时间，我感到手忙脚乱。我打开柜橱，打算取出最大的平煎锅。它被压在一大摞盆盆罐罐下面，我只好一手撑起那一摞盆罐，用另一只手往外取平锅。匆忙中我以为平锅上的器皿已被我撑牢，不想当我往外抽锅时，摞在上面的金属盆子、罐子、盖子一下子从柜橱里倒下来，砸在厨房的地上，爆发出一阵咣咣当当的巨响，震耳的唏哩哗啦声持续了足足几秒钟，如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火车事故。

出乎意料的骇人轰响，使我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响声停止几秒后，整座房子变得寂静无声。突然，从客厅传来母亲的呼喊：“达芙妮，你快来！”

母亲的声调暗示着什么更重要的事发生了，我撂下满地摔落的东西，匆

忙赶过去。一进客厅，就看到母亲惴惴不安的神色，我立刻意识到有什么不幸发生了。

“什么事？”我问。

母亲朝海丝点点头：“我想海丝的听力肯定有毛病！”海丝正面对着圣诞树，背朝我们，依然神态自若地在地板上玩。“妈，您在说什么？”

“那些东西咣咣当当掉到地上时，斯蒂芬妮和我差点儿吓掉魂儿，可海丝却连眼皮儿都没抬。”

“她正玩得很开心，也许根本就顾不上注意周围的动静，”我对母亲说，“她把那些小锅碗瓢盆儿从盒子里一拿出来，就一直埋头忙着用这些小玩意儿‘炒菜做饭’。”

母亲连连摇头：“不！不！我看她根本就没听见刚才的声音。”“您说得不对。”我急急地回答，为了验证，我绕到海丝背后，拍拍手。海丝置若罔闻，既未转身也没抬头。

不！不会的！我一边默默自慰，一边匆匆转回厨房，从地上拎起一只平锅，又从抽屉里抓出一只大木勺儿，扭身返回客厅。我小心翼翼地跨过玩具和四散的盒子，站在全神贯注地玩着的小女儿背后。用右手攥着木勺向左手紧抓的平锅使劲儿一敲，咣！

海丝毫无反应。

我又猛然敲了三下，咣！咣！咣！

依然一无所获！

我把平锅握得更紧些，贴在海丝身后，用尽全力再次猛击。

海丝依旧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我顿时觉得全身的力气消失殆尽，一下瘫坐在女儿身边的地板上。海丝终于发觉了我的存在，她举目张望，看看我手中的平锅、木勺儿，冲我甜蜜地笑笑，就又低头忙着用她的小塑料炊具“炒菜做饭”去了。

母亲走过来，将一只饱含慰藉的手放在我的肩上，然后轻轻地掰开我的手拿下平锅和木勺儿，慢慢地转身走进厨房帮忙做饭。我颓然呆坐在地板上，神情麻木，泪水遮住了视线，眼前一片模糊。我透过朦胧的泪眼看着海丝，问自己（也问上帝）：我们还将经受多少磨难和煎熬啊！

轻柔的圣诞颂歌在屋中荡漾，无论是海丝还是我对此都浑然不觉。圣诞的欢乐于我已经荡然无存了。

## 第五章 重度耳聋

往年圣诞节的下午，通常是由孩子们在眉开眼笑的大人们面前手舞足蹈地展示和表演他们的新玩具。今年却一反常态，节日里怀特斯通和格雷家的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讨论着怎么解决刚刚发现的不幸。节日的喜悦欢笑早已所剩无几了。

我想立即带海丝去看汉佛莱斯医生，但值班人员说医院二十七日上班，汉佛莱斯三十日才门诊。我预定了第一个门诊预约，并在头天晚上驱车带海丝赶到伯明翰。

母亲又陪我们一起上医院，告诉医生圣诞节早晨发生的一切。医生在诊室里做了一个简单测试，便点头肯定：“说得对，她的听力看来确实受损，让我们再仔细查查。”

检查后发现海丝的双耳感染发炎，充满了耳液。汉佛莱斯为海丝开了抗生素，提取了一点儿耳朵中的液体作化验，让我们第二天去看结果。

但愿只是耳朵感染，谢天谢地！

第二天看化验结果时，汉佛莱斯告诉我们：“昨天提取的耳液中有嗜血性流感杆菌。”

听了这话，心中的滋味儿就像有人把我抓起来，再狠狠地用劲掷到墙上一样难过。不！上帝！不！我脸上肯定是一副异常震惊的表情。汉佛莱斯立即宽慰我道：在绝大多数耳朵感染的孩子中，嗜血性流感杆菌是最常见的发病原因之一，海丝的状况还不至于又像九月份那样，处在岌岌可危的灾祸威胁下。汉佛莱斯认为用抗生素治疗一、两个疗程就能控制感染。

“噢，这样看来，海丝听不到是因为她的两只耳朵严重感染。”我顿时如释重负。

“或许，”医生回答，“治疗不见得非常有效。”他接着解释可能还有其他病因，但在作出进一步的诊断前，必须消除感染，将耳朵中的液体清理干净。他建议我们与多森的耳鼻喉科专家联系，连续治疗，排清耳朵中的液体。

我们严格按照医嘱逐一落实了每件事。抗生素极有效地控制了感染，随后，用耳鼻喉科专家开的药治疗遗留的耳液。当我们第二次去见那位耳鼻喉科专家时，海丝的耳液已经完全排干了。

我还记得自己曾告诉医生，“我觉得她的听力有好转。”我使自己相信这是真的。现在回想起来，这只不过仅仅是由于我一厢情愿地相信我的女儿没有聋，或者是由于海丝的其他感官的快速反应使我产生了错觉，认为她能听到我的话。（比如：当她正与梅丽莎一块儿玩时，听到我的呼声，梅丽莎会自然而然地抬头张望，海丝几乎立刻也会随着姐姐的目光抬起自己的头。）这些当然瞒不过医生的眼睛。我很清楚她的听力并不正常，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多么渴望看到好转的迹像。

十二月完成教学课程后，多森市学校委员会接着为我提供了第二学期的工作。让我承担一项新近在高原小学创办的1级阅读班的教学任务。一想到海丝还不能上托儿所，我心中便犹豫不决，一时无法断然下决心接受这份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找到当地一位做小时工的女大学生埃斯特拉，请她到家里来照看梅丽莎和海丝。每天早上九点比尔上班时她来我家，等下午我从学校回来时，她再离开。

这样的安排真是天随人愿，使我们和埃斯特拉双方皆大欢喜。就像我即将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教学工作一样，埃斯特拉急需找到一份工作，以便支付自己上夜校的学费，同时又不影响上课。但是，海丝听力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把我即将获得新职业的激动与兴奋冲淡了。

在我们成功地为海丝消除了感染和耳液之后，一切更加一目了然。我再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海丝至少存在一定程度的听力障碍。汉佛莱斯博士建议我们带海丝回伯明翰，到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大学开设的视听康复中心的西班牙诊所作一次全面的听力检查。于是我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打算在三月份春假时成行。

在伯明翰，汉佛莱斯博士对海丝作了详细检查。他非常满意海丝在行走能力上的提高，认为她的步态不错，运动能力几乎已恢复正常。他感到海丝存在严重的听力障碍，这使得已预约在随后几天要作的听力检查更显得事关重大。汉佛莱斯博士发现海丝耳内有些轻微肿胀——说明耳液复发。因此，他告诉我们不论听力检查的结果如何，我们回多森后必须找当地的耳鼻喉科专家在海丝耳中埋设引流管，这种简单处置可以有效地制止耳朵的再感染和耳液聚积。

母亲和我带海丝到西班牙诊所做听力检查，一名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引到观察窗前，使我能看到里面正在进行的测试，并提出问题。只见一名检测医生和海丝呆在一间小小的隔音室里，一项接一项地测查着。而我大部分时间却只是心绪烦乱地坐在候诊室内。看着一间间厅室里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人流，看着许许多多不同年龄的孩子们从全州各地汇集到这里检测和治疗耳疾，母亲和我的心颤抖着。我祈祷上帝：如果海丝的听力有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请保佑她医到病除、康复如初。她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亦不例外），我只企盼着一切疑虑豁然冰释，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六个多月来，我们的生活似乎已止步不前、不知所向。现在到了应该振奋精神，重新起步的关头了。

第二天下午，在西班牙诊所医生完成了对海丝的检测，把我们叫进了一间小会议室，听取对海丝检测的汇报。几名测试人员简单报告了他们的测试经过和具体结果。

他们说明了如何使用视觉强化测听技术，来引导海丝对声音作出反应以及通过耳骨传导测试和鼓膜测试，对耳组织结构自身的机能问题所做的检测。

主任专家最后总结说：两天中用同一套测试方案重复检测了两次，所得结果的准确性及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根据这些测试结果，我们的结论是：您女儿，怀特斯通小姐的双耳为重度或极重度听力受损。

“这将意味着什么？”我急切地问，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想搞清问题呢，还是本能地在拒绝医生的结论。

“是这样，”专家回答，“我们一般把海丝这样症状的孩子确诊为重度耳聋……”

重度耳聋？我只感到一阵凛冽的寒气刺入肌骨，顿时周身麻木。医生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心神恍惚，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心中苦苦挣扎，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竭力使自己领会这一可怕结果的真正含义。重度耳聋？海丝是重度耳聋？

我对身边的一切已麻木不仁，只是依稀记得，当时竟然忘记了还在进行

的谈话，转身向着母亲，对她大声重复，“重度耳聋？我们该怎么办？”

还记得我对专家说，“请再为我解释一下您刚才的话，因为我们家族里从来没有人耳聋，甚至在我认识的人中也没有耳聋的人。所以，我实在不懂您说海丝是重度耳聋的含义。重度耳聋的孩子会怎么样？她今后会怎么样？”

“是这样，”专家回答，“今后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因为各方面影响的因素太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自身的反应和智能。还有家庭环境，以及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等等。但我现在能够说的是：作为一名重度耳聋的人，您女儿的语言能力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绝大多数听力损失程度和她类似的孩子，都通过手语而不是口语进行交流。当海丝该上学时，她或许应该上特殊学校。比如设在塔拉德格的亚拉巴马聋儿学校。您可以放心，海丝在那里会达到三年级的水平。然后，您再找一些假期培训班和……”。

“不，不，现在不要、今后也决不要，”我的心在本能地抗拒着。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对这些无情的叮咛告诫，对这些迫使人俯首听命的种种桎梏，我既不能理解，也绝不能接受。母亲记得我当时喃喃自语，“我绝不认命！”也许我说过，但说实在的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当谈到今后的种种可能时，我曾打断医生道：“也许所有这些都无可非议，但现在我想不了那么远，我只想知道如何开始。今天，我离开这里后，要作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医生告诉我，他们编写的材料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指导，并交给我一份州教育部门的专业人员名单，这些人可以帮助我在多森学习当地现有的矫治方法，并参与特殊教育项目。医生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开始语言训练，以便保持和刺激海丝原有的语言能力，并建议我立即着手为海丝选配一个助听器，以利于提高治疗效果。鉴于学习语言的刻不容缓和至关重要性，医生告诉我在路过大学书店时，买一本《英文手语》，以便尽快着手沟通与海丝交流的渠道。

从西班牙诊所到书店的一路上，穿过马路，驶过街区，我和母亲始终默默无语，我的心仍处在沉重的惶惑中。

走进书店，面对一排又一排从地面直顶天花板的书架，真不知该从何处查起。我只得问店员，是否有《英文手语》，她引我到书架前找到了这本书。我抽出这厚厚的绿色平装书，从头到尾粗略浏览着，只见里面满是插图，画着一行行代表不同语意的各种各样的手势图，每幅图下面都注有英文说明。

书前面还有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查找词条，书中汇集着不计其数的词汇，数不胜数的图形，真不愧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巨著。

我翻动书页看着看着，从脑海里陡然冒出一个从未想到过的问题：如果海丝只有通过手势才能交流，那我们所有的人也别无选择。我、比尔、斯苔希和梅丽莎，以及任何想与海丝交流的人无一例外都得学习手语。我的父母、比尔的家人、我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所有希望与海丝亲密相处的人，即使是想进行一场简单的对话，也必须得先学会手语。

自从在那间小会议室听到“重度耳聋”的判决以来，这是我遇到的随之而来的头一件麻烦事。面对眼前突然耸起的庞大吓人的任务，我只觉得头脑发胀，四肢冰冷。庆幸的是这种感觉只持续了几秒钟。

当我合上书的同时，我也下定了决心：纵有千难万险，也绝不退缩。我把书夹在腋下，坚定地迈向收款台。我不停地鼓励自己，天下无难事，只要

肯登攀。

我开始每天晚上在父母家按字母顺序学手语，与斯蒂芬妮和迈克一块儿练习。他们对此津津乐道，学习速度很快就大大超过了我。

我对自己说，绝不能在命运的挑战面前失魂落魄、束手待毙。尽管我对所发生的一切毫无精神准备，很难承受。但作为一个母亲，面对海丝和全家人的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的未来，面对作出任何一个选择前必须考虑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我一定要摆脱张惶失措、举步不前的状况。

此刻，我知道自己该做的事就是努力听从“专家”的指导。我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汉佛莱斯博士的嘱咐，在海丝耳朵中设置引流管。但是，当我们对多森的耳鼻喉科专家提出这一要求后，这位专家再次对海丝作了检查，认为没有耳液复发的迹像。并告诉我们，他不想作这类毫无必要的手术。我们居住地的医疗服务再次令人大失所望。

我们告诉了汉佛莱斯在多森的检查结果，他便向我们推荐了伯明翰的另一位专家，他将在四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儿童医院作这类小手术。就在那时，海丝的耳朵发生了另一次感染，于是手术提前进行，并且作的十分成功。

手术后，海丝住了一天院，汉佛莱斯博士为海丝安排了一系列的神经科检测。我们出院前，神经科专家本顿到海丝的病房，把检测报告给我和比尔，说没有发现海丝有任何脑损伤的症状。

“脑损伤？你们为什么要作这类检查？”我感到大惑不解。

本顿医生回答说：因为汉佛莱斯博士担心和怀疑海丝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要作神经检查。母亲告诉我们，汉佛莱斯博士早在头一次见到海丝时，就担忧她有脑损伤问题。但因为当时其他许多迫在眉睫的严重病症尚未治愈，所以他认为我们必须首先集中精力为海丝解决那些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汉佛莱斯博士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如果那时我们心中就加上这一层忧虑，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得起。

本顿医生继续解释，像海丝这样的大面积嗜血性流感杆菌感染，往往会引起脑损伤。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避开了这种厄运。海丝的听力受损，很可能是在治疗过程中注射庆大霉素的结果。庆大霉素是一种对耳组织有害的药物，有时会造成像海丝一样的神经性耳聋。正因为它具有如此严重的副作用，所以通常只在性命攸关的情形下才使用。事到如今，我们才第一次明白，当初使用庆大霉素时，海丝已经濒临死亡。我们差一点儿失去了海丝！

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了解到海丝曾处于何种可怕的境地，我想我似乎该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但一切并非如此。

最初在医院里，我向上帝祈祷：“上帝，请保佑她战胜死亡吧！”然后是：“请保佑她会重新走路吧！”现在，我又开始为海丝的听力和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一切努力而祈祷。十八个月来，我终日不断地在祈祷，在祝福，希望一切会一天天地好起来。

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些答案。我们需要向前看，计划好今后必须为海丝作的每一件事。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前进的道路上，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向回看。往事时时缠绕在心，耿耿于怀，我深深地陷入了那些“如果当时怎样……就不会怎样……”的“事后诸葛亮”的怪圈中，不能自拔。于是，心情愈来愈苦闷，情绪愈来愈烦躁，在心中郁积起一股愤懑怨恨的情绪，而且按捺不住地要向外爆发。

问题是该向谁发火？

我对某些医生充满怨气，埋怨他们不能及时作出正确的诊断，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海丝的病情恶化。

我也生比尔和他父亲的气，埋怨他们没有支持我最初的建议，尽快将海丝转到伯明翰去治疗。

我当然还生自己的气，如果我能坚持自己的直觉，更强硬更坚决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海丝或许就不会耳聋了。

但最容易找到、最安全的发泄对象是上帝。如果上帝果真像我一直仰慕的那样是宇宙的造物者、是万物的主人，那么去年秋天海丝住院时，就应该使她能一下子康复，不至于九死一生去使用可怕的庆大霉素；如果他真是我始终不渝地信任敬仰的上帝，他就不应该让可怜无助的海丝惨遭这样的苦难；如果他真正关心大家，就应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答案和指导，让我们明白现在怎样才能帮助海丝。

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对上帝的恼怒。

这样，我一下子丧失了有生以来对天地万物的感激之情。以往每当我来到美丽的大自然中，沐浴在上帝温暖的怀抱里时，我总是感到上帝与我近在咫尺，息息相通。大自然对于我就象一座宏伟宽敞的露天礼拜堂，屋后的苍苍林木，满院葱郁的松树和争奇斗艳的杜鹃花就是他的圣殿；玫瑰园的绚丽多彩常常将我的思绪引向天国；每年春天，周围的茉莉花开时，四处飘溢着甜蜜的芬芳，空气中充满了圣洁温馨的香气。

然而那一年，我完全没有闲情逸致去注意季节的变化，即使看到了美丽的自然美景，也无动于衷了，我对上帝怨愤颇深。

为此，我甚至试图停止同上帝的对话。

从记事时起，我每日每时保持着同上帝的对话。祷告已经成为我与上帝之间彼此相连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当然，长年累月、反反复复的祈祷，使我曾愈加感到与他人相比，自己距离上帝越来越远。回想以前，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同上帝的对话。

可现在不同了。

作为母亲，我一直对孩子们强调祷告的至关重要。但是那年春天，我是如此的心烦意乱、愤世嫉俗，甚至不再与女儿们一起作晚祷告。当斯苔希或梅丽莎说：“妈妈，我们该作晚祷告啦。”我却敷衍了事地应付，“好吧，你们先作。”而我自己从不主动，也不提醒别人去作祈祷。

可笑的是，当我对上帝抱怨赌气的时候，我仍旧鬼使神差般地想要与上帝对话，真是积习难改。因为，即使在我怨天尤人、忧心如焚、一筹莫展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祈求上帝的帮助和指教。当医生不同意为海丝埋设引流管时；当听到令人肝胆俱裂的听力检测结果时；当我跑过一个又一个街区，迫切地想要知道海丝到底需要什么，而我们到底又该怎么做时，便更加离不开上帝。

比尔和我匆匆商量过搬家的事，想看看是否有可能把家搬到一处可以为海丝提供更多、更完善的教育和矫治服务的地方。比尔在犹豫不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要离开家，放弃回到多森后多年来所付出的一切艰辛努力，放弃眼前的事业。而比尔多年来孜孜不倦、梦寐以求的正是能开一家个人店铺，能够看到自己的梦想结出累累硕果。

我们还是决定留下来，尽一切可能为海丝在亚拉巴马的东南部选一处适合康复的地方。这段时期一直是我最沮丧受挫的时期。

因为西班牙诊所告诉我们，对海丝进行语言矫治事关她的一生，刻不容缓，此事当然就成了我的首要任务。但是，当拜访了当地一位又一位语言矫治专家后，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您的女儿目前还不能说话，我们对此实在无能为力。等她开始说话时，再带她来，那时我们就能帮助她了。”

我只得去问听觉专家，怎样使聋儿开口说话，他们同样表示无计可施。“我们只是检测，”他们说，“关于说话问题，您必须去找语言矫治专家。”

我明白一切刚刚开始，我们正站在起点A上，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达到终点Z。此刻，我首先需要了解怎样才能由A点一步一步地到达B、C各点。然而，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起步，我不过是转动着自己的车轮，在原地打转而已。

我变得越来越心灰意冷，越来越走投无路。对这个世界，对我自己，尤其是对上帝让我经受这么多悲哀痛苦，越来越愤愤不平。

那年春末的一天，夜幕降临。已经过了午夜，夜深人静，家人早就沉沉入梦。而我却刚刚备完课，神经又紧张又疲乏，一时难以入睡，便想读点儿什么放松放松。我碰巧拿起了一份多森日报，随意一页页扫过去，我停在了埃玛·邦贝克主办的综合栏目上。好，就这篇，读来想必轻松愉快。

读着读着，我发现这篇文章既不轻松，也不愉快，但却引人入胜，我禁不住一口气读下去。这个栏目写的是有关母亲们的事，尤其谈到每年有近十万名妇女沦为残疾儿童的母亲。同时，探讨了上帝是如何分配她们担当各自的角色。

埃玛惟妙惟肖地描述了上帝与一位小天使之间的对话。文章中说，小天使的职责是为所有新生的孩子造册登记，给每位母亲分配一名守护神，来帮助她承担母亲的重任。当上帝选出一位要接受一个残疾孩子的母亲时，小天使不由地停下来，对这一明智的选择提出疑问。

上帝回答，“是的，我将要保佑一名妇女生一个不那么健全的孩子。但她将会受人羡慕，尽管现在她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她决不会轻信别人的评头品足，也决不会考虑继养一名正常儿童。当她的孩子叫出第一声‘妈妈’时，她会奇迹般地预感到这一时刻！当她向自己失明的孩子描述一棵树木，或是夕阳西下的美丽景象时，正像几乎无人见过我的创世一样，她将看到这一壮举。”

“那么，她的保护神是谁呢？”小天使举着笔问道。

上帝微笑着：“有一面镜子就足够了。”

未等看完这篇文章，我早已泪水盈眶，眼前模糊成一片，无法再读下去了。不由得在心中审视着，的确有一部分内在自我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的深意。因此那晚入睡时，我异常地愧疚不安。

几天后，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带着三个女儿去公园。我坐在高高的塔松下一条长椅上，看着游戏场上的斯苔希、梅丽莎和海丝。我看到两位小姐姐多么轻松自然地对待海丝，就像她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是的，她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接受妹妹的失聪。当梅丽莎想引起海丝的注意时，她并不呼喊，而是走过去，拍拍妹妹的肩膀，在海丝回头张望时，梅丽莎便让海丝随她一起行动。这一切看去多么简单自然。

此时此刻，上帝似乎在我的心中娓娓而谈：“你看到了你应该做什么，你知道海丝能够做什么，你也看到了海丝将怎样去适应生活。”

“别再自怜自惜！现在是应该停止悲伤的时候了。您可以一生一世坐在

这儿怨天尤人，但这样根本无济于事，对海丝和另外两个女儿也毫无益处。已经到了挺胸抬头向前进的关头，有许多事情在等待着您去作决定。我一直伴随在您的左右，现在我就在您的身旁。我将永远与您同行，帮助您，引导您，您必须相信我。”

在那小小的街心公园里，我来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经过数月的怨愤恼火之后，我不打算再问“为什么”和“如果……那么……”之类的令人懊悔的问题，也不打算再与上帝较量，我应该开始溶入生活的主流，奔腾向前了。

包括海丝！

## 第六章 幸运与不幸

自从知道海丝重度耳聋之后，我完全陷入了苦恼迷茫之中。我们开始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为海丝配助听器。到处寻访愿意或能够为海丝提供西班牙诊所曾建议的那种语训的语言矫治专家，结果一无所获。同时，为在多森寻找有关的聋儿教育项目或社会服务而作的各种努力也以失败告终。谁会告诉我，我们到底还能为海丝作些什么。

但自从那天在公园与上帝交谈过之后，我的心中犹如注入了新的决心和力量。我相信“即使只能靠自己来寻找答案，也决不放弃，答案最终还是会有！我是一名教师，我知道该怎么进行研究。”

于是，我开始自己寻求答案，首先，到图书馆查资料，我选中的第一本刊物名为《数度回顾》，是聋人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官方出版物。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非盈利组织，专门为听力残疾儿童的家长提供信息资料和社会服务。我立即填写了订书单，但在第一本刊物寄来前，我已急不可耐地将图书馆的合订本复印件借回家，贪婪地读了起来。

在《数度回顾》的前几期刊物中，我看到一则来自洛杉矶的约翰·特蕾西诊所作的广告，介绍说为失聪幼儿的家长提供免费函授课。“这也许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想，“不管怎么说，不会有坏处。”于是，我立即写信询问详细情况。

与此同时，比尔和我开始探讨怎样从全新的角度来帮助海丝康复。作为一名联邦政府资助的二级阅读项目的新教师，我十分清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了加强公立学校残疾学生的特殊教育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同时，我对公法第94—142条的基本要点也了如指掌。这些法律要求当地的每一所学校必须为居住在本地区的所有儿童，包括不同类型的残疾儿童，提供“在最大宽松环境下的最适当的教育”。我想，在多森肯定还有其他听力残疾儿童，如果多森的公立学校为他们提供服务，同样也会使海丝从中受益。

我去找多森教育系统的特殊教育部主任，他告诉我，据他所知本地区仅有为数有限的听力残疾儿童，其中有几名在普通学校学习，由学校的特殊教育老师为他们提供矫治服务，其余的则加入了塔拉德格的亚拉巴马聋儿学校为居民开办的特殊教育项目。他认为是当地的校委会帮助这些聋儿家庭支付了这笔教育费用，但在多森还没有正规的聋儿教育项目。

“为什么还没有？”我刨根问底。

“关键还是人数太少。”

当我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开展这样的项目”时，他建议我去蒙哥马利的州教育部咨询此事。

于是，那年夏天，比尔和我几次远抵州府，敲了一扇又一扇的门，打了不计其数的电话，与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所有人士和每一位官员约会。“我们怎样才能有多森的公立学校施行聋儿特殊教育项目？”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您能帮助我们吗？”

此时海丝只有两岁半，可是我们知道官僚机构办事历来拖拉，只有现在着手开始争取建立特殊教育项目，等海丝到入学年龄时，才有可能免遭远离家门、奔波到很远的学校去读书的苦头。

刚开始接触立项一事时，脑子里如同塞了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来。随着我们在蒙哥马利与州官员们交谈次数的增多，问题的症结也就越来越清晰

了。归根结底最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即人数问题。如果在多森或附近有足够的听力残疾儿童，而且他们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当地受教育，那么多森市公立学校里的聋儿特殊教育部就能得到经费，开办聋儿教育项目了。

“要有多少孩子才能开展项目？”我向有关的政府官员咨询。

“联邦和州法律规定需要有七名聋儿。”

只要七名！听起来很鼓舞人心。但我们首先要在当地寻找够条件的失聪儿童，然后还必须说服他们的家长，使他们对这个目前根本并不存在的项目满怀信心，让他们相信这个项目能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为了让“不存在”变为“存在”，我们千方百计，作了种种努力，仅仅打电话就打了一夏天。当地学校也与我们同心协力，游说领导，反复宣传，使各个家庭认识到该项目对促进当地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潜在效益。

我们在多森和蒙哥马利为这个新的特殊教育项目四处奔走、上下呼应的过程中，同时还抓紧时间为海丝配置助听器。助听器的选型过程用了八到十周的时间才宣告完成，选型的第一步是请医生测取耳朵的模型，订购相应的助听器，然后再回到西班牙诊所，用两周的时间对五花八门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助听器进行试戴。在每次试戴的开头和结束时，都要对海丝经过矫正的听力进行测试，而且我还要向医生描述海丝在试戴该种助听器的过程中，我所观察到的她在听力上的任何一种变化或是改进。

那时制作的各种类型的助听器都无法改变海丝的听力，所以到六月中旬，我们购置了一个胸式保真助听器，这个助听器人戴上后要用带子固定在胸前，通过导线与两耳相连，导线从胸部向上至下腭后，分为两股分别通向左右耳。海丝很讨厌戴它，戴上后右耳依然如故，左耳只能勉强听到中频声波，与我最初的愿望相差很大。尽管如此，根据专家咨询和读过的材料，我心中十分明白，对于海丝来说获得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儿听觉，都会对她掌握语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到夏末，已经有六个孩子登记参加了酝酿中的聋儿教育项目，算上海丝，就满七名了，虽然她还不满三岁，但可以上学前教育预备班。有了七名孩子，我们就有条件在1975—1976学年开设特殊教育课了。当地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们与我们密切合作，并肩奋斗了整整一夏天，目睹我们的努力这么快就取得了成效，他们也同我一样激动兴奋。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多森的公立学校没有合格的聋儿教育方面的教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去聘请，即便不是毫无可能，也会相当困难。为此，我在心中暗自掂量自己参加聋儿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我知道全州只有两所大学设有聋儿教育课程，我必须花费两年时间才能合格毕业，而且最好是在海丝到上幼儿园年龄时，我就能学完有关课程。看来这只能作为一种想法，供今后去考虑。而目前对于特殊教育部能否在秋季如期开课，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等待、盼望校委会尽快聘请到老师。

与此同时，我们对公共函授教育仍锲而不舍，我收到了约翰·特蕾西诊所寄来的函授教材，为我提供了我所渴望得到的各种知识。

我了解到约翰·特蕾西诊所是由一位电影明星的妻子斯潘塞·特蕾西夫人于1942年成立的，以她的先天重度耳聋的儿子约翰的名字命名。在函授课的简介中，特蕾西夫人谈到了一位医生，她从这位医生的口中第一次得知自己的儿子将永远听不到声音，但紧接着又听到医生说的下面一番话：“您知

道您能作些什么吗？约翰可以学说话，他可以学唇读法，他可以上大学，他可以做正常人能做的几乎任何事情，这就是您的任务！”特蕾西夫人还回忆了她与一位著名神经学家的约会，专家为她的神经性耳聋的儿子作完最初诊断后，下结论道：“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接着又说：“特蕾西夫人，您是女人中间有福气的人，您的生活一定会因此而情趣非凡。”

特蕾西夫人承认，生活并不像她在祷告中所祈盼的那样称心如愿，“但凭心而论，我的生活很有意义。”她指出这门函授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聋儿的家长有效地承担起自己的“任务”，促进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她写到，“我们将告诉您，怎样在孩子和家庭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最终将孩子和世界联系在一起。”

哦！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越读越觉得她真不愧是位好老师：“我们把孩子的全面成长和发展放在第一位，甚至把这一点看得比唇读、练发音、学说话更为重要。因为，一个人所必需的交流并不是孤立分离、互不相关的技能。交流是生活的一部分，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密不可分，并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如：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态度、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感情，包括安全感、友谊、好奇心等等，这些影响交流的因素在幼小的孩童时代就已形成，有些甚至成为伴随终生的情感、态度和习性。”

我只读了十分钟约翰·特蕾西诊所寄来的教材，就明白自己已找到了起步的基点，里面谈到的论点与我学过的教育理论，人类心理学、儿童发展等相辅相成，使人受益匪浅，成为我们从A点迈向Z点旅程中跨出的第一步。

上帝正在履行那一天他在公园里对我作出的承诺，我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感到欢欣鼓舞。不管聋儿教育部的命运如何，我确信是上帝的手把我引向了约翰·特蕾西诊所的课程。

经过了种种努力和焦虑之后，我们的特殊教育项目终于在秋季开课了。虽然没有找到有经验的聋儿教育专家，学校最终还是聘请到了一位符合本州教育基本规定的特殊教育老师。在学校系统中唯一被选中，可以设立新的特殊教育班的学校是高原小学，就在我每天教课的那栋楼里，再也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事了。感谢上帝对我们的又一次恩赐。

但是，并不是事事都令人心满意足。我和其他聋儿家长很快听说，有一份报告提及特殊教育班的新任老师说：“别以为我能教会他们所有的事情，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们一些彩色图片而已。”于是，她是否具备足够的聋儿教育资格受到怀疑，结果大家发现她离专业要求差得很远。

这件事发生后，许多关心此事的家长向学校的管理人员表示不满，于是校方开始寻找代替她的老师。这事看上去是件坏事，结果却再次转化成了上帝的恩赐。校方很快就找到了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女士拉·特蕾·马歇尔，她一月份刚从亚拉巴马大学毕业，获得特殊教育学位，主修聋儿专业。马歇尔小姐从年中开始接管特殊教育班，她的工作积极而又出色。

在新的特殊教育班创办的过程中，比尔和我付出了许多艰辛努力，开班后的几年中我们对这个项目所作的努力便很有限了。刚开班时海丝只有两岁，无法要求她与班里其他大些的孩子（有的是十岁或十一岁的孩子）同起同坐。海丝每周上五天学，我们便只让她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在学校，然后回家和埃斯特拉在一起，下午睡午觉、作游戏。事实上，我们最初给海丝报名上这个班，只是为了凑足条文中规定的七名孩子，以便建立起这个项目，等海丝够入学年龄时，就可以正式开始学习了。所以对海丝入学后的情况，

我们感到很满意。尽管她与自己的姐姐和朋友也有许多交流，但学校毕竟可以为海丝提供一些社会交往的机会，老师也能帮助强化她在家里学到的东西。

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应该尽快对海丝的训练课程作出带有关键意义的决定。伯明翰西班牙诊所的医生曾建议我们教她学手语，但是看过《数度回顾》和其他读物后，我认识到在聋儿教育者之间，在有关无声社会的教育方面也存在着深刻的学术理论分歧。一方面是那些提倡发展和教授手语的人，他们认为手语是无声文化中已被人所接受的通用语言。另一方面是那些赞成单一发展口语讲话的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有声和无声世界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交流的桥梁。

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正在向口语讲话的论点倾斜。如果海丝要想回归到有声世界中，真正与家庭相融，就必然体会到学习口语讲话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似乎也是海丝与有声世界相通的最好选择。

当然，我认为手语对海丝的交流能力也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为它所带来的问题感到困惑。当我将西班牙诊所推荐的《英文手语》带回家，并开始对海丝使用几个最基本的手势时，海丝马上就不想试着用发音与人交流了，她甚至连最简单的在婴儿时就会说的“爸爸、妈妈”都不愿说了。于是我把手语书放到一边，将精力主要集中在约翰·特蕾西的培训课上。这些课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论我们将来主要学习口语讲话，还是学习手语，它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我来说，特蕾西教材中最重要的一门课，是要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体验一系列自然而然的学习行为和交流方式，并将这些看到的、学到的、不计其数切实可行的小观察、小思考和技术方法再运用到实践中去，以促进和培养同海丝的交流。例如，为了强化交流的概念，对孩子非语言的感情表露（从高兴到生气）用语言来作出反应，如“我知道你很高兴，这很好。”或“是的，夫人，我愿意效劳。”等等。教材中还包含有种种策略，以帮助聋儿童成为家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介绍了与聋孩子交往时，如何利用其它感知来辅助听党的各种简单方法；此外，每一课还包含有许多易学易用、趣味横生的小游戏，帮助家长寓教于乐，让孩子在轻松自在的环境下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海丝的语言训练很快就成了家庭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家人无一例外都是参与者。斯苔希和梅丽莎从来就是海丝天经地义的老师加姐姐。海丝对姐姐们本能的追随和模仿，促进了她的不断发展。

总的来说，海丝生来就是个随和的讨人喜欢的小姑娘，但偶尔会露出不易察觉的固执的小毛病，听力受损以后依然如故。有时海丝会倔里倔气不听招呼，我便只好暂时放弃，改变策略，转移她的注意力。后来我发现对海丝来说，模仿姐姐常常比固执己见更有吸引力，我就让两个大女儿参加我的密谋策划。常见的手段是，当海丝不听话时，我就和两个大女儿一块儿假装玩一个小游戏。我要求她们做我刚才让海丝做的事，她们则模仿海丝拒不听从，双方相持几个回合后，我故作严厉地批评她们，她们便很快地欣然从命，于是海丝也马上效仿姐姐，放弃了固执。斯苔希和梅丽莎对这类游戏百玩不厌，觉得经妈妈允许而可以淘气，可以不服从，尽管只是游戏，也够刺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玩这类小游戏，她们永远觉得其乐无穷。

我很快意识到海丝作为第三个女儿，该是多么幸运，没有斯苔希和梅丽

莎的帮助，我面前的挑战将会严峻困难得多。

我还记得另一件难以忘怀的事。那年我们去蒙哥马利的一家诊所时，观察了一项叫“语调”的监测过程。医生将一些小小的传感器贴在耳聋患者的手上和体表敏感的皮肤上，通过这些传感器他们会感觉到不同的震动，而这些震动是由不计其数的词句、语调发出的声波引起的，从而使听力残疾的人开始能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体验和鉴别声音。

在那间诊所，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儿，他不仅失聪、失明，而且还弱智。望着小男孩儿，我心中不禁十分诧异：在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手势、什么是声音、思维又十分有限的小脑袋里会发生什么事呢。当看到他母亲时，我心中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多么可怕的悲剧！多么沉重的负荷！随后我就明白了，她不仅义务收养了这个孩子，还具备丰富的矫治男孩多种残疾的知识。我感慨万分，上帝，您在以多么不可思议的方式，把爱赋予所有的人！我无法想像自己是否能做到。

我怀着负罪的感觉回到家！我发誓决不再为生活中的坎坷感到懊丧烦恼。从那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看到聪明美丽的小女儿那双晶莹闪亮的绿眼睛，我就提醒自己：“值得我们庆幸的事真是数不胜数呵！”

那年春天，还发生了另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最初是比尔的母亲科莉谈到，她的一个老朋友有个听力残疾的女儿叫悉尼，现在住在多森。悉尼在多森的公立学校中与正常孩子一起完成了所有该上的课程。

光凭这点就足以让我兴趣大增。后来比尔的弟妹格洛丽亚告诉我她曾与悉尼是同窗学友，并讲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我便邀请悉尼来家里作客。

悉尼来了，对比尔和我讲了她的种种生活经历。早几年她曾离开多森去上大学，后来和一位正常男子结了婚，便又回到多森携手开始新生活。

她告诉我们，她对自己能通过口语进行交流感到十分快慰。她的发音清晰易懂，仅带一点儿并不严重的耳聋患者发音中司空见惯的鼻音。她鼓励我们要坚持让海丝练习讲话，还介绍说，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地区康复中心有一个听力语言诊所，在那里可以得到最好的聋儿教育方面的咨询。“当我作听力复查时，我总是去找那里的专家，”她说，“康复中心的主任叫哈斯，你们真应该去找他谈谈关于海丝的问题。”

于是，我往塔拉哈西打电话，与哈斯博士预约了为海丝检测的时间。年轻女士悉尼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建议，即将给海丝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了！

## 第七章 必须说“喝水”

头一次接触佛罗里达州的项目，就使我感慨万端。比尔·哈斯博士对约翰·待蕾西的教材相当熟悉，并对我们按教材所作的一切表示赞同。海丝在那里又作了一次彻底的听力检测，检测结果与西班牙诊所作的相差无几，同时医生们对海丝目前采用的复聪方案的优点和正确性给予了肯定。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随后，我谈了萦绕在心头两个问题：1) 在海丝能讲话前，当地能不能找到愿意辅导海丝的语言矫治专家？2) 口语和手语两种方法，哪一种更适合海丝？哈斯博士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同时帮你解决问题。”然后他向我介绍了有关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为失聪儿童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和家长举办的夏季家庭讲习班的情况。

因为比尔不能撇下商店的工作长时间请假，只得返回多森。我为自己和三个女儿报名参加了讲习班。1976年夏季我和三个女儿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里住了六个星期，每天清晨我们母女四人一块儿去“上学”。

开班第一天，在相互介绍认识的过程中，我对教师说，我们参加这期夏季讲习班的主要目的是想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来学习语言训练的方法，至少海丝是这样。每天上午教师把三个女儿召集在一起进行海丝的语言训练教学，斯苔希和梅丽莎像她们的小妹妹一样对这些活动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她们在佛罗里达大学的经历，进一步证明了由特蕾西函授课首先提出的“将矫治融合于家庭和日常生活”的观念。班上的作业，也以家庭为小组，由大家共同完成。每天下午，我们一起回到旅馆的房间，继续学习。例如，一天我们从一摞旧杂志中把动物的图片剪下来，贴到目录卡片上，再用这些自制的漂亮小卡片教海丝认动物的名字和发音。

除了趣味盎然的课程外，还有许多自由时间，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在旅馆的游泳池里游泳，或逛商店，或在塔拉哈西四处观光。到了周末，有时比尔会开三个小时车来看我们，有两三次是我们回多森会比尔。在女儿们看来，这真像一次长长的合家度假。

而在我看来，这是上帝及时满足了我的祈求，给予了我所迫切需要的回答。

每天上午，当海丝和她的两个姐姐上语言训练课时，学校的老师也和我在一起，教我另外一些东西。有时他们带我到观察室，通过双向镜，坐在里面观察女儿们的语言训练过程。教师在旁边讲解正在进行的活动和原因，还向我展示了在家里如何开展某些特定的学习语言的方式，或是怎样使语言训练技术成为家庭成员与海丝相互交流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时，他们与我谈作为家长对自己重度耳聋的女儿的未来应该抱有何种期望。

那年夏季，真是满载而归。我们除学习掌握了一定的家庭语言训练矫治知识，还开阔了眼界。刚到佛罗里达大学不久，哈斯博士曾把我叫到一边说，要想为海丝将来的教育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训练方式，就不能盲目地选择。他认为我不仅应该了解聋儿教育领域目前正在流行的所有最基本的方式，还应对这些方式进行探讨。

我当然知道口语和手语两大营垒之间的争论，但哈斯博士说在这两大派系里还有其它一些分支，他列举了五种不同的基本观点。

赞成手语的主要有三个流派。

一派入提倡运用排它性的手语，他们完全不赞成听力受损的人利用可闻性语言。持这一观点的专业人员又分为使用“美国手语”和使用“英文手语”两派。我对这种排它性的手语毫无兴趣。

另一派人支持和推广近来被称为“混合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这种提法。混合交流强调失聪儿童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有学习和使用各种交流方式的权力。也就是说，每个失聪儿童都应该有机会学习口语和手语交流技能，包括：讲话、手势、姿势、指法拼读、唇读、读和写等等。鼓励充分利用残留的听力。总而言之，就是在交流实践中同时使用口语和手语两种方法。这种方式符合逻辑，就像是十八世纪以来就被广泛运用于聋儿教育的手语与口语教学的简单折衷。混合交流方式是很吸引人的，是啊！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各种学派的优点呢？

第三派人推崇一种新型的“手势”方法，哈斯博士说这是最近十年来才发展起来的一种相当新的技术，叫做“提示语”。提示语与美国手语和英文手语截然不同，在后两者中，手势代表概念、短语、词汇、具体的阿拉伯数字，而提示语是一种以音素为基础辅助唇读的手势。唇读作为一种有助于耳聋患者自身发展，而又逻辑性较强，并且贴近自然的交流技能，但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有许多英文单词的发音，口型几乎一模一样，以小小的单词 met 为例，它的发音口型至少就有七种不同的唇读理解，包括 mitt、bet、but、bit、pet、putt、pit 等等。作为补偿，提示语便应运而生。它通过八种基本手形，配合在面部周围的四个不同位置，来代表各种不同的辅音和元音的发音，使唇读者利用这些辅助的提示准确地看到（听到）正常人所能听到的每一个音节。

我立即发现了这种方式的两点不足之处。一是它还没有被广泛使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对语音学从来就掌握得不好。我简直难以想像，一个人怎么可能轻松自如地一边说话，一边又能根据语音正确地做出各种姿势。

哈斯博士则将耳聋患者口语发展的各种支持者列为两大基本流派，这两派均避而不用正规的手语。第一派人提倡使用综合感觉法（视觉、残留听觉、在某些情况下用触觉）帮助儿童理解和进行对话。唇读属于这一类别。

第二派口语方式通常被认为是听觉语言方式。许多这种方式的支持者认为视觉提示，例如：手势、甚至嘴唇的动作，都会削弱和淡化孩子学习利用自身残留听力的能力和兴趣。为了在教学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依靠听觉功能，他们在培训失聪孩子时，常常把嘴挡住。持这种观点的专业人员认为，大部分失聪儿童到学龄时，应具备足够的听觉技能，这样他们才能像正常儿童那样受教育。

这种方式也像提示语一样未被广泛采用，尽管这一学派的目的是使失聪儿童回归主流社会，受到正常教育，学会在有声世界中生活等等，这深深地吸引着我，但我对它还是怀有一连串的疑问。

当哈斯博士将这五种基本选择一一表述一遍之后，我又追问他本人认为其中哪一种最适于海丝。博士没有正面回答我。

“这些方式中不论那一种都有一些代表自己的‘典型’实例，用来向人们证明自己是成功的，是正确有效的。”他说：“但在每一个‘典型’后面，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成功因素，即一位对这种方式 110%地坚信不疑、对孩子竭尽全力的家长。所以，您对海丝和对您自己选择的交流方式的信心与责

任将是海丝成功的关键。没有您的承诺，没有您的支持，无论选择了哪种方式，无论海丝怎样拼力抗争，最后也只能达到一个‘平平常常，的失聪孩子的水平。有了您的承诺，不管选择五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海丝都会成为成功的典型。因此，我建议您尽自己所能，学习、了解有关知识，以便选择一种自我感觉最好的方式。能否作出正确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您自己。”

经过这一番讨论，虽然我心中依旧浑浑沌沌、四顾迷茫。但哈斯博士相信我能够在海丝的生活中，起到非常关键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这点使我倍受鼓舞。同时，他对家长责任的强调，也促使我用更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要求自己：“如果我对海丝做了错误的决定怎么办？”“如果我未能付出博士提到的110%的努力怎么办？”

我只能祈求上帝，请继续引导我做出正确的选择吧。

要避免作出盲目的决定，第一步就是要得到有关各种选择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哈斯博士安排我去参观塔拉哈西地区的三个不同的聋儿教育项目。

当我观察一个班级的活动，看到教室里的一切指导、对话完全靠手势表达时，我产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感觉。我感觉自己被完完全全地排除在群体之外了，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寂静无声的异国他乡。如果我有这种被排除的感觉，那么当这些孩子们走出教室，踏入外面的有声世界，又会作何感受？我呆呆地看着老师，看着班级，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每个人看上去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我唯一只能通过黑板上写的字得到一些提示，才能看出课堂里正在教什么。当我想像自己走进遥远的北京的一所小学教室时的情景，这种被排除感就更强烈了。我对中文和手语一样一无所知，但至少能知道谁在对谁说话，能从谈话的语调中察觉一些东西。

这次访问使我感到纯手语的交流方式缺少轻松融洽的感觉，绝对不能为海丝选择这种方式。

然后我观察了一个使用混合交流方式的班级。这次，我对教室里进行的活动，可以了解得更多一些。但人际间的对话零零星星，使用的频率很低，大部分交流还是完全依赖手语。这种方式并不完全可取，因此我仍然觉得眼前茫然一片，不知该向哪里迈步。

最后一次观察是与一位公共特殊教育老师在一起，她主要依靠唇读来扩大听力障碍儿童的词汇，并作为主流教育的组成部分，为孩子们提供这方面的辅助课程。比较三个观察过的班级，我更喜欢这一个。因为，我能理解老师讲的内容，也能听懂孩子们所讲的大部分话，尽管他们的发音有时不准。

通过观察，我感觉这三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不同之处，所以依然无法作出最后选择。在讲习班结束，离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之前，哈斯博士敦促我尽快作出自己的决定。时间紧迫，如果我们要改变自己原有的想法，特别是若准备选择口语方式时，作出最后的抉择就更刻不容缓了。因为，要基本掌握熟练的手语，不妨还可以稍后再去进行，而要为口语发展打基础，却必须立即开始，等到孩子四五岁时就为时过晚了。

阅读研究过有关资料后，我已相当有把握地排除了提示语。因为当时，能够观察到这种方式的唯一地方，是在它的发源地——华盛顿盖洛德大学周围的地区，所以我决定不使用这种方式。这样就只剩一种方式有待调查了，即声觉语言方式。

声觉语言方式是由丹佛市波特·梅莫热医院语言听力服务部主任多琳·波拉克提出的，被称之为“声觉语言方式”，并建立了实验项目。而我们早已

计划在八月份全家度假，去科罗拉多探望我姐姐黛博拉和她的全家。多神奇的巧合！太妙了！

我给波特·梅莫热去电话，打听一些必要的信息，并预定好约会日期。他们寄给我一个手册和一张表格，就像我自己为海丝订的目标表一样，这张表格逐条列出了项目的目标：

使儿童学会使用残留的听力去掌握适于正常儿童的可闻信息……促进其教育和智力水平的发展……帮助避免由于无声隔离的压抑而引起的精神问题。

他（她）能够学习讲话并且语调自然、吐字清晰。

他（她）能够不通过翻译而进行交流。他（她）用听觉正常儿童的方式学习讲话，提高语言能力，而不是通过手语的方式去学习。

他（她）能和听力正常的儿童一起上正规学校，而不是进特殊学校。

他（她）具备较多较好的机会过上更正常独立的生活，而不受社会或职业的限制。

我记得自己读后将信将疑：这事好得真叫人难以相信！但如果可信……

比尔和我在丹佛对波特·梅莫热医院的访问是最令人激动，最受鼓舞的一次访问。我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参观了大量不同的矫治过程，与工作人员谈话，深入了解声觉语言方式，甚至有机会约见了多琳·波拉克本人。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与那些有听力障碍的儿童本身的接触，我们与其中若干不同年龄组的孩子会面并谈了话。如果不是亲临其境，真叫人难以想像。我们确实与这些孩子进行了交谈，他们理解我们的话，更惊人的是我们也理解他们的话。当然一些人的发音比另一些人更清楚一些，但我们可以轻松地和他们每个人交流，不用手势，不用特殊说明或是培训。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一直在为海丝寻觅的东西。

继而我又满腹疑问：我们应该怎样开始？我们要走向何方？我们能做些什么？

多琳·波拉克的同事对我们家目前为海丝所作的一切表示赞同，认为这是一个良好开端，又鼓励说作为家长这只是万里行程的第一步，前面还有千山万水在等着我们去跨越。接着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关于声觉语言方式的信息，并建议我们请受过声觉语言方式培训的语言听力专家对海丝进行专业矫治。但在整个亚拉巴马州，他们没能找出这类可推荐给我们的专家。

这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在丹佛所见到的动人心弦的一切，使我不愿因此而气馁、退缩。在波特·梅莫热医院我所相遇并与之交谈过的孩子们，为我展示了海丝的未来，他们的现在就是我对海丝的希望。不管怎样，总有一天，海丝会像他们一样开口讲话，与人们用口语交流！

当务之急是先找到一位语言矫治专家，只要能为海丝提供专业语训，不要说是声觉语言方式的医生了，无论什么语言矫治专家都行。我又一次与本地区我能想得起来的所有人进行联系。一番辛苦搜索没有白费，我终于找到了朱迪·哈珀，一名年轻的语言矫治专家，就住在多森。她听了我对目前境遇的诉说，毫不犹豫地答应教海丝。朱迪承认她在我们之前，还从未接待过任何耳聋患者，所以在失聪儿童矫治方面的经验有限。好在她并不恃才傲物，也不是那种矜持自负而不愿说“我愿意学习”的人，她是一个热情的、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专业人员。

朱迪接受了挑战，她仔细研究了我从丹佛带回来的声觉语言方式典型材

料，听取了我根据自己亲眼所见而得出的对这种方式的体会和感想，根据海丝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夏季讲习班上取得的进步，并结合她自己在语言矫治方面的培训知识和经验，决定先从简单发音开始。她鼓励海丝先像婴儿那样发音，如 b—b—b—b，d—d—d—d。进一步再模仿动物的声音—baa，moo，接着激发海丝尝试真正开口讲话的各种愿望。

那时家中没有任何宠物，因此到朱迪家进行语言训练矫治成了海丝的一大乐趣，原因之一就是能有机会看看、摸摸、玩玩哈珀的德国种小猎狗施蒂斯，海丝很喜欢这个小宠物。

事实上，在海丝艰难的语言训练矫治旅程中，第一个激动人心的里程碑，就与这个小宠物分不开。一天下午放学后，海丝突然开始对我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事，我什么也听不懂，突然间我清楚地听到一个词“狗”，于是我明白了，她正在谈那天上午在朱迪家发生的什么事。事情看去不大，我的心却激动得颤抖着。虽然海丝可能不过是说了一个在矫治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反复练习过的单词，但这是她在自发的日常“谈话”中取得的第一次“成功”。对我们来说，那个小小的“狗”就是主要突破口，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这样每周有两天，比尔在早上八点钟把海丝送到朱迪家，上将近一小时的语言训练课，课程结束后，朱迪告诉比尔当天的学习内容和回家后要做的东西，以便巩固学到的东西。然后在九点钟上班时，比尔顺路把海丝送到高原小学聋儿教育班。

我们告诉海丝的老师拉·特蕾·马歇尔，我们决定采取声觉语言方式，并解释了它的基本概念，强调了千万别对海丝打手语的重要性，说明丹佛的专家们曾反复叮咛过，如果海丝准备学习利用自己的残留听力，我们就需要教会她依靠可闻性刺激，而不是手势。虽然拉·特蕾对声觉语言方式还知之甚少，但很支持我们的想法，愿意积极配合。“你们知道班里除海丝外，还有其他六个孩子，”她说，“我会非常注意不对海丝用手语，可对其他孩子，我还得不断对他们打手势。”

“当然，”我们告诉她，“我们很理解这一点。”我们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地不成问题了。

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我们忽视了海丝的个人因素。海丝很聪明地意识到班里其他孩子是用手势交流的，于是便开始自学手语。

这不禁使人忐忑不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真该为小女儿的早慧感到欣慰与自豪。

海丝在学校学会的手势越多，就越想在家使用，也就越不想发声了。经过数月的呕心沥血，她刚刚开始试着说话，就突然对我们闭上嘴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海丝热气腾腾、满身大汗地跑进厨房，使劲拉我的胳膊，提醒我注意，当我看着她时，她做出一个“喝水”的手势。

我知道她口干舌燥，但还是敦促她，“请说‘喝水’。”

她又打了一次手势。

“不，海丝，”我告诉她，“别打手势，必须说‘喝水’！”

海丝倔强地摇着头，生气地又打了一次手势，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你别想让我听你的。”

“如果你想喝水，就必须说话，说‘喝水’！”

海丝站在那儿，气冲冲地咬着嘴唇，努力和我对视着。

“对不起，没有水。”我转回身，接着干自己的事。

我听到她走出门去的笨重脚步，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有史以来最苛刻的母亲，心中黯然自责：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女儿渴了，你竟然不给她水喝。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件小小的事儿看得如此重要呢？足足有几分钟，我在心中深深地责备着自己，可随后又反过来自审：如果海丝要学习讲话，你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要为此负责，不能放弃。

不一会儿，海丝踮着脚尖回到厨房，再次使劲拉我的胳膊，指着冰箱，嘴里说着什么，我立刻宽厚地把她的话翻译成“喝水”的意思。

这就足够了，“你想喝水？好，谢谢你能提出来。来吧，看看你想喝什么。”海丝快乐地咧嘴笑了，我明白这场激烈的小抗争过去了。

我想，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时，我就已意识到我们的选择也许是五种选择中最难的一种，实施起来会困难重重。我只能恪守哈斯博士的指教，怎样做对海丝最有益，我们就怎样作，并坚信上帝始终在引导着我们。

但我当时却未意识到，这样的冲突绝不是最后一次，今后在对海丝教育方式的选择上，我还会与自己、也会与其他人的困惑进行抗争。

## 第八章 决定、决定

我把海丝目前出现的问题打电话告诉了哈斯博士，他同意了我们的决定，让海丝退出特殊教育班。“当你决定采用声觉语言方式时，你就不必再考虑任何其他的选择，”他说，“海丝需要的是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训练。在目前这个阶段，让她待在公立学校的特殊教育项目中接触手语，会给矫治带来混乱，影响她的口语发展。”

他建议让海丝参加一个定期的学前教育项目，在班集体里她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可以受到更多的视听刺激。我们也正是这么想的。

在朱迪·哈珀的帮助下，我们努力学习、掌握、运用声觉语言方式，加强语言训练的科学系统性，减少盲目性。朱迪在教授海丝之后，又很快接收了一名一岁的耳聋小姑娘朱莉·科尔曼，也对她进行同样的语言矫治。在后来几个月的课程中，我与朱迪互教互学，共同切磋声觉语言方式，由她再转教给朱莉的母亲迪贝·科尔曼。第二年夏天，朱迪和迪贝已掌握了足够的声觉语言方面的矫治经验，于是，我们一起到丹佛参加为期一周的声觉语言方式深化培训。迪贝和我很快就掌握了这项技术的基本要点，由于我们不像朱迪那样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对更深层次的理解就受到了知识的限制。即使这样，大家还是都感到各自学到了不少有关声觉语言方式的新知识，急不可耐地想回到多森，尽快在实践中尝试一下。

我认为，对于海丝来说声觉语言方式的矫治效果是极其明显的，唯一的问题是，海丝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预想效果。

海丝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她性格外向，胆子大。每当回想海丝四、五岁时的情景，我就不由得想起我们的老邻居埃默里。那时，每当暖融融的傍晚，埃默里总喜欢饭后坐在停车坪草地的坐椅上读读书，或是看看晚报什么的。埃默里家位于沿街向下的斜坡下面，而我家在斜坡上方，这样海丝便蹬着她的黄色三轮小脚踏车，跑到直对着埃默里家的车道上。她骑着小车向坡下猛蹬，速度越来越快，直到她的两条小腿儿再也无法跟上脚蹬转动的速度，于是便抬起脚，坐在车上任车顺坡飞驰而下，摆出要全速猛撞埃默里的座椅的架式。当车驶到车道的尽头（大约四十到五十英尺的地方），海丝才突然飞快地把小方向轮向右边一扭，小车便急转拐进停车坪，嘎地一声停下来，于是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车祸”瞬间便化为一场虚惊。埃默里每当对我们说起此事时，就止不住地笑：“她头一回这么干时，我正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书，天哪，可把我吓了一跳！这小丫头却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转身又跑回坡上，再往下冲。我看她顺着斜坡冲下来，活像一辆小谢尔曼坦克。”

从此，这便成了海丝和埃默里之间常玩儿不倦的把戏。每次当她猛然刹车时，埃默里就跳起来，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海丝便乐颠颠地再玩一遍。

从此“小谢尔曼坦克”成了海丝最早的绰号之一。后来，每当我看到海丝风驰电掣的劲头冒上来时，我就叫她“谢尔曼”。

这种敢作敢为敢冒险的性格，使海丝的无声世界和冗长乏味的矫治过程不再那么沉闷抑郁。相反，这种性格使海丝的学语训练和生活充满了振奋人心的挑战。

海丝偶尔可能会像个固执任性的小姑娘，我时常对人说：“这孩子真是撞倒南墙也不回头。”在矫治过程中，朱迪很快就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海丝认定不想做某件事的时候，要想使她回头，就得进行一场意志的较量。幸亏

朱迪是一位耐心的矫治专家，她坚信，一旦我们说服了海丝，她的固执就会转化为执著的决心。在漫漫的人生征途上，海丝更需要意志和恒心。

在为海丝矫治的过程中，也需要整个家庭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配合，包括海丝的两任小姐姐，她们早就把自己当成了海丝语言矫治过程中的理所当然的伙伴儿。我记得每当朱迪的一项矫治练习完成时，就连六、七岁的梅丽莎也会郑重其事地问：“今天我们在矫治中做得怎么样？”

有时朱迪会边笑边满意地点头：“今天我们做得真不错，梅丽莎。”有时却摇摇头回答：“你看，是谁正呆呆地闲坐在一旁，看见了吗？”

当海丝不听指导或拒绝合作时，最常见的一着就是甩手而去，跑到“暂停角”罢课。一天，朱迪告诉我，家里那条与海丝彼此相亲相爱的小猎狗形影不离地追随海丝到“暂停角”，坐在她的椅子旁，情意切切地望着她。“它是如此可爱，真叫人不忍心发笑，只能赶紧想办法解决问题。”朱迪说：“我不知道海丝在说什么，她根本不想理我。但却对着小狗不停地拉狐，摆着手训斥它。”

声觉语言方式在初级阶段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教会海丝怎样利用她所听到的一切声响。帮助海丝注意捕捉声音，习惯于倾听。朱迪把一只手举起来，挡在嘴前面，问海丝：“红蜡笔在哪儿？很好！兰蜡笔在哪儿？不对！蓝色，非常好！”

有时，朱迪会播放录有日常生活中普通声音的录音带，让海丝根据录音带中的声音，如：电话铃声、狗叫、汽车喇叭声等等，从杂乱无章散放在桌上的一堆图片中拣出对应的图片来。然后让海丝重复说，电话、狗、汽车。

许多矫治是通过娱乐和游戏进行的，有些是小组玩的游戏，例如“糖果园”，玩起来就要不停地听和说。“该海丝了！”“该我了！”“黄色！”“噢，噢，快回来！”

有些活动是边听边作，比如，朱迪站在海丝身后发出指令：“请拿起绿蜡笔，在纸的下部画两个圆圈。”等等这类的练习。

这种身后发令的方法是我们进行声觉语言训练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像掩唇的作法一样，目的是使海丝残留的一点儿可怜听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海丝进行的语言训练治疗对我们所有的人说，都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每天晚上我都要把朱迪留的家庭作业做一遍，主要是重复她和海丝作过的练习。我还得从早到晚、每天反复地念叨着那些单词儿，并让海丝依照我的要求作出相应的回答，让她随着我练习发音。这种无休无止的、单调的重复，有时也使我感到疲惫，我不得不经常用在丹佛培训时听到的话来给自己打气，“如果一个词儿需要重复二十次、三十次或一百次，才能使一名听力正常的儿童理解它，学会在对话中运用它。那么对一名听力受损的孩子，就必须重复数百次、数千次。”

虽然海丝的进步缓慢而又艰难，但每当她前进很小的一步，都使我们兴奋异常、斗志倍增。真的，海丝每掌握一个新单词儿，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海丝看上去似乎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并能似像非像地发出“海丝”的发音时，大家是多么欢欣鼓舞。但紧接着，海丝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所有人的名字都叫海丝。她指着梅丽莎或斯苔希或我，说“海丝”。我们只好又一次次地纠正她，“不，不，我是‘妈妈’，她是‘斯苔希’，她是‘梅丽莎’。”

海丝终于搞清了这个概念。可“梅丽莎”的发音又成了海丝的一个新的难关，海丝总是叫她“蒙蒂”。于是有几年“蒙蒂”就成了梅丽莎的昵称。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海丝学说话中的另一个令人惊喜的突破。那天晚上，我安顿女儿们上床睡觉。当我为海丝掖好被角，并像往常那样说了“我爱你”就准备离开时，她忽然看着我，甜甜地笑着回答：“喔夫摇”（I love you：我爱你）。

顿时，一股只有母亲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温暖、令人震颤的感觉流过我的全身。两年多了，我终于从我的小女儿口中听到了这些表达内心爱意的话语。我不禁热泪盈眶，我紧紧地拥抱了海丝一下，才熄灯离去。

我们为海丝制定的长期目标是，能开口讲一点儿话，但要具备一定的听力水平，这样在她第二年满学龄入学后，就能与正常孩子一起上课，而不致步履维艰，格格不入。

那年春天，朱迪的丈夫要到另一个地方工作，他们夫妇俩准备离开多森，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激起了一阵焦虑的波澜，但它很快就被黛安娜·斯廷兰平息下来了。黛安娜是朱迪的助手，她一直在通过观察朱迪对海丝和朱莉·科尔曼的训练，学习听觉语言方式，还承担了其中的一些课程，与海丝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由她来接替朱迪，真是无可挑剔。

当然我们还是十分想念朱迪，因为她作为一名语言矫治专家，甘愿为一个根本不会说话的失聪儿童进行矫治，而且对海丝和我家极端负责，她放弃了自己的时间和我一块儿到丹佛上听觉语言方式培训课。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早已不仅仅是海丝的语言训练和矫治专家，而且是与我们有着共同梦想的挚友。

我们送给朱迪一只小小的镜框作为留念，里面镶有海丝的照片和一只小鸟的图片，上面写着：“当上帝创造世界之时，他将鸟儿赐予了我们。这样，人们就可以听到上帝爱的呼唤，这呼唤轻轻拨动着每个人的心弦。当失聪孩子的父母听到自己的孩子说出‘我爱你’时，心中同样会激起爱的震颤。我们深深地感谢您！——达芙妮·怀特斯通、比尔·怀特斯通。”

海丝五岁半开始上学前班，摆在她面前的学习语言的道路漫长而又遥远。正是那年的夏天，一个让海丝学习舞蹈的想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个念头，使它在那天一下闯入我的心间，想必这一定是上帝给我的启示。由于朱迪和黛安娜有时把播放音乐作为训练海丝听力的一种方法，于是我就想，如果让海丝参加舞蹈班，或许可以锻炼她倾听音乐旋律的变化，这样有助于她理解人们谈话中语音、语调的起伏，避免许多听力残疾的人在学话中最常见的那种平板单调的声音。

那时这个想法，即使在我自己看来都未免有些激进，但我们的新老师黛安娜却认为，值得试一试。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找一位愿意和我们一起做这一尝试的舞蹈教师。我把电话簿从头翻到尾，只找到了四家舞蹈学校，我便逐一与他们联系、前两家给我的回答一模一样。

“您好，我是达芙妮·怀特斯通，请问能否接收我的女儿参加芭蕾舞班？”

“十分欢迎！现在秋季班正在注册登记，您女儿叫什么名字？”

“海丝。”

“几岁了？”

“五岁，她很快就要上学前班了。”

“海丝以前上过什么其它舞蹈班吗？”

“没有，这是第一次。”

“没关系，我们有好几个初级班让您选择。”

“有个问题我不得不提前告诉您，海丝是个重度耳聋的孩子。”

电话那头马上寂静无声了，我不得不怀着满腹疑虑等待着，几秒钟难堪的沉默之后，电话里终于又有了声音：“这个……嗯……我们需要考虑考虑。我……嗯……不知道教务长会怎么想。我先和初级班的老师谈谈，然后再与您联系。请把您的电话和姓名再告诉我一下。”

然而从此便音信全无。

于是我给第三家学校——多森舞蹈学校打电话联系。我开始向校长特蕾西·米切尔重复以前的对话，我们有问有答地最后又轮到告诉她：“海丝是个重度耳聋的孩子。”

“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她说：“让我们试试，看会有什么结果，您需要填写一下注册表。欢迎海丝参加我们的舞蹈班。”

啊！多么鼓舞人心的回答！我终于找到了思想开放的人，她把机会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失聪儿童！已经没有必要再与第四家舞蹈学校联系了，我匆匆赶到特蕾西的舞蹈班，为海丝报了名。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有些舞蹈老师认为“让失聪儿童学习舞蹈是一种十分愚蠢可笑的想法”对我来说丝毫不觉得意外。因为我想，即使是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我的一些亲戚也会连连摇头，对我让海丝这样重度耳聋的孩子参加这种需要听力的活动满腹疑惑，会怀疑我过分想入非非。但我坚持认为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它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帮助海丝走出无声世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就要决心试一试。

这种尝试是否真正有益于海丝学说话，短期内是无法得出结论的。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笔学费没有白交，因为只过了一星期，海丝就深深地迷上了舞蹈。

她形影不离地粘着初级芭蕾舞教员帕蒂·拉特兰·理查兹。帕蒂是多森舞蹈学校的一名年轻的实习教师，她似乎生来就具有教小孩子的天赋。海丝觉得她的舞蹈课与耗时费力的语言训练矫治课截然相反，学起来趣味无穷，让人流连忘返。

很快，在海丝的所到之处，不论在家中、在院子里，还是在商店的走廊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她飞快旋转、举手投足的小小倩影。望着翩翩起舞的海丝，真叫人忍俊不禁。在她的心目中，自己已经俨然是一位响当当的芭蕾舞女主角了。

那年，我家的第二件大事是海丝要开始上学读书了。几个月来比尔和我就一直在反复讨论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是否有必要事先向学校说明一下海丝的听力问题，谈谈家长的担心和期望，以便请求校长和老师能给海丝一些特殊的关照。

但是，由于我们刚刚碰到过的一些舞蹈老师对待失聪儿童的封闭态度；加上我作为一名教师，长期以来耳闻目睹由于人们对如何实现自我的看法上所具有的局限性，从而对孩子的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些因素，使我举棋不定，很难下决心去“提醒”校方，使他们对那些我当时认为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的问题杞人忧天，做些没必要的假设推测。因此，我们事先没有去找

校长和海丝的老师谈话，而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开学的第一天，再提出海丝的失聪问题，并说明我们能够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事实证明，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做的最糟糕的决定。

好在海丝那年的班主任老师是个性格宽厚、和蔼可亲的人，她容忍了我们。但遗憾的是她说话过于轻柔，海丝很难理解，而更让人忧虑重重的是她刚刚从学校毕业，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她不仅面对着第一次踏入社会的挑战，要努力使自己适应教学工作，同时又要承受突然落在身上的教育聋儿的重担，学会在学前班正常的有声环境中教好一名失聪儿童。

这一切似乎太不公平了。对老师、对学校、对海丝都不公平。

尽管如此，海丝入学的半年中我并未意识到有什么严重问题，事后我才明白学校为什么迟迟没有与我联系。归根到底是由于我们没有开诚布公地向他们表明自己的心迹，事先没有说明海丝的失聪状况。再加上三年前，我们曾竭力敦促开办了多森的聋儿教育项目，现在却不让海丝加入这个项目，而让她和正常孩子一起上课。这样就难免使学校感到我们正处在一种拒一切他人见解于门外，我行我素的超越现实的状态中。因此，他们思前想后，不知该怎样接近我们。

后来，一月份当我接到学校的电话时，才大吃一惊，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那时我正在吉亚德中学教书，一天有人告诉我到前面的办公室接一个电话，电话是街对面吉亚德小学的校长乔安妮打来的，我认识乔安妮已经好几年了，她给海丝当过一年老师，因此从她的声音里我就可以感到她的苦恼和担忧。

“达芙妮，我很抱歉给你打这样的电话”，她说道，“今天出了一件小麻烦，我不得不打了海丝。”她接着解释说海丝怎样在卫生间声嘶力竭地尖叫哭喊，使劲跺脚。搞得老师不知所措，只好跑去找校长求援，校长对她也一筹莫展。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打了海丝的屁股，这场哭闹才总算停了下来。乔安妮继续说，“您知道，我现在的心情糟透了，我恨这类事，但是我觉得实在是别无选择了。我们不能允许海丝再次像这样地乱发脾气。”

再次？“您的意思是以前也发生过？”我问。

“这个……是的，已经有许多次了。”

“我希望与您和格伦达（海丝的老师）一起谈谈，”我说，“今天放学后怎么样？”

在和海丝的老师们碰头后，我才对海丝在学校的情况有所了解。海丝在班上的表现确实有些不成体统，有时大家都在桌旁写写画画做作业，她却想走开，跑到积木角去玩。更叫人头痛的是她的那些对抗行径，当老师想让她回到桌边时，她便怒气冲冲，把课堂搅得一蹋糊涂。

乔安妮再次表示，她打了海丝的屁股多么后悔莫及，“我感觉糟透了。这样教训完她之后，海丝抬起她那双富于表情的绿眼睛哀怨地看着我，我想她是把敞开着的心灵关上了。”

我赶紧向乔安妮表示，对她的做法和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且说明这件事决不会对海丝造成任何严重的心理伤害，知女莫如母，我劝乔安妮不要再为此事忐忑不安。

然后，我对海丝的老师说：“我真该向您道歉。我应该与您多联系，使您对海丝有更多的了解。您知道，您刚才所说的海丝在学校的那些行为表现，在家里我们也是不允许她这么做的。”

总结我们曾参加过的各类培训，先是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后来又在丹佛，每当讨论起失聪儿童的行为规范时，老师们便会给我们一条成功的简单规则：“不允许正常儿童具有的行为，也不要让它在失聪儿童身上发生！要让您的孩子完全理解明白您希望她做什么和她为什么会受到惩罚。”

我还由衷地告诉海丝的校长和老师：“您不允许其他孩子做的事，也不要允许海丝做。如果她应该受到责罚时，就不要姑息，我不会有意见。但是如果您遇到什么麻烦问题，也请及时告诉我，很抱歉，我应该早点儿把这些向您们讲清楚。另外，我并不苛求学校和老师一定得教会海丝那些正常孩子在学校应学会的一切知识，并达到其他孩子的水平。我知道由于她的听力有严重问题，有时必须给她吃小灶，我很愿意在家配合您做些辅助工作。希望能把我当成老师中的一员。”

怀着相互间的理解与信任，我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同时又为我们经过这么久才走到一起，不免感到一些遗憾。我对学校没有半点指责之意，老师们对海丝充满了同情与耐心，她们仅仅是想在海丝的失聪问题上与家长取得更多的谅解与支持。

老师们对海丝行为规范的叙述，使我不禁想起数月前在一家商店里，我自己的一次经历。那天，我推着购物车沿商店的通道慢慢走着，忽然发现身边的海丝不见了，一回头，只见她停下脚步，正从货架的低处拿起一包糖果。我告诉她把糖果放回去，她定定地站在那儿，眼睛直盯着我，目光中充满抗拒的神色。我再次说：“请把糖果放回去！”边说边向她走过去，打算加强命令口气的力度。海丝放声哭了起来，还使劲跺着脚发脾气。我紧紧抓住她的胳膊，对她说：“赶快停止！”

海丝的音调更高了，我把她的身子转过来，重重地打她的屁股，然后脸对脸地看着她说：“赶快停止，把糖果放回去。”

就在这时，一位义愤填膺的女士对我大加指责：“我要控告你虐待儿童，”她开始数落，“那可怜的孩子耳聋，你知道她听不见你说的活，不理解你的意思，你怎么还敢对她这样……”

“夫人，请原谅我不能同意您的看法，”我打断她的话，“您不了解，海丝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她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也完全理解我要她做什么。她只不过是在使小性子，不听大人的话罢了。”说完我真想再回她几句：也许你能容忍你的孩子不听话，任性耍脾气，而我却不能允许，干你自己的事去吧。不过，我最终还是把这些话咽了回去，带着尴尬和对那位多管闲事的女士的愤怒，转身离开了。

我并不生校长和老师们的的气，虽然她们的态度已明白无误地表明：由于您的女儿耳聋，我们并不指望她的行为举止与“正常”孩子一样，这和商店里那位爱管闲事的女士的态度在实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说这段时间里，有什么人办错了什么事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首先，我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其次，在学年开始时又没有与老师们充分交换意见，坦率地说明自己的想法。

那次与老师们会面后，海丝和校方的情形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几周后，当讨论海丝下学年的升级问题时，我与学校的冲突又出现了。当时我认为这可能是那次事件后，海丝在人们眼中形成的负面印像，也可能是由于海丝的进步还不足以抵消我们与校方的分歧。

在一次校长、老师和家长都参加的会议上，校方建议在下学年开学时，

海丝应仍然留在学前班。她们的理由是：

“海丝在情感方面准备不足。”

“海丝语言能力的发展不能适应一年级的要求。”

“老师很难听懂她的话。”

校方表示愿意让海丝继续试着呆在学前班中，但实际上，内心却真正希望我能让海丝退出普通班，回到聋儿教育部去。但我决不能同意这么做。

于是我又像以往无可奈何、需要人帮助的时候那样，先默默祈求上帝的指导，然后给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哈斯博士打电话，“海丝的学业又遇到了新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您给我出出主意好吗？”

## 第九章 舞蹈与戴安娜

哈斯博士问起学校不同意海丝升入一年级的原因，我说：“主要原因是她们认为海丝语言能力欠缺。”我告诉哈斯博士，过去一年来，海丝在语言矫治方面取得的进步，已经使我信心十足，但我不知道目前该如何针对学校担心的问题，据理力争并说服她们。

“请带海丝来我这儿好吗？以便对她作些测试。”哈斯博士提议，“也许我们会根据测试的结果提出些建议，在您和校方讨论问题时可能会有所帮助。”

我约好日期，很快便开车带海丝到了塔拉哈西。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测试人员对海丝作了语言、讲话、听力、心理等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测试，考虑到校方在我对海丝所抱的期望到底是否现实的问题上，一直持沉吟不决的态度，所以在征得我的同意后，测试人员还对海丝进行了非语言的智商测试。

测试的结果是毫无偏见的，其中有些令人失望，但有些却令人振奋，都是可供借鉴的。

有一名测试人员在海丝的心理测试报告中反驳我说：“孩子的母亲认为自己能理解海丝所说的90%的话。然而在测试过程中，我们认为海丝的话还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她对讲话的尝试也是有限的。”

我开始怀疑：也许由于感情上的因素，我对海丝在语言方面的进步，根本就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

综合评价说明，海丝掌握的基本常用词汇大约有225—250个。由于她的听力损失程度严重，而且仅仅进行了三年多的语言矫治，我对这样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但紧接着我又得知，一个正常的六岁孩子的平均词汇量是2500个左右——大约为海丝的十倍。测试的语言评估结果表明，在语言交流方面，海丝的接受技能（倾听能力）和表达技能（语言能力）仅仅才是二十八个孩子的水平。

我不得不承认，海丝在语言发展方面确实是远远落在了同学的后面。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海丝语言发展达到二十八个孩子的水平，这个时间几乎与我们开始对海丝进行正规语言矫治的时间一样长。如果从两年半之前海丝开始接受矫治的时间算起，计算她的语言年龄，她现在恰好达到了矫治标准，这至少说明她正在稳步前进。因此，我就用总结报告中的某些结论，聊以自慰，如：“本测试结果不能代表海丝的语言发展潜力，但在制定语言训练目标时，可作为参照。”随后测试人员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他们就海丝的语言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我想至少这是因为，他们也看到了希望的火花。

他们建议，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扩大海丝的词汇量，多训练对话技巧，同时还要特别注意提高海丝的语法。

真是任重而道远。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应该考虑教海丝学习句子结构的问题。

刚开始语言训练时，我只是把特蕾西诊所、佛罗里达大学和声觉语言方式培训班的专家们曾异口同声强调的一点，牢牢记在了心里，即：不要过分强调句子结构，最要紧的是让海丝开口说话，学会用词。这样，我后来便一门心思只顾沿着这条思路往下走，而没能注意到，在适当的时机及时调整教学方式，注意句型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当我仔细阅读记录下来的海丝常说的

句子时，才真正开始认识到了句型的重要性。比如：“学校、海丝、哭”和“海丝、感觉、不舒服”等等。由于这些句子的含义对我来说是那么一目了然，我便下意识地将这些句子按自己的理解翻译过来，就好像是海丝在说：“今天我在学校难过地哭了。”和“今天早晨我觉得不舒服。”

当我开始郑重地思考这个问题时，才认识到我经常有意无意地用这种方式，在心里精心发挥和翻译着海丝的话。比如，海丝喜欢阅读和欣赏带有舞蹈家图片的书。当她看到芭蕾舞女演员的照片时，常会指着照片简单地说：“漂亮。”她甚至根本就没打算说“芭蕾舞女演员”这几个字，而我却在自己的想像中听到了这几个字，有时我还会大声地回答海丝，“芭蕾舞女演员真漂亮”。

这对一个时刻以爱去理解孩子的母亲来说一点也不奇怪，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一直过高估计了海丝的语言发展！

海丝的非语言测试智商结果令人十分高兴，测试报告评价说：“海丝的非语言智商属于优秀范围，说明海丝是个很有智力天赋的孩子。”

另外，有关海丝教育课程设置的综合建议也特别让人振奋。“总而言之，”报告总结说，“海丝表现出她是个天资聪慧的聋儿。因此，为海丝提供最好的特殊教育手段就尤为重要，切不可轻视，这将有利于将她的高智商转化为宝贵的财富，促进她的教育和情感的成长。显然海丝在弥补感官残疾中，所作的一切都是出类拔萃的。她优越的智力天资，可以帮助她克服一个耳聋儿童，在语言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

在报告中，还针对海丝目前的教育，特别指出：“建议海丝参加正常班的学习，并在语言和阅读方面给予个别指导。”报告不仅对课程安排提出了建议，还提议通过小组活动使海丝与其他孩子建立起社会交往的氛围。同时特别告诫：“在小学期间将学习语言、对话和阅读等训练，渗透到所有的活动和科目中是非常必要的，目前的学习年龄和时机与学习本身同等重要。如果海丝在这段时期没有学会说话和语言表达，今后她很可能就不再会掌握这些技能了。”

我想，我们的方向已经明确，策略也已制定。这对海丝太重要了。

佛罗里达大学的测试报告使我们备受鼓舞，带着这个报告，哈斯博士开车和我们一同来到多森，与学校特殊教育部的主任会面，并提交了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制定的计划。在这份计划中提出，那年的春夏，我将和海丝的矫治医生黛安娜竭尽全力大大扩充海丝的词汇量。如果学校在来年秋天开学时，能把海丝安排到一年级与她的同龄人一起学习，那么我将请长假，不再教学，而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海丝的身上，对她进行急需的“语言和阅读方面的个别指导”，帮助她赶上同龄儿童。

学校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于是我领取了退職金，以便支付家用。同时打算谋取海丝的“官方”指导老师的职位。

我吸取了前年大胆放手的教训，开始与校长不断沟通，诚恳交心，我对她为海丝选定的一年级班主任多萝西·韦泽心悦诚服。多萝西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师，热情和蔼、循循善诱，具有慈母般的形像。在开学前我与她约会，向她详细介绍了海丝的情况，并商定每个星期五下午碰一次面，由多萝西向我介绍海丝一周来存在的问题和进步，以及下周的讲课计划。我们发现如果前一天晚上，我能帮助海丝预习功课，让她了解第二天老师准备讲什么，做什么，那么海丝就会驾轻就熟、比较容易地跟上班级的进度。

多萝西与我们的配合相当出色，每当班里进行拼写测验时，她就格外注意，为了让海丝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话，她尽量坐在海丝面前大声读，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在教室里来回走动。

她还认真敦促海丝佩戴聪耳训练器，这是一种用来在教室环境下，增强助听器效果的袖珍扩音系统，主要包括发送器和接收器两种元件。老师佩戴连接着麦克风的发送器，通过麦克风将声音发送到海丝戴的接收器里，再由接收器将信号传递给海丝的助听器。

我们不断完善语言训练方法，注意互相配合，经常交换意见，认真对待出现的所有问题。海丝开始对学校生活变得兴致勃勃、乐而忘返，类似学前班的那种行为也随之销声匿迹，老师们不必再为此而心绪不宁了。

晚上我自己充当海丝的指导老师，这使我能够在白天有时间，继续完成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夜校埋头苦读的研究生课程。我之所以攻读阅读专业的硕士学位，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开始上研究生班时，一直在参加 I 级阅读项目的教学工作，而且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促进海丝的语言训练大有好处。不论是从我所接触过的专家、还是所读过的有关语训的书本，处处都在强调着一句话：失聪儿童要掌握语言和阅读技能，必须面对特殊的挑战，克服异乎寻常的困难。

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我认为海丝在学校的状况似乎还不错，成绩单上都是 A 和 B。一年级春假时，我又带海丝去佛罗里达大学作了综合测试，结果说明她的综合能力在缓慢而又稳定地发展着，我愈加自信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因此，当得知海丝可以毫无争议地升入二年级时，我决定重返教室去教书。

海丝的二年级班主任老师詹妮特·萨瑟兰也是一名诲人不倦、善于琢玉的老师。她像所有经验丰富的小学老师一样，讲话一字一句、不慌不忙，吐字非常清晰，这正是海丝所需要的。她强调每个同学要树立“我们是个大家庭”的意识，她对学生们说：“在这间教室里我们要像一家人一样，彼此关心，互相照顾。”她努力把爱心和关怀之情注入到学生的心田，并教导孩子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体现在彼此的交往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对海丝的关心和照顾。

有好多次，当操场上其他班级的学生拿海丝取乐时，海丝的同学就会急忙忙赶来保护海丝，然后把发生的事报告萨瑟兰老师。在教室里，当喧闹声一大，海丝就会双手掩耳，放大嗓门声明：“我的耳朵受不了！我的耳朵受不了！”她周围的孩子们肯定会马上道歉，并赶紧用手掩住嘴，发出“嘘嘘”的声音让班里其他同学不要吵闹。

“孩子们真不愧是海丝天生的翻译，”詹妮特告诉我，“这种例子太多了，每当我看到海丝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知道她没听懂我的话时，坐在她旁边的一名孩子就已经在向她解释：‘老师的意思是……’海丝则边听边点头：‘噢，好，明白了，’并开始按我的话去做。相反，当我没理解海丝的意思时，”她禁不住笑着，“孩子们也会毫不困难地翻译给我听。”我们发现海丝的小伙伴儿比起成人来，更容易与海丝沟通，为了说明这点，詹妮特·萨瑟兰还给我讲了另一段有趣的故事。（海丝的这位二年级班主任一直在尽心竭力地，像对待其他孩子们一样地对待海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她的原因。）“我常常派学生出教室去完成一件什么小差事儿，”詹妮特回忆，“一天，海丝举手自愿出去当差，我想，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我向她交代清

楚她应该完成什么任务，就让她去了。海丝并没有如我想像的那么快就把事儿办完，但当她几分钟后返回来时，脸上绽开着骄傲满足的笑容，手里拿着的正是我想要的书。”

“那天下午放学后，在大厅里一位同事迎着我走过来说：‘今天早上，你打发那个怀特斯通小姑娘到我们班传信儿给我，你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吗？’”

‘当然明白！你觉得怎么样？’

“可她耳聋啊？”

‘这我知道！’我笑道。

‘为了搞清楚她想要什么，我可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但你还是弄明白她说什么了，是吧？’

那位老师笑了，点头道：‘没错儿，不过那是因为这孩子不拿到你要的书，就誓不罢休。她不停地说呀说呀，直到我明白为止。依我看，她是个蛮有决心的小姑娘。’”

那年，我又重新开始辅导海丝。与一年级时采取的方法类似，我先帮海丝在头一天晚上把第二天要讲的课预习一遍，课后再复习做作业，强化学习效果。与一年级最大的不同点是，这时我正在中学教书，每天晚上辅导完海丝功课，安顿她睡觉后，我还要准备第二天的中学课程。

海丝在二年级中，尽管花费了不少时间，但学业提高的幅度要远远落后于社会能力的提高。虽然她带回家的成绩单上，一直保持着A和B的好分数，但在春季二年级标准水平统考时，仍可以明显地看出海丝的语言与阅读能力和她的同学对比，相差甚远。

这一回，我不再抗拒让海丝留级的建议。我意识到在语言发展方面，海丝远远地落在她的同龄人后面。我只是暗暗祈祷，但愿海丝在重上二年级时，能够有机会迎头赶上大家。

海丝仍然在坚持学习舞蹈，这对她来说真是一种幸运。因为除此之外，她的日常生活几乎完全被艰难的功课，冗长的语言矫治训练，完成作业等等占满了，她在日复一日地用高昂的代价、异乎寻常的努力换取着一些缓慢微小的进步。

而海丝对舞蹈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它带给海丝的完完全全是一种愉悦和享受。我想海丝对学习舞蹈津津乐道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老师在班上难得要求同学们大声讲话或回答问题。因此，海丝感到自己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尤其是站在队列中翩翩起舞时，与大家融为一体，就更加不分你我了。海丝自信自己跳得与队员们不相上下，没准还会更好些。

我深深地知道仍有一些人对一名失聪儿童为什么要跳芭蕾舞，能不能跳芭蕾舞，感到百思不解、难以置信。我至今还对当时无意中听到的一段对话记忆犹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孩子们正在为一个演出会进行彩排。我独自坐在排练厅外的一排座位里，观看海丝所在的小小舞蹈队排练自己的节目。这时，从我身后飘过一阵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开始注意听。虽然没有回身看，但我确信这是两位我不认识的母亲，她们的女儿肯定也在台上跳舞。当时，两位母亲正在谈论海丝，“你知道吗？她是个聋子，什么也听不见。我简直不明白她来舞蹈班干什么。特蕾西居然接收她，这实在叫人感到丢脸。我想她准会把今晚的演出搞得一塌糊涂，把整个节目给毁了。”

当时，我真想回敬她们两句。但面对这些不经之谈，我已然学会了克制，

便沉默着没有言语。即使还没人言之凿凿地肯定舞蹈训练对矫正海丝的语音语调很有帮助（我和黛安娜是对此深信不疑的），我也决不会因为别人的说长道短，而让海丝退出芭蕾舞班。我知道学习芭蕾舞对海丝意味着什么，它在海丝眼中的价值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那是她可以完完全全展示自我、驾驭自如的东西。海丝对别人希望和要求她做的某些事，有时会置之不理；但对于她自己深深喜爱、而别人并未要求她做的事，却常常表现出锲而不舍的韧劲。

舞蹈表演也为海丝提供了一个在公众面前，一展天资的绝好机会。我的家人们——我父母、斯蒂芬妮和迈克，将从伯明翰一路驱车赶来这里，参加海丝的演出会。他们对海丝的一举一动永远是这么一副充满挚爱、大惊小怪的劲头，我敢肯定在这些“追星族”的宠爱下，海丝心中笃信自己是演出明星。这当然对增强海丝的信心很有帮助。

后来，詹妮特·萨瑟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才明白海丝对芭蕾舞情有独钟的另一个原因。詹妮特说，一天在课堂上进行小组活动时，她让孩子们描述一下他们存心调皮捣蛋、想惹自己的兄弟姐妹生气，而故意干的一件事儿。轮到海丝时，她走到教室前面，脸上挂着顽皮的笑容，对同学们说，如果她想把姐姐斯苔希和梅丽莎气得发疯，那么她就先在一边儿等待时机，当姐姐们开始津津有味地看她们心爱的电视动画片时，她就立刻跑来跑去、前前后后地在满屋子里跳舞。说着海丝还轻轻地示范转动了一下，笑着告诉大家：“我跑到电视机前跳舞，把她们气得乱喊乱叫，直发疯。”

听着詹妮特的故事，我不禁哑然失笑。海丝玩的这个小花招儿，我早已屡见不鲜了。但我从来没意识到，这是海丝故意逗姐姐们生气的把戏，而是一直认为海丝正在全神贯注于她的舞蹈练习之中，全然忘记了姐姐们正在做什么，所以对她们的大喊大叫熟视无睹。姐姐们只是徒劳地冲海丝嚷嚷着：“海丝，躲开！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是美国小姐，还是什么大明星？”

事实上，海丝对舞蹈的迷恋，带给她的好处绝不仅仅局限于增强了她的自尊自信，和多了一种逗姐姐们生气的灵丹妙药，而且还是促进她语言发展的一种动力。我把凡是自己能找到的所有与舞蹈和芭蕾沾点边的书，统统查了一遍，用这些书作为阅读练习和对话训练的素材。海丝对涉及舞蹈的读物和对话永远是百读不倦，百谈不厌的。

当时，正逢报纸、广播、电视把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小姐之间的浪漫传奇宣传得沸沸扬扬，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海丝对戴安娜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每次去商店购物，凡是封皮上带有戴安娜照片的杂志、书刊或其他小物件，我只能依海丝的心愿买下，否则别想打道回府。1981年7月29日，在海丝的执意要求下，像世界上千千万万亲英派和绝望的浪漫家们一样，我和三个女儿破天荒地在清晨四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看电视转播的英国皇家婚礼。

我们惊叹、欣赏着皇家婚礼富丽堂皇的盛大场面，海丝显得格外入迷。海丝平时并不很爱看电视，可那天早上她却一连数小时坐在电视前，从头到尾看完了整个盛典。

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海丝对这对皇家夫妇，尤其是对戴安娜依然心醉神迷。于是我们便抓住这个热点，编选了形形色色的有利于阅读、语言发展、语言训练矫治方面的材料。我们还买了一本关于皇家婚典的画册，把杂志上的文章、照片都剪下来，专门为海丝粘贴了一本关于戴安娜王妃的剪贴

簿。我们一起逐字逐句的细读这些材料，我问：“这张照片儿里是谁？戴安娜王妃。她头上戴的是什麼？王冠。仔细看，这是王冠呢，还是头饰？快看戴安娜的华丽服装！你会说‘圆点儿花纹衣服’吗？在这张照片儿里戴安娜正在做什么？”

有时，我甚至利用海丝对戴安娜王妃的着迷，鼓励她写作。要海丝写作更是困难重重，她写的句子往往支离破碎，像说话一样常常缺少形容词、介词、代词，看去就像一篇草草写就的速记。由于运用语言仍是海丝的主要问题，我们便千方百计把学习语言搞得更加有声有色、引人入胜。

海丝上二年级了，级任老师仍是詹妮特·萨瑟兰。我们想如果海丝要在新的班级里交朋友，至少应该熟悉自己的老师。然而，有些事还是与一年级时不太相同了，例如：有时不得不让海丝离开班级，由新的聋儿教育专家贝思·道林更多地对她进行个别辅导。

那年，由于海丝对事物的记忆力很强，她的数学成绩仍然保持高分，其它诸如科技之类的科目也相当不错。但在学年结束，参加标准统考时，海丝阅读部分的分数比上年要低，然而，并没有人再建议让海丝留级。尽管如此，海丝在语言方面微乎其微的进步，使我越来越担忧。

## 第十章 决心与疑虑

海丝在吉尔达小学上学时，那里只有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全多森的人都称它为“小吉尔达”。上三年级时，海丝只能转到附近的威尔逊小学读书，我又必须事先到威尔逊小学与跟海丝教学有关的管理人员和教师联系，介绍海丝的情况，我们的目的和对她的期望。

直到这时，我才有所察觉，由于我以前为海丝的学业所做的一切，已使自己在多森学校教育系统中“小有名气”。

显然，有些人可能把我看成是一位我行我素、期望值过高的家长。如果真是如此，我也丝毫不会介意的。

每次与学校打交道时，我总是极力使自己的言行周到、礼貌、得体。作为一名教师，我处处要求自己站在“海丝的老师”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并严格按照学校章程办事。我真的“不好相处”和“期望过高”吗？我不知道，或许有时如此吧。但我更愿意称自己是“决心大”。我是坚定不移地“决心”要使海丝得到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学校取得成功。即使这样做，有时难免会引起麻烦，或是被误解，我也必须坚持到底。

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的期望值过高，对海丝催促得太紧。后来我发现学校教育系统也有人觉得我不现实，说什么：“达芙妮总是自作主张，她心中甚至没想清楚怎样对海丝才是最好的选择，真叫人遗憾。”

事实上，这些人根本没有与海丝朝夕相处，没有日日夜夜地为海丝操劳，她们绝对不会体会到、也不会看到海丝是怎样自律自强的，也不会理解在海丝的内心深处，是怎样的渴望自己能够 and 所有正常人一样，尤其是和姐姐们一样。在海丝的心目中，她希望能够像大家一样生活，带回家同样的写着 A 的成绩单，取得父母期待的像斯苔希和梅丽莎那样的高标准和好成绩，海丝把这些看得比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重要。

到了三年级，海丝在语言方面与同学们的差距越来越显著，甚至连海丝本人也体会到了这一点，而最让我担心忧虑的是海丝开始为此事烦恼了。

1982 年秋，我被提名作为学校的教师代表，参加一个有关“学习模式”的专题研讨班。全美知名的教育家和儿童“焦点”杂志的编辑沃尔特·巴布博士来多森主持研讨会，对利用“视觉”、“听觉”、“动觉”以及“混合感觉”等不同学习模式的学生之间的差别进行了研讨。这些讨论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他把我作为典型的“视觉学习”的范例，直接从小组里挑选出来加以介绍，使我感受很深。因此，在会间休息时，我不断找机会与他谈有关海丝的问题。

我向巴布博士匆匆简单介绍了海丝的经历，并说明一直让我们忧心忡忡的就是海丝在语言和阅读方面的困难，以及近来学校里一些使我非常不愉快的事。尽管我带海丝最近又到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作了检测，检测报告中建议，将海丝从以语音为基础的阅读科目，转换为以“意图为基础”的阅读课程，但学校对这个建议置若罔闻，仍坚持让海丝采用在多森学校系统内使用的霍顿·米夫林系列阅读课。

我向巴布博士抱怨这件事，希望这位受人崇拜、对各种学习方式有全面了解的先生，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说：“所有的人都明白，耳聋的人是不能学习语音学的！”

巴布博士盯视了我几秒钟，很快回答说：“如果您女儿不能学习语音学，

您怎么可能希望她熟练地阅读呢？”

我想显然他没理解我的意思，“巴布博士，”我又说，“也许您没听清我的话：海丝是重度耳聋患儿。”

巴布博士温和地笑着，摇摇头：“不，是您没听清我的话，您可以用其他方式学习‘倾听’。您为什么一定认为，只有通过听觉神经捕捉声音的方式，才是孩子学习语音的唯一方法呢？其实有些阅读课程是利用其他方式增强语音概念的。”

他描述了一些他本人认为对非听觉学习者最有效的阅读方法，其中的贝卡和阿尔夫提姆是我熟悉的两种方法。

的确，每当看到某些人想试着让海丝做些什么，我就情不自禁地惴惴不安，认为由于海丝失聪，对有些东西是无法学习掌握的。但听了巴布博士的话，我如同受到了责备一样，为自己的这种下意识感到惭愧内疚。

最后，我决定选择贝卡课程，希望通过它的视觉方法和对韵律的记忆来教授海丝语音的声调，也许这样的方法更适合于海丝。我问学校的有关方面能否把贝卡阅读课包括到海丝的特殊教育计划中，校方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由于贝卡课文中含有明确的基督教教义，在讲授道德概念时，甚至引用了圣经资料，所以不适合在多森的公立学校中使用。即使在海丝的课外特殊教育个别辅导的教学中，作为一部分辅导教材也是不行的。

我的建议再次受挫，但这次我也绝不能循规蹈矩地按照这种僵死刻板的规章去做。我终于打听到多森有一所私立教会学校可以使用贝卡教材，于是我马上开始紧张地查询，我找到一位那里的老师，她同意在课后使用贝卡教材辅导海丝上阅读课。

现在怎样将这项新增的辅导内容插到日常生活、学习的时间安排表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即使有比尔帮助我分担一些家务，有时许多事还是被搞得颠三倒四、一塌糊涂。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开车接上三个女儿，送海丝去参加语言训练矫治或去上贝卡辅导课。然后，利用在外面等海丝的功夫，打开家用小客车的后门，临时凑合搭个小桌子，腾出一块儿地方，让两个大女儿做家庭作业。梅丽莎和斯苔希很明白，如果她们需要我来辅导她们做功课，只有现在是唯一可利用的大好时光了。因为晚饭后我的分分秒秒都要用在海丝身上，如海丝的语言训练矫治、家庭作业，而当前更重要的是贝卡辅导课。有时我们练习到很晚，海丝直到十点或十点半才能上床睡觉，而我在清晨五点前还必须把她喊起来，再温习一遍要听写测验的单词。

除了使女儿们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外，海丝的定期芭蕾舞班也是放在第一位必需保证的内容（我当然不会让她半途而废），再加上三个女儿要参加的各种其他类型的活动，如：参加童子军、去教堂、学体操等等，唯一留下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或备课的时间，就是在女儿们和比尔上床进入梦乡的深夜或是清晨两三点钟的时候。常此以往，家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早上他们常常会发现我颓然倒在长沙发上睡着，或展开四肢随意地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周围杂乱无章地摊着学校的课本和打瞌睡时正在批改的作业。

虽然生活使人精疲力竭、忙乱不堪，但决不会是一无所获、索然无味的。特别是到了夏天，我和女儿们可以从紧张的学习中调剂一下生活，搞些娱乐活动。巴拿马海湾从来就是大家宠爱的周末度假胜地。女儿们和比尔常乘坐一艘家里买的半新不旧的小船儿，在海湾的万里烟波中开怀畅游。我们的另一个年度快乐热点就是横跨国土的旅行，每年八月我和女儿们都要到丹佛去

看望我妹妹和她的家人。由于我妹妹也有三个女儿，年岁都和海丝她们不相上下，几个孩子碰到一起就可以尽情玩乐，又唱又跳。整整一年，三个女儿都在翘首盼望着与表姐妹们欢聚一堂的日子，盘算着怎么搞些惊险刺激的冒险活动，比如：徒步在山岩上行走，乘船在湍急的河水中顺流而下等等。

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也会有一些宁静的间隙。就在这短短的间歇中，有时也同样能发现真正令人激动的时刻。像许多残疾孩子的家长一样，我曾亲身感受过一些微乎其微的小事所产生的最动人心魄的力量。海丝终于第一次清晰地、完整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海丝·怀特斯通”的时刻，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六年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反反复复地问着：“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电话号码是多少？”六年来，一个可怕的恶梦一直笼罩在全家人的心头，大家天天提心吊胆，生怕海丝一旦走失，没人会知道她是谁，住在什么地方。但当海丝终于能够说出“怀特斯通”，并完整地发出中间夹着的那两个绕口的“ ”音时，大家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怎能不叫人由衷地高兴呢。

但遗憾的事也时有发生，海丝在语言矫治方面所取得的缓慢而稳定的进步，以及在贝卡阅读系列课程上的进展，都没能与海丝的常规课堂教学结合在一起。

海丝继续带回家标着 A 和 B 的成绩单，甚至阅读和英文成绩也很不错。开始我认为这当然包含着鼓励的意思。然而，后来我们认识到这些分数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出海丝的真正学习水平。确切地说，这些成绩真正反映的只不过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失聪小女孩儿怎样轻而易举地、不自觉地迷惑住了公共教育的成绩评价方式。这时的海丝已经成为阅读形体语的专家了，她能够及时捕捉到各类可见的提示，不论老师交给海丝什么课堂练习，海丝都能用她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它。她慢慢地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仔细观察老师对她的每个动作的反应。一个微笑或一个轻轻的点头，都可能意味着她的思路正确与否，或意味着她必须对下一个问题要格外小心。尽管海丝有几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对学习语言极为有利，但她需要记的东西千千万万不可胜数，如果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学过的词语之间有什么相互联系，不了解它们之间形形色色的细微的差别，那么就会给学习带来难以想像的困难。

1983 至 1984 年在海丝上四年级期间，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与海丝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大多数孩子，已开始体验友谊的魅力，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与伙伴间的相互影响，而不是与父母的接触，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十岁或十一岁时，一些小女孩开始意识到男孩子的存在，并与他们结伴一起出出进进，就连与海丝从二年级起就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克劳迪娅也不例外。这不免使海丝感到有些孤单，她比从前更深地体会到自己与其他孩子间的差别。而这个时期也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孩子们正在开始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所有这些因素都同时影响着海丝的生活。

有一件事，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万箭攒心般的痛苦。一天，已经上四年级的海丝从学校哭着回到家。

“怎么了，宝贝儿？”我当然很不放心。

“男孩子不喜欢我，不想和我做朋友，”她抽抽噎噎地哭着说，“因为海丝不一样，海丝听不见。”

多少年来，我已知道这事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但我心里还是感到难以承

受。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教给海丝所有的儿童心理学课程，帮助她学会在挫折面前处之泰然，并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日出，走出逆境。十一岁左右的孩子出奇地调皮捣蛋，常常会干出伤害人的事。我们要像面对生活中所有其他挑战一样，也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但我明白现在无论什么也无法减轻海丝心中的孤独与痛苦。

“要知道，海丝，”我对她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是完全一样的，你班里的每个孩子也不一样。上帝使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做到十全十美，世界上有史以来唯一尽善尽美的人就是基督。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有残疾或缺陷。有些人的残疾或缺陷看起来比别人更明显些。比如，你听不见，有的人却看不见，还有些人腿瘸不能跑。但我们中有许多人的残疾或缺陷是别人看不见的。比如，我们也许会害羞、胆子小、也许会自私自利、对别人缺少爱心、刻薄吝啬、或许我们对自己感到不满意。如果你们班里有人仅仅由于你听不见，就不喜欢你，不想和你做朋友，这正表明了他们的残疾之处。这种残疾，比起不能像常人一样听见声音的那种缺陷，更加严重。”

我不知道我那天的话是否能使海丝感到安慰，使她豁然开朗，但只希望海丝当时能够听懂我的大概意思。我在心中默默地祈求上帝，通过对海丝的爱，使她无忧无虑，相信自身的价值。

那年让人称心如意的是，海丝的四年级班主任玛丽·安·霍恩比是我的老朋友，她不仅关心海丝，而且珍视、理解、认同我的一切努力。但玛丽·安的细致入微的关心也没能转变海丝忧郁、孤独的心情，她似乎已不再是个像从前一样幸福快乐的小姑娘了。

也许是成年累月、从早到晚紧张地学习、生活产生的反面影响，日复一日地在海丝的精神上造成了创伤；也许是由于海丝在学校已竭尽全力，克服重重困难努力紧跟四年级的阅读课，可同时却只能读一年级的贝卡系列读物，使她感到灰心丧气；也许只不过是因种种不顺利的事情凑到了一起，使海丝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确实远远地落在同学们的后面了，因此认为她自己格外地“与众不同”。不管什么原因，我都能感觉到海丝的受挫失意感正在迅速地膨胀起来。

而这时，学校又再次对我们施加压力，提醒我们，现在正是应该重新考虑是否采用聋儿教育项目的时候了。新的耳聋教育专家贝思·道林推崇提示法，就像我偏宠听觉语言方式一样，她对自己的选择也是坚信不疑的。我喜欢并尊重贝思，她在课外教授海丝时，也很尊重我们不使用手势的愿望。但是我知道，她心里认为，如果我们能改变让海丝回归有声世界的想法，使她有机会尝试一下，把提示法教学作为海丝日常语言矫治的一部分特殊教育内容，她一定能够帮助海丝取得长足的进步。

我突然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可坚守阵地的决心却毫不动摇。

决定性的时刻终于来了。一天，海丝放学回家时手里拿着一本书，我猜想那是她从图书馆借的。（后来我曾怀疑是有人故意借给海丝的，不过，以后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海丝，这是从图书馆借的一本新书吗？”我们经常一块儿谈论正在读的书，这是一种极其自然、对话式的学习语言的练习。

海丝热切地把书拿给我看，这是一本画册，里面描述的是一个小女孩儿的故事。“她像我一样，”海丝指着书说，“她也听不见。”

“这是一个关于耳聋小女孩儿的故事吗？”

“是的，她还能像我一样跳舞呢。”

“真的，我看见了，她正在练习芭蕾。”她确实和海丝一样，我明白了，海丝为什么对这本书这么爱不释手。

海丝翻着书页：“但是她在聋儿特殊学校，在那里学习的全是耳聋的孩子。”

我点头表示理解：“她上了聋儿特殊学校，是吗？”

海丝点点头，然后看着我说：“海丝也要上特殊学校。”

“噢，不行，海丝，”我郑重其事地说，“你没有必要非得上聋儿特殊学校，你能上普通学校，回家和梅丽莎、斯苔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如果你到很远的特殊学校去，妈妈会很想你的。”

海丝的眼里流露出一丝失望，使我下意识地产生一阵不大不小的恐慌。

从一开始，所有的人就都对我说声觉语言方式是难度最大、进展最慢的教育方式。海丝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决心，不屈不挠地坚持了八年艰苦的声觉语言训练，我也因此而感到欣慰，深受鼓舞。可现在一旦她自己想放弃，坚持下去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

这时我还是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上帝一直在引导着我们——从汉佛莱斯博士到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从丹佛的多琳·波拉克到巴布博士的学习模式研讨班。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又有些疑虑而担忧消沉起来。

现在甚至连海丝也认为她该上特殊学校。如果真是我错了那该怎么办？

## 第十一章 特殊学校

我再次给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比尔·哈斯博士打电话，因为他已经几次来多森森森森与校方谈海丝的问题，所以他对我说：“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我的朋友格拉迪斯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帮助。让我先与她联系一下，再告诉你。”

我很快与格拉迪斯·克劳福德见了面，她是位聋儿口语教育的倡导人，曾是佛罗里达州聋儿教育部的协调顾问，也是位听力残疾儿子的母亲。当她听了哈斯博士对海丝的简短介绍后，认为首先应该对海丝进行一次彻底的聋儿口语教育专门检查，然后再决定是否改变海丝的课程。她建议我们带海丝到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聋儿中心学校去，这是一所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学校。

哈斯博士把格拉迪斯的建议转告给了我们，并让我们放心：“聋儿中心学校的检测评价，既科学严谨，又直截了当令人信服。他们名闻遐迩，没有必要一定得去迎合什么人，他们会非常坦诚地告诉您海丝的情况。如果他们认为海丝在聋儿口语教育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需要改变教育方案和学习目标，那么，他们就会及时与您商量的。但这所学校没采用声觉语言方式，教师是聋儿口语教育专家，对聋儿口语教育的利弊了如指掌。我和格拉迪斯都认为他们可以向您提供最好的咨询，告诉您当前海丝在教育方面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我立即与聋儿中心学校联系，并与校长琼·穆格博士预约带海丝去圣·路易斯作检测的时间，“我们想请您对她的未来教育方式进行评价，提出指导。但我们对上专门学校的事目前还未认真考虑，”我解释着，“只是出于好奇，想打听一下，如果送孩子上您的学校，费用是多少？”

校长告诉我，每年学费五千五百美元，食宿四千美元，这样一名寄宿生每年的总费用是九千五百美元。我挂断电话，吃惊地摇着头，对同事说：“我们根本承担不起！”

比尔的反应也一样：“我们永远也付不起的，达芙妮。带海丝去圣·路易斯作测试毫无问题，可要是入学，我们做不到！绝对做不到！”

但我心中十分清楚，海丝的想法却与我们截然不同。虽然我们一再向她解释，这次是去作检测的，目的是想了解采取哪种教育方式更适合于她，可海丝却痴迷不悟，认为我们要去看一所书里写的那样的“特殊学校”。“海丝要去特殊学校”，她坚持着，我们也就尽量克制着只字不提这次出行的目的。去圣·路易斯的路上，海丝坐在车里异常兴奋，我和比尔只好决定，稍后再向她点破真实情况。

到了圣·路易斯，我们毫不费事地就在城里找到了聋儿中心学校的“校园”，它的主楼是一座四层的跨街砖楼，属于巴纳斯综合医院的一部分。明天一早就要开始测试了。我们全家马上安顿好住处，抓紧时间在校园里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熟悉周围的环境。

作为一名职业教育工作者，我不得不承认在校园中的所见所闻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每件事都考虑得周周到到，安排得井井有条。班级很小，许多班里每位老师只带三、四名学生，每个学生部有自己独立的教学计划。老师按照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分门别类，因材施教。比如，一个学生的语文可能正在用三年级的课本，算术却已达到五年级的水平。聋儿中心学校并不呆板

地执行某个特定的课程表，他们采用多种灵活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

从学校给我的第一印像，我不禁遐想：如果我要送孩子上寄宿学校的话，我就得选择这样的学校。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测试结果能够有利于继续采用听觉语言方式，以便回到多森后解决海丝的教育问题。

这些希望很快就被击碎了。

早上，一名工作人员过来陪海丝去测试，另一名领斯苔希和梅丽莎去参加其他活动，比尔和我则被引到测试室隔壁一个小观察间里。多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观察给海丝测试的全部过程，我俩全神贯注地看着，越看越觉得苦恼。

声学测试不出所料，和以前见过的没有两样，测试结果也和从前一致，不觉有什么意外。

但使我和比尔难以置信的是各种口头的和语言方面的测试结果，如果不是通过双向镜亲自观察，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当海丝做出一个接一个的错误答案时，我的心也随着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沉，插空撇了一眼身边的比尔，只见他低头把脸埋在双手里，悲伤地摇着头。不容质疑，海丝的教育水平明显地欠缺。

欠缺多少？明天测试报告一出来就知道了。

使我更觉忧虑的是，测试人员给海丝一张画着一些熏猪肉条的画片，海丝却叫它们“猪”。我心中自我安慰着：也有道理呀，熏肉不就是来自于猪吗？但当十一岁的小女儿不知道“熏”字，不会说太阳从“西边”落下去，不能真正正确回答这样一类对于其他同龄孩子来说极为简单的问题时，我心中自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我坐在那儿观察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小小观察间的四堵墙在向我渐渐压过来，越压越紧。我的内心世界完全崩溃了，我开始问自己：现在怎么办？我们回多森后要重新开始吗？我们必须得让海丝上普通聋儿班，学习手语吗？现在补救是否来得及？我是否由于对女儿的期望值过高，而对她的体谅得不够？这到底会造成多大损失？

那晚，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观察结果仍然震撼着比尔和我的心。可海丝却乐得像过圣诞节的孩子，聋儿中心学校的每一件事，都令她兴奋不已，她确信：“我就要上这个学校了，海丝喜欢特殊学校。”两位小姐姐也同样为此兴高采烈，叽叽喳喳地告诉海丝，她们下午在屋顶操场与实习医生和同学们玩的各种游戏，以及其他种种有趣的事情。

女儿们兴致勃勃边谈边看着电视，而我和比尔却茫然地坐在床边，互相询问着“现在该怎么办？”谁也不知答案在哪里。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几乎彻夜未眠，就像一个被宣判有罪、畏惧黎明到来的囚犯一样。明天，测试就会结束，我们将要到办公室听取正式的结果，并接受指导，但我心中已经非常清楚最后的判决会是什么。

在作出结论前，还有几个测试要做，还有一些设施要参观。我们到街对面看了高年级寄宿生的宿舍；在餐厅和学生一块儿吃了午饭；观摩了一节体育课，有两个小孩子演示爬绳训练，他们顺着体育馆屋顶吊下的绳子熟练地攀上攀下，令旁观的人赞不绝口。在体育部参观时，使我不禁点头感叹：学校并没有把这些孩子当作残疾人，对他们的要求是严格的。这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像。

然而，最令人感慨万分的是聋儿中心学校那些年龄最小的孩子们，他们只有两三岁大，其中一些就住在主楼的幼儿班里。他们在一块儿上课，接受矫治，通过唇读学习讲话。尽管有中心学校的老师在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这些幼小的孩子，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像那些不得不过这么小的孩子住校的家长们，会多么揪心难过。我想我做不到。可也许我应当如此，如果当初我不是铁了心似地让海丝待在家中，也许就不会陷入今天这般尴尬的境地。

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每个班级把无论是语文、算术或是科技以及所有的活动（从吃午饭到宿舍的内务）都看作是学习语言的大课堂。如果一位算术老师提问“6乘7等于几？”同学绝不能简单地答“42”，也不能回答“等于42”，而应该回答“答案等于42”。吃饭时，学生若想放盐和胡椒，必须说：“请把盐和胡椒递给我”，不允许只说“盐、胡椒！”

学校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促使学生练习讲话，帮助他们尽可能做到吐字清晰、音调准确、句子完整。不仅是教师，包括宿舍的护理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强化这一学习语言的环境。我明白这样的环境将会极大地促进语言的发展，如果海丝能很早就开始接受这样的教育该多好。天啊，我犯了多少错误啊！

宣告最后测试结果的时候终于到了。所有进行检测的人员都来到校长办公室，汇报各自的结果。声学检测结果和从前的结论几乎一模一样，但声学检测专家提出一项新建议，因为海丝的最佳听觉感官和对语言的知觉来自于左耳，所以她不自觉地倾向于使用左耳而不是双耳，专家便建议只对左耳加放大器。这样我们就只需要一个助听器了。

其它测试结果还表明，海丝在口语水平和交流能力上存在极大的差距。最叫人忧心如焚的是语言表达测试结果，这个测试是用来测量使用语言的综合能力的，结果表明：与其他听力正常的五岁儿童相比，海丝只达到一个百分点，即如果让听力正常的五岁儿童作相同的测试，那么有99%的孩子都会比海丝的成绩好。可想而知，在四年级教室里她该会多么灰心丧气！可以想像她会感到多么落落寡合！

当听到关于海丝的书面语言表达的结果时，我的心更是痛苦地缩紧了，报告列举出一些病句：

他们在古老的其他土地上发现了一个动物群。

他们在外面不好，没食物，小姑娘和肮脏。

他们远离了这个古老的土地。

动务（物）喜欢他，因为他们很有帮助，但他们飞（非）常喜欢外面。

鸭子水（在水里）游泳，一根草是绿的。

其他测试人员陆续完成了各自的汇报，并说随后还要递交文字报告，然后便全部离开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校长琼·穆格做最后的总结。她再次肯定了海丝的非语言智商“在优秀范围内”，但阅读能力只有二年级的水平，综合成绩达到“三年级零四个月”。虽然她的语言技能处在同年龄组的听力障碍儿童的正常值范围内，但“远远滞后于听力正常的五岁儿童”。

她继续说道，由于海丝的语言、阅读和综合能力均没有达到她目前所在的常规学校四年级的水平，因此“我建议您一定要改变海丝现在的教育方案”。

问题终于这样提出来了。

比尔插话说：“看了昨天的那些测试，我们真担心海丝还能不能赶上来，

看样子，她差得太远了！”

“不，不！”琼·穆格回答，“您绝对别这么想！”

顿时，我感到心中荡漾起一丝微弱的希望，“这么说，您觉得海丝确实具有口语对话的能力？”

“是的。”她毫不犹豫地肯定说。

“您不准备建议让海丝改学提示语或手语吧？”

“噢，不！”她立即回答。

这比我想像的要好些：“但她的语言和综合成绩不是差得很多吗？我们该怎么办？怎么使她赶上来？”

校长让我们不要着急，告诉我们几个星期之内测试评价报告就会寄到我们手中，里面会有包括测试人员提出的许多详细建议。她指出海丝目前最需要的是强化语言训练，应该实施一个全天二十四小时都不放松的语言训练和对话的教育方案。并补充说，她认为让海丝和语言技能相近的孩子们在一起十分关键。她还告诉我们，学校可以考虑把海丝作为重点候选生，安插到聋儿中心学校学习。她深信学校的教育方法肯定会使海丝在学业上有所成就，追回失去的时间，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海丝能够在学习上重新回归主流。

我和比尔担心，我们没有足够的学费让海丝住校学习。虽然我俩都有较好的职业，并且工作很努力，但还有两个女儿需要抚养，所以根本无法每年为海丝支付九千五百美元，让海丝住校学习。

穆格博士说，秋季学期即将来临，虽然时间显得稍稍紧迫些，但她会尽快联系，按有关规定申请一些奖学金，根据海丝的情况，这类奖学金大约为三、四千美元。

她建议我们回多森后咨询一下，看本地学区能否为海丝提供一些资助。因为聋儿中心学校的有些学生，由于当地无法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州教育部门就为他们支付了全额学费，送他们到中心学校学习。

校长提醒我们，时间有限，如果我们准备让海丝在秋季入学，就应该尽快填写申请表。

比尔仍认为希望渺茫，而我的希望虽然在第一天测试的时候几乎被摧毁，但几天来在学校耳闻目睹的桩桩件件事情，使这些希望又重新燃起了夏苏的火苗。也许，仅仅是也许，我们八年来历尽的风风雨雨、不辞劳苦追求的目标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也许，海丝将会回归主流社会，在语言交流的有声世界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因此，不论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海丝得远离父母到学校寄宿，我心理上也将有所准备，不会断然拒绝的。

如果我犹豫不定，海丝本人也会促使我下决心的。海丝坚定不移地认为，“这就是我要上的学校，”回家时，海丝一路上都在说，“我需要特殊学校，我喜欢特殊学校，学校里的人好，像在家里一样。”

当比尔对住校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时，海丝便恳求爸爸：“爸爸！求求您！我想去那儿！”

梅丽莎和斯苔希在一旁为妹妹帮腔：“那是一所好学校。”我没有为比尔撑腰，比尔肯定感觉到了我的迟疑不定，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正在发生着变化。

在我们长途跋涉，即将回到多森时，比尔已经答应利用他和他父亲在政界的关系，争取从州教育部门得到资助，“我们会……”这就是他在此刻的

全部回答。但对海丝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她开始向她的所有朋友宣布：“明年我要上特殊学校了。”依海丝之见，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我们与当地和州的有关部门初次联系后，很受鼓舞。一些官员看了聋儿中心学校的建议后，开始协商是否能够由州和当地有关部门联合提供资助。一切虽然还没有最后结果，但我们认为已稳操胜券了，于是便答应在秋季学期开始时让海丝转到聋儿中心学校学习。

到了七月份，我们得知那边的学区收到了我们州里的信，表示州有关部门没有这笔经费。而在多森，早已为寄宿在当地公立学校系统的学生投入了特殊教育经费，看来我们这里当地的官员也不会讨论是否为一个外州的聋儿中心学校付费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局势，我们赶紧与哈斯博士的朋友格拉迪斯商量，她告诉我们，公法第94—142条中专门规定有家长的权利，家长有权要求学区必须为本区内每个学生提供适当的教育方案。她建议我们拿着聋儿中心学校写给当地学区官员的书面建议，问有关部门能否为海丝提供可以满足这些条件的教育方案。如果他们说能，当然是再好不过了，那么海丝就将得到我们所希望的学习条件；如果他们说无法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可以依法要求他们资助海丝到聋儿中心学校学习。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没有任何人出面回答到底能不能为海丝提供满足这些条件的教学方案。七月底，我们总算与校方的官员们见面了，他们只是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研究这些方案，只字未提实质性的问题。显然，他们不过是用冠冕堂皇的言词在拖延时间，我和比尔先是垂头丧气，继而又心烦意乱。夏天转瞬将逝，一切依然渺无音信。到了八月份，比尔对当地学校的推诿躲闪，已感到忍无可忍了，于是同意先把海丝送到聋儿中心学校，然后要求法律申诉，或者采取其他不论什么方式以促使校方提供资助。

我们十一岁的女儿就要离家整整一年，寄宿到学校去了。全家人手忙脚乱地作着准备，在不知不觉中耗去了夏季的最后几周时间。我兴致勃勃地带海丝去买生活用品，如窗帘、衣服等，还有洗发香波、香皂、牙膏之类的日用品。梅丽莎、斯苔希和斯蒂芳妮七嘴八舌地帮海丝决定带什么玩具和动物布玩偶。（学校鼓励孩子们带东西，以便形成一种在校如家的气氛。）海丝欢天喜地的情绪抹去了所有人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甚至减轻了我作为母亲的担忧和挂念。

那年秋天，两个大女儿未能随我们去圣·路易斯，因为我们的家用小客车被海丝的用品塞得满满当当，已经没有空余的地方载人了。

尽管几周来，我们一直在十分紧张地筹划、采购、打包，但坐在车上，随着车轮不停地向北滚动，我仍然觉得对可能发生的事，考虑不周，准备不充足。我心潮起伏，大多数家长可以在家中和孩子一起生活十七八年，然后才送他们去住校，可我的小女儿只与我们一起生活了十一年。我只觉得千言万语哽在心头，不知从何说起。

车窗外，路碑飞快地向后闪过。

车里，我和比尔对海丝反反复复地念叨着：不要想家，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会写信给你，你也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感恩节就能回家团聚等等。我知道海丝早已明白，可还是不厌其烦地说了又说，是为了安慰海丝，更为的是化解自己的牵肠挂肚、难舍难分之情。

事实上，海丝对新生活充满天真烂漫的新奇感和美好憧憬，心中的激动

与兴奋溢于言表。而我却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让人怎么能舍得离开自己的小女儿？海丝生了病，夜晚谁会在床前拉着她的小手，用冰毛巾为她擦额头？她将向谁倾诉心里的话？当她的感情受到伤害时，谁会来拥抱她？

车行至肯塔基的潘杜凯附近时，引擎箱爆出一声巨响，把我从忧思中拉了回来，比尔赶紧把车开到路边，使劲踩下刹车，一大团黑色浓烟从车下翻滚而出，把我们的视线完全遮住了。“可能是散热管爆了。”比尔边说边和我们一起手忙脚乱往车外跑。

我刚脱身关上车门，就发现海丝已经跳过了路渠，爬到了附近的护堤顶上。她手里抱着心爱的绒毛布熊，站在那儿拼命向我们招手，让我们赶紧离开车。

“我以为汽车要爆炸了”，她解释说。我们乐不可支地逗着海丝：你把父母丢在即将爆炸的汽车旁，让这对可怜人儿抱头鼠窜，狼狈逃命。于是这段惊险场面就成了剩余旅途的话题和笑料，用一只散热管换来一阵小小的惊喜，还是合算。我也确实该调整调整烦乱的心情了。

我们很快就到达了圣·路易斯，卸了车，把海丝在宿舍安顿好。学校为所有的新生家长提供咨询，学校的员工和老生的家长们向我们保证，孩子们会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会很轻松地适应新环境，不会像家长想像的那么格格不入。对海丝来说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互道再见时，我努力抑制住泪水。海丝不停地宽慰我们：“我很好，很高兴，不要担心！”但是当我从宿舍出来，向车前走去时，真感到自己的心都快被撕碎了。

没曾想，比尔竟然比我还要难舍难分。他找着借口至少返回去两三次，去提醒海丝一件什么事，或是问宿舍的看护阿姨一个什么问题。阿姨们一定以为我们会一直这么缠缠绵绵不忍离去的。

没等比尔把车发动起来，我感情的堤坝终于崩溃了，泪水汹涌而出。过了十分钟，当我开始苦苦挣扎着堵住决口时，比尔的感情防线又垮了。比尔极少对感情失控或对什么事如此动情，从相识到现在这种情景我只见过屈指可数的几次。

随后的几小时，凡是开车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人，准保会怀疑车里的人遇到了什么悲哀痛苦的事。我们两人轮番流泪，一个刚停下来，另一个便又开始了。

如同明明知道自己不得已只能如此一样，我们也十分明白，正因为对小女儿的爱如此之深，她的离开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无法忍受的失落感。当不得不送海丝离家住校的时刻就在眼前时，这种感觉就越加强烈，我觉得自己在命运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尽管我以为自己对海丝的需求了如指掌；尽管八年来我苦心竭力，历尽了难言的艰辛；尽管我为海丝付出了一切一切的爱，但我还是没能满足女儿的每一项需要。

我不得不让女儿离开。

## 第十二章 艰难抉择

海丝离家住校，带走了我无尽的思念。几周以来家人们都没能很好地调整过来，使自己适应缺少了海丝的家庭生活。我一面和斯苔希、梅丽莎一起忙于应付新学年开始时的繁杂琐事，一面和比尔一起将分分秒秒空余的时间都用来搜集资料，为预定在九月最后一周的“意见听证会”作准备。在海丝离家前，校委会就已经通知我们召开意见听证会的日期，但当时全家都一心一意地为海丝住校的事奔忙，根本无暇顾及此事。现在，海丝已寄宿在圣·路易斯的聋儿中心学校了，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开始搜集听证会上需要的所有文件，以充分证实自己的论点。

格拉迪斯·克劳福德警告我：“达芙妮，你应该明白，搞这样的听证会，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的。你这是在与自己的雇主过不去，他们可不喜欢这样。”

“我想他们不敢为这事辞退我。”我对她说，“如果他们真这么干了，我也不怕，车到山前必有路。不管发生什么事，怎样对海丝有好处，我就怎样去做。”

“好吧，我和你站在一起。”格拉迪斯支持我，并同意到多森来，以专家的身份为我作证，“不过，我只是觉得必须提醒你注意。”

我心绪不宁地等待着听证会的到来，又盼望这一切赶快过去，使问题得以解决。我担心州里来听证的官员的看法是否会对我们有利，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绝不希望因此而带来任何烦恼和尴尬。

听证会于9月26日上午九点在校委会的会议室举行，听证会官员是由亚拉巴马州教育部门指定的，是特殊教育方面的大学教授罗纳德·伊夫瑟尔博士，参加人还有法院速记员、比尔和我，以及全体校委会成员。我们面对众多校方人员，与他们隔着会议桌相对而坐。比尔作了开场白，由于我专修的就是教育，所以我接着阐述了整个事情的原委，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经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聋儿中心学校建议，我们选择了听觉语言方式，应该以这种方式为基础对海丝进行教育；二是，多森的公立学校不愿意并且（或者）不可能提供适合于海丝的教育方式。

很快就可以看出，会议室里校方的官员们在采取多头出击的策略，他们反复盘问我们和我们的证人，同时由他们的专家出具证词。首先，他们争辩说，学校里已经成立了能够满足海丝的教育需求的项目。其次，他们想把我们说成是极难合作共事的人，说我们既不理睬特殊教育项目，也不听从特殊教育专家的指导，而正是这些专家“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告诫海丝的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最后，他们辩解说，我们突然将海丝转到圣·路易斯的聋儿中心学校去上学，使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对聋儿中心学校的建议作出反应，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整整一天，双方你来我往、据理力争，对证人翻来覆去地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有一个回合，格拉迪斯对佛罗里达的一个项目作了说明，一位校方官员随即对她的证词是否恰当提出了质疑：“这在佛罗里达或许是对的，可这儿是亚拉巴马。”格拉迪斯针锋相对地指出，正是由于她认为亚拉巴马的学校应该和佛罗里达的学校一样，重视满足所有孩子的教育需求的问题，她才这么说的。此刻，我们只能希望调解人不要像当地的官员一样沾染地方主义色彩。

海丝的私人语言训练矫治专家，黛安娜·斯廷兰受到了蛮横的对待，对

方先是对她出席听证会的资格提出质疑，随后又对她作为语言训练病理学家的专业水平表示不信任。一位校方人员的讽刺挖苦使得黛安娜霍地站起来，转身走出了会议室。调解人赶紧追出去，向黛安娜保证他将要求这些人改变态度，劝说黛安娜回来继续完成她的证词。

我事后听说，一些学校的证人，包括所有海丝的前任班主任老师（只有一名除外）、一些管理人员和特殊教育人员，在听证会之前的几个星期，就曾被召集在一起训练统一口径，练习在听证会上应该说什么，对一些可能提出的问题该怎么回答，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居然有这么多人，甚至一些我以前认为（现在依然认为）是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在海丝的教育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曾经对我很有帮助的人，现在则把我说成是个想入非非、不食人间烟火、极难相处、期望过高的人，而且又是个个别有用心的、有“她自己的一套打算”的母亲。我的心被深深地刺伤了，觉得自己受了蒙骗。

在听证会上，我争辩说，如果学校像自我表白的那样，一直担心海丝在学业上的欠缺，那么这种担心应该会反应在海丝的成绩单中，可海丝的成绩单却总是 A 和 B，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校方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于是一位特殊教育专家指出，学校曾提出让海丝采用提示语的方式学习，而我却对此犹豫不决，这足以证明我的固执己见和不合作的态度。一天过去了，经过激烈的唇枪舌剑，我不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而是作为一名母亲，经受着猛烈的攻击，我只觉得精疲力尽。

当该说的、该做的都说完了、做过了，听证会结束时，已是晚上九点了。我慢慢地站起来，向学校的助理监督员走去，半开玩笑地问：“赛瑟博士，我明天还可以继续工作吗？”

“当然了，达芙妮，没问题！”他笑着，“因此，我建议你早些回家，明天一大早儿还要工作。”

听证会结束后，我开始真正感到家中没有海丝的一种空落感。多少年来，我总是围绕海丝安排每天的计划，她的语言矫治，她的家庭作业，她的功课预习。近一个月来，我们埋头于听证会的准备工作，依然是将分分秒秒都用在在了海丝的身上。

现在，当我等待官方作出裁决之时，突然间发现八年来自己第一次无所事事，不知该为海丝、为她的语言训练、为她的学习做些什么，我的生活似乎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空白。

不论何时每当我走进海丝与梅丽莎同住的房间时，一阵钻心的孤独和失落感就会袭上心头。而且我随时随地会情不自禁地触景生情，引发心中的万般牵挂和惦念之情。一天晚上，我正在浏览报纸，不知是读到的什么东西，还是外面传来的什么声音，使我的思绪突然飞回到三、四年前的一件小事上。那天，斯苔希和海丝之间发生了多子女家庭中孩子间屡见下鲜的口角，斯苔希非常生小妹妹的气，于是一把将她抓住，强行抱出了屋，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她扔到院子里，然后转身飞快地跑进家，从里面插上了门。海丝本来就有点儿小脾气，受到如此有失尊严的对待，自然火气不打一处来，便开始怒气冲冲地拼命撞门。姐姐坚持着，拒不开门。于是怒火万丈的海丝，将通向后院天井的法国式门上的一小格玻璃踢破，打开了插销。在我和比尔回家后，三位小姑娘一脸的愧疚懊悔、惊惶失措的表情，每当想起那情景就叫人忍俊不禁。此刻，一想到我日夜思念的远在学校的海丝，我早已热泪盈眶，不能

自制了。

送海丝离家去圣·路易斯，唯一使人宽慰之处是这样做有利于海丝的成长，因为这是正确的选择。每次我们与海丝通电话，都可以明显地感到她的幸福与快乐，以及持续高涨的热情。聋儿中心学校的老师们对海丝能够通过电话交谈赞叹不已，因为其他学生（其中有些比海丝的失聪程度要轻），都必须依赖专用装置才能通过电话交流，而海丝只需要拿起话筒，拨通家中的号码，然后开口说话就成了。多少个春夏秋冬、日日夜夜的听觉语言方式的艰苦训练，终于初见成效了。

大约十月中旬，我们收到了关于听证会结果的最后的正式报告。我打开信封，将这份十一页纸的文稿，从头匆匆浏览下去，面对第十页上的“决定”，开始细细地琢磨，上面写道：

根据听证，特作如下决定：

1. 多森学校负责免费为海丝提供适当的教育。
2. 海丝应该在尽可能宽松的条件下，即在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特殊班级里学习，班级里的孩子具有类似的需求和交流特征，具有经常性的课堂参与活动，包括图书、音乐、体育教育以及午饭。
3. 多森学校负责安排解决能够满足海丝·怀特斯通各项需求的宽松的环境。

在“决定”一段的前面部分，主要论述了海丝符合在公法 94—142 条款中所定义的残疾儿童的条件。其后一段，主要论述参与听证会各方对听证官员的结论和意见所保有的上诉的权力。在另外十来页中，罗列了一段又一段的有关教育方面的罗嗦费解的官样文章和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总结了听证会的意见。比尔和我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读着“决定”，我们觉得文章中所提到的每件事都无可非议，因此看来一切还算不错。但是，又发现在整个十一页中，没有任何一处说明在现实中如何实施“决定”，或是表示出听证官员的意见对哪方有利。

我们给格拉迪斯·克劳福德打电话，把有关章节读给她听，“太好了，”她回答，“他说海丝需要在‘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特殊班级里学习，与具有类似的需求和交流特征的孩子在一起’，这点似乎很关键。他们其实是在说聋儿口语教育项目，多森没有这种项目，在短期内也不可能为海丝提供这种项目。他们的意见对你有利。”

“那么，现在怎样了？”

格拉迪斯说：“学校方面肯定会提出上诉的，到时整个报告和所有的文件材料都会上报，在州一级进行审核、评定，然后就会做出最后的裁决。”

“那得需要多长时间？”我想知道。

“我也不清楚，”格拉迪斯回答，“不管怎样得要几个礼拜，没准儿得几个月。”

我的天！还得充满疑虑地继续等待。

“至少，您赢了第一轮，挺鼓舞人心的。”格拉迪斯安慰我们。

可结论仍然可能会被完全颠倒过去。我们现在只有等待、期望、祈祷。

感恩节时我们把海丝接回多森，全家欢天喜地大团圆！海丝整个周末都在滔滔不绝地说着，我敢肯定，海丝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所有的叔叔、伯伯、婶婶、姨姨、堂表兄弟姐妹、祖父母全都急不可待地想见见她，更不要说斯苔希（十年级）和梅丽莎（八年级）了，她们两人恨不得把在学校的

趣闻轶事和与邻居朋友们的快乐交往，决堤般地一下通通灌给海丝。而海丝则把第一次探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眉飞色舞地描述着她在聋儿中心学校开始的新生活。

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凝神静听着，想起一年前，四年级的海丝曾是多么灰心丧气、闷闷不乐，我不禁为她现在的极大的满足感而激动不已。同时，当我意识到，在女儿振奋向上的新生活里，自己已不再占有一席之地时，心中又不免涌起一股莫名奇妙的感觉——也许是嫉妒、是不悦，至少是一种遗憾。但我仍坚定不移地确信，送海丝上聋儿中心学校是正确的，从短短三个月里，海丝精神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就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

她对我们谈论着她的班级、她的朋友、她的宿舍生活以及她所崇敬的老师等等。我想她的姐姐们准保有点儿嫉妒，这一切对于她们太富有魅力了，简直就是一次延伸开的夏令营探奇。所有的人都兴致勃勃地听着、笑着、问着海丝的一切。

海丝讲的最好笑的一件事是关于听觉训练器、麦克风和放大传送器的趣闻，这些是聋儿中心学校所有老师的必备装置。这些装置都有特定的频率，每位老师均设有自己不同的频道，以避免混淆。这样每间教室都有一套接收器可以调整到与老师的听觉训练器相对应的频率，同学们在一堂课结束后，要关掉他们的接收器。当到别的教室听下一堂课时，再把该教室里的接收器调整到相应老师的听觉训练器的特定频率。

海丝笑着回忆道，一天，一位男教师留了几分钟的课堂练习后，便道歉暂时离开了教室。他刚离开片刻，海丝的朝鲜一加拿大裔室友葛蕾·李便一脸滑稽地抬头望着窗外，“我听见下雨声。”她说，大惑不解地看着外面晴朗的天空，海丝和教室里的另一名同学，一个和海丝年龄相仿的男孩儿，跟着相视而笑。

“有什么好笑的？”葛蕾问：“你们没听见下雨吗？”

“那不是雨。”男孩儿边回答，边和海丝窃笑。

“不是雨，是什……”

就在此刻，三个孩子听到了一阵清晰的放大的冲水声，“噢！”地一声，葛蕾终于明白了。大家全都笑了起来。

几分钟后，老师回到了教室。“我听到了下雨声，”葛蕾在老师进门时，大惊小怪地向他打招呼，“接着又听到了冲水声。”

老师惊惶失措地赶紧向下瞥了一眼自己腰带上系的听觉训练器，发现在上洗手间前忘了关掉它。“老师非常尴尬，”海丝告诉我们，“他的脸通红通红的！”所有在场的人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过了好长一阵才止住笑声。

海丝在圣诞节回家时多住了几天，大家一起共享了更多合家团聚的快乐。海丝谈到她非常想念以前每星期的舞蹈课（聋儿中心学校没有这类课），但对新学校的幸福满足感显然将一切遗憾与不适都冲刷得无影无踪了。我知道多少年来舞蹈在海丝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现在她愿意牺牲舞蹈，足以证明她已适应了新的学校生活。

我们可以定期收到聋儿中心学校寄来的关于海丝学习进度的报告，我也不时地与海丝的宿舍护理人员特丽萨和佛蒂进行电话联系，从中可以知道在短短几个月里，海丝的学习大有长进。

在圣·路易斯，海丝的社会交往能力同她的学习一样，获得了使我倍感欣慰的进步。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对此我从前从未作过充分考虑。

海丝在生活中第一次感到，她和班级里的所有其他同学一样，是毫无差别的。她不仅得到了周围同伴们的认可，还成了一名众所周知的人物，海丝的自尊心由此大增。

宿舍护理员特丽萨说，海丝是个可爱随和的孩子。接着又笑着补充道，当海丝不乐意做什么杂务事时，准能通过某种方式让别人明白她的意思。我说自己对这点早已深有体会，海丝从来就是个主意笃定、一条道儿走到黑的人。特丽萨还谈到海丝与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十分融洽，而且很注重精神生活，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她说有好几次，走进海丝的宿舍时，发现海丝在读圣经。我告诉特丽萨我对这也同样不奇怪，因为我和比尔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我们能发现一处带有芭蕾舞班的女修道院，海丝准保会脱离现在的生活，心满意足地去里面当一名“舞蹈修女”。

聋儿中心学校的教职员都满怀喜爱地把海丝称为“南方美女”，因为他们认为海丝说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我不禁感到好笑，在多年的语言训练矫治过程中，我竟然一次都没有注意过海丝的口音问题。

海丝很快与聋儿中心学校的外籍学生，一名肯尼亚医生的女儿波拉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圣·路易斯的一些人对此很纳闷。他们很肤浅地认为仅仅因为海丝来自于南亚拉巴马，所以与这个同龄的黑非洲女孩儿在精神上有一种同源感，实在是件难以想像的咄咄怪事。我对这些老生常谈只能耸耸肩，一笑置之。我认为，事实上海丝像许多在南方农村和小城镇长大的孩子一样，比起在北方长大的孩子，对不同种族间的友谊有着更多更密切的接触和联系。我亲眼见到海丝与波拉、葛蕾·李以及她的墨西哥朋友博兰莎之间，发展起来的跨种族文化的友谊，而这些友谊真正丰富了聋儿中心学校面向世界各地开办教育的特点。

三月里的一天，邮箱里出现了一封盖有蒙特格默邮戳的官方信件。多森学校方面对听证会的结果提出上诉后，州里的最后判决终于下达了。判决中说：由于学校已经为当地的学生提供了聋儿教育项目，根据公法第 94—142 条，学校不必再为海丝提供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聋儿中心学校上学的费用。

这就是结果。我们在上诉中输掉了。

由于失望，我浑身厌倦无力，心中的懊恼自不待说，数月来的等待、期盼，全部化为了泡影。好在，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但除了这一个坏消息外，其它事情还都顺心如意。当海丝在聋儿中心学校的第一学年即将结束之时，靠着学校的部分奖学金，家人们勒紧裤带，我们终于闯过了经济难关。虽然几乎耗光了我教课的全部薪水，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这一年对海丝来说进步尤为显著，我和比尔不约而同地决定下一年继续送海丝到圣·路易斯学习。

海丝在聋儿中心学校共学习了三年，我们感到后两年的日子似乎要比第一年容易过得多。事实上，我们已知道了自己该期望什么，在新学年的迎接新生和家长的介绍会上，我们置身于众多家长之中，互相提出忠告，交流经验。此时，我惊喜地发现比尔居然也敞露了心怀，向人们诉说着第一学年离开海丝时那难舍难分、痛不欲生的心情。

我一直对聋儿中心学校为它的学生提供的多种多样的机会难以忘怀。海丝的体操老师吉姆尽其所能不断地向孩子们提出新的挑战，为他们提供新的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促使他们尽快成长。正是他介绍海丝参加了越野识途比赛。

海丝对我谈起越野识途比赛时说：参赛者要孤身一人在野外，随身只带一张地图和一个指南针，就凭这两样东西，搜寻道路，通过一个个中继点，到达远距离之外预定的终点。我不得不承认，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比赛时，心中泛起几分无法抑制的母亲的担忧。我对吉姆说起自己的不放心，吉姆向我保证，比赛地区经过仔细测量，每件事都计划得非常周密，一旦有学生迷失方向，很快就会被找到。海丝对这项运动的不同寻常的热情，抵消了我心中的种种疑虑不安。

海丝看地图的能力向来很强，当她七、八岁时，每年夏季全家开车去科罗拉多的路上，都由海丝充当领航员。这种识图经验，再加上她那不可思议的辨认方向的直觉，使海丝成了越野识途的能手。在聋儿中心学校参加这项运动的第二年，海丝便摘取了同年龄组州冠军的奖章。海丝对此极为自豪！

全家也异常地为她骄傲。

使大家特别满意的是，海丝在聋儿中心学校所呆的每一年，都可以在学习上取得双倍的进步。我只凭海丝的对话技能就能体会到这点，而测验结果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感觉，说明聋儿中心学校推行的语言强化教育法确实卓有成效，海丝的语言能力在成倍地增强。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因为学校不接收十四岁以上的儿童，海丝只能在聋儿中心学校学习三年。我们关心的是，这能否达到学习的最根本的目标，即：帮助接受聋儿口语教育的孩子们在听觉语言能力上打好基础，使他们最终能够回归主流教育，并取得成功。而且这项任务必须在初中结束时就完成。

事不宜迟。

谢天谢地，由于海丝在学习上的引人注目的进步，我们和学校的老师们决定，海丝在聋儿中心学校的培训将在1987年的春季按要求圆满完成。海丝随后返回多森，在下一个秋季，开始高中的学习，她将和八年前同上幼儿园的孩子们同班学习。

这一切对于我犹如梦想成真。为了送海丝上聋儿中心学校，我们付出的一切代价，总算没有付之东流。

即使海丝本人，在圣·路易斯的最后一年中虽然仍像第一年那样兴致勃勃，但心中不免急切地想在夏天尽快回家。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温暖的春天的傍晚，海丝打来一个长途，怀着即将回家的激动与兴奋，告诉我她简直忍耐不到学年结束，“太好了，”她说，“明年我就要回家了，全家又要团聚了！”

她的声音听上去是如此兴奋，我实在不忍心告诉她我的想法，使她的幻想破灭。哦，海丝，宝贝儿，我希望一切不要那么复杂。

我不知道该怎样告诉她，她所期望的也许已经不可能了。

### 第十三章 婚 变

我和比尔的婚姻困境由来已久，然而海丝并不知道。但是，过去我们一直未做过任何正式的决定，仅在不久以前，我们才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分居的时候了。

海丝不知道这事有几方面的原因。尽管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我们婚姻生活开始的早期岁月，但直到海丝离家去聋儿中心学校前后，事态才逐渐发展成公开的、明显的冲突。海丝在聋儿中心学校的三年时间里不经常回家，她在家的时候，我和比尔都认为这段时间是专门属于她的，因而尽力将我们的冲突掩盖起来。此外，海丝的听力障碍不仅使她听不到隔壁房间的争吵声，也使她很难体会到我们音调和情绪的细微（有时也并不是细微的）变化。即便海丝听力正常的话，她所能做的也至多不过是让那些明显的裂痕不再过分扩大而已。

斯苔希和梅丽莎肯定知道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但是，由于她们都像我和比尔那样仔细地呵护自己的妹妹，她们从未向海丝讲过任何有关家庭内部不愉快的事件，据我所知，她们只字未露。

我和比尔向自己的父母透露了我们的分居决定，我们只让直系亲属和最亲近的朋友了解我们的婚姻问题。由于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家庭关系属于自我隐私”，使我们感到这样处理比较好，从而，不愿让其他人发现这场婚姻危机。过去不愿，现在仍然不愿把我们的问题公之于众。

我曾经看到，并和许多人谈到过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即残疾儿童的父母，其离婚率要高于常人数倍。但时至今日，我都极不愿意指明这也是我们婚姻危机的根源。

比尔曾经说过，他认为多年来我为海丝和她的姐姐们奉献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留给他和我们婚姻生活的已经所剩无几。正如每个有孩子的人都知道的那样，当好父母的角色是要耗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夫妻双方只有一个人能积极投入的话，要想满足家人的所有需要就太困难了。所以，我必须承认比尔的诉说不无道理，有些时候我未能将比尔和我们的关系放在应有的优先地位上。

然而，海丝的残疾又使我们继续维持着已有裂痕的夫妻关系。如果说多年来海丝的残疾未能使我们俩人紧密地结合起来，那是由于我们的婚姻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相互交流、角色分工、彼此谦让和尊敬。这些问题甚至可能在我们婚姻生活的更早阶段就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了。

比尔感到不愉快由来已久。但是，直到海丝去聋儿中心学校前后，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那时，比尔两次在多森参加州众议员竞选，均告失败。他第二次落选后变得异常沮丧，我开始为他担忧。但是，我却未能理解他的失意有多么严重，完全没有敏感地体察他的情感危机。鉴于比尔日趋加重的悲观情绪，我时时劝他应该更好地对待这次失败，并提出一些有关生活的建议，比尔却认为这是我在无休止地找岔子，于是在我们俩人之间突然爆发了许多争论。回顾过去，我发现甚至从婚后不久，我们就已经建立起一种经常性的各行其事的生活方式了。每年夏天，大多数时间里只有三个女孩和我一起去看科罗拉多，在我大妹妹家度过漫长的家庭休假。与此相似，每当周末，在全家动身去巴拿马城的最后时刻，我总是放弃与比尔同行的机会，而独自留在家做家务或处理学校的工作，让他带女孩们去航行。我有自己的业余

爱好，热衷于制作手工艺品，女孩们常和我一起作。我有自己的职业，在工作单位和周围邻居中有自己的朋友。所以，直到1987年春天，我和比尔很少分享各自的爱好，甚至很少以夫妻的身份共同参加社交活动。

我从未怀疑过比尔对我的忠诚，但是，在我们甚至尚未意识到夫妻间的危机，并对此有所反应前，就逐渐地过起了互不相干的独立生活。在海丝去聋儿中心学校的时间里，这种隔膜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不止一次地，当我给商店打电话，询问比尔何时回家吃晚饭时，他的妈妈总是说：“比尔今天下午很早就动身去巴拿马城度周末了，你不知道吗？”

当我试着问比尔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时，他谈到，他已对我们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和持久的生活责任感到厌倦。我建议一同去咨询，寻求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和改善婚姻状况的办法，他的回答却是：“我不需要什么咨询，我们婚姻的唯一问题就是因为和你，达芙妮结了婚。”这种紧张和争论继续恶化，总是以我们中的一方爆发，产生冲突为止。我们发生过那么多次痛苦的争论，以至斯苔希和梅丽莎开始对我们讲：“如果你们不能有礼貌地相互对待，你们大概应该考虑离婚的事了。”

不能说这个念头从未掠过我的脑海，但是，由于我十分重视家庭的价值，相信上帝对婚姻的观念，即婚姻意味着终身承担的义务。因此，我迅速地排斥了这种可能性。我告诉自己说：“达芙妮，你是个有韧性的人，这场争论你能赢，事情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最后当我意识到，我们的婚姻问题开始对女儿们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时，我找比尔说：“我们再也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了。”

他回答说：“我同意。”

我们俩人经过出乎意料之外的友好讨论，同意合法分居，并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斯苔希和梅丽莎。接着，海丝打来电话，那么兴奋地讲述她即将回家，不久会再次成为家庭中的一员。海丝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挂断她的电话后，立即接通给比尔的电话，他那时正因公务在新英格兰。我在电话中说：“我们不能对海丝做这样的事。”我告诉他，海丝从圣·路易斯打来的电话，她对即将回家和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生活是那么的兴奋。我说：“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着手解决婚姻问题，我们应该为了海丝去作努力。”

比尔也被海丝的话所感动，他同意我的意见，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努力。”

那年春天，我、比尔和梅丽莎、斯苔希、我的父母及妹妹斯蒂芬妮一起到圣·路易斯，参加海丝在聋儿中心学校的毕业典礼。当看着我那十几岁的漂亮的女儿迈着骄傲的步子走过舞台时，岁月的飞快流逝使我感慨万分。仅仅三年前，我送海丝到学校去时，她还是个小女孩，而今天接回家的已是个妙龄少女了；仅仅三年前，检查表明海丝的能力只相当于二年级的水平，而现在她回到多森后，秋季即可进入正规公立中学了。这对我们全家来讲，真是值得庆祝的奇迹。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和变化，海丝回归后的家却是今非昔比了。

像海丝一样，姐姐们也长大了，各自都在寻求自己的梦想，编织着自己的生活。梅丽莎过去一直是海丝最知心的伙伴，现在是学校里受人爱戴的学生，还是名田径运动明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一群新朋友。斯苔希在那年春天就要高中毕业，计划夏天动身去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到空军学院预备

学校学习，为下一年进入空军学院作准备，这是她实现当宇航员梦想的决定性一步。

那年夏天，同送斯苔希到科罗拉多上学一样，我对海丝即将开始的高中一年级生活十分担忧，因为，聋儿中心学校进行的是个体化教学，每个班级只有三到四名学生，而且都有听力障碍。而那时，多森的诺思维优中学则是亚拉巴马州最大的中学之一，有两千五百多名学生。她必须尽快调整自己，以适应急骤变化的环境。

但是，我十分惊异地看到，聋儿中心学校教给海丝的学习技能对她帮助极大，海丝已为进入主流教育体系，作了充分的准备。由于语言和词汇永远是个挑战，别人告诉我们要为海丝购买所有教科书的个人用副本。当她第一次阅读时，可以将所有不认识或不会发音的字圈上，然后从字典里逐个查出来，并在书上用自己懂得的定义在这些生字的边上加以注明。这样，海丝就能再次阅读课文并充分理解其内容了。

其次，海丝学到的另一种有益的学习技能是，手边随时保存有大量永久性卡片索引。每当她见到任何不认识的字或词语，就写在学习卡片上，不断复习。海丝的记忆力极好，只要她一旦认出并学会一个新字以后，她就能永远应用和理解它。

聋儿中心学校还强调培养一种极宝贵的学习态度，这也是我从海丝很小的时候就努力灌输给她的：当你不懂时，要坚持不耻下问。事实上，做到这一点，使海丝获益巨大。帮助她轻松自如地调整自己，出人意料地很快就适应了中学的学习生活。诺思维优中学的老师看她那么热爱学习，都极为乐意帮助她。海丝从中学生活的最开始就十分努力，为了坚持跟上班，她每天都学习到很晚，并开始得到 A 和 B 的好成绩。

那年秋天，怀特斯通家遇到的最为难的事并未出在海丝身上，而是我们的大女儿斯苔希。大约在十月底，斯苔希来信说她已经完全陷入了爱河，对方是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空军学院预备学校的学生。因为空军有规定，严格禁止军校学员或候补学员结婚，斯苔希说她已作出“准备退学继续谈恋爱”的决定。

比尔坚持让我坐飞机去科罗拉多，说服大女儿结束这场“愚蠢的恋爱”。但是，斯苔希迅速使我相信她的主意已定，决心要与汤姆结婚，因此我未做这次旅行。尽管我对斯苔希的仓促决定忧心忡忡，对他们俩人间显著的年龄差别有那么多的保留意见，但是，我还是决心不采取生硬的态度，以免对我和大女儿及她所愿意嫁的人之间的关系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我与斯苔希、汤姆谈了自己的保留态度。斯苔希虽已知道，但我还是告诉他们，我永远不能宽恕他们未结婚就同居的作法。因此，如果她义无反顾地决心为汤姆退学，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假如他们决定就在科罗拉多结婚，我们便乘飞机去参加婚礼；或者是欢迎他们回家，花些时间在多森筹备婚礼。

当斯苔希选择了后者时，我感到十分欣慰。但是，比尔继续对我，然后也对斯苔希大发雷霆。他拒绝为斯苔希的婚礼支付一分钱，所以我就用自己的工资承担了这个小型圣诞节婚礼的费用。这个婚礼是斯苔希和我一起匆匆筹划的，这么做维护了我和大女儿的亲密关系，我将永远为此而感到欣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高兴地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喜欢，并欣赏起我的女婿汤姆来了。他是斯苔希忠诚的、亲爱的丈夫，是我的两个大外孙沙恩和特萨尽心尽责的好父亲。

海丝除了在斯苔希婚礼上充分享受到做女傣相的快乐（梅丽莎是主要的女傣相）以及上正规中学住在家里的极大愉快以外，我认为这期间最值得一提的重要事情应该是，她又重新得到了练习舞蹈的机会。

海丝在聋儿中心学校的几年里，曾经尽量依靠自己的努力继续练习舞蹈。我被她的自我约束力所感动，曾在她放假回家期间，为她支付学费上了一个暑期舞蹈班。但是在三年后，海丝第一次恢复经常性的芭蕾舞训练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她对芭蕾舞衷情之深。在最初的六、七年里，我只是把芭蕾舞看成一种治疗方法，一项有趣的体育锻炼消遣，一个我们可以利用来帮助海丝培养语言和阅读兴趣的基本爱好。只有这时，我才真正开始认识到，海丝对芭蕾舞的热爱已达到一种严肃的、愿为这种艺术献身的境界。

在海丝还是孩童时期，当她讲到长大以后有朝一日要成为芭蕾舞舞蹈家时，我不过像所有的妈妈们一样，在倾听、微笑并点头称赞。但是，当上中学的女儿告诉我，她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时，我知道这已不再是一个小女孩的空想梦幻了。

我也知道，无论海丝的天资有多高，对舞蹈的热爱有多深，自认为对舞蹈的责任有多大，但要想成为一名专业芭蕾舞演员，绝不是容易实现的梦。即使她是听力正常的女孩，也绝非易事。但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个女儿的梦想泼过冷水——那怕是极高的、不大可能实现的梦想。

曾经有过一次例外，在斯苔希上初中的时候，她曾下决心在学校演出的“音乐之声”中扮演莉萨的角色，她把自己想像成一个精采的歌手。事实上，斯苔希确实具有角色所要求的沉着、自信和音量。问题出在，她从我身上得到的声音和音乐素质遗传基因并不尽如人意。我喜欢在阵雨中大声唱轻快的歌曲，遗憾的是，我可能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这样的母亲：每当我打算随着汽车收音机的乐曲引吭高歌时，就会使失聪的女儿双手捂着耳朵喊道：“妈妈，请别唱了，你的歌声快要炸聋我耳朵啦。”

由于我了解斯苔希的声音和我的那么的相像，我不愿看到她受窘，所以竭力打消她上台演唱的欲望。但是，我却一直鼓励她的其他梦想。当她决心利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去帮助在诺思维优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俱乐部时，我支持过她；当她决定参加亚拉巴马学生领导人竞选时，我也曾鼓励过她，并在她获胜后，参加了她的宣誓仪式；我甚至陪她一起到巴尔的摩，出席共有五十位青年学生领导人员参加的全国大会。她在中学最后一年的暑期，当选为出访法国的十二名美国特殊青年使节中的一员，对此我更感到前所未有的骄傲。当空军学院预备学校最初以“资历过高”为由拒绝接收她时，我鼓励她下决心打电话给学校行政办公室，要求他们重新考虑并接受她的申请（后来他们确实这样做了）。

同样地，当梅丽莎想竞选啦啦队长时，我曾经鼓励过她。在她参加田径比赛时，我为她呐喊助威。我帮助她作好参加诺思维优中学每年一度的美女仪仗队的准备工作，在那个重要的晚上，我坚信我的梅丽莎——上中学二年级的金发碧眼小美人定能使所有的竞争者黯然失色。那一年，当梅丽莎决定要参加一个夏季去俄罗斯的学生使团时，我帮助她填写了所有必要的申请表。

因此，当海丝告诉我，她打算成为一名职业芭蕾舞演员时，我没有让她泄气。有一天，我和海丝去买一双新的芭蕾舞鞋，她和那个小商店的女店主在随意交谈。女店主看到海丝在注视墙上的芭蕾舞照片，便指出其中的一位

舞蹈家就是她自己的女儿，她骄傲地说：“我女儿希望将来成为一名职业芭蕾舞演员。”

“我也希望自己这样。”海丝告诉她。

“那么，你应该去亚拉巴马艺术学校看看。”女店主说。

“去哪里？”海丝询问道。

“亚拉巴马艺术学校，”妇人解释道，“是伯明翰市的一所公立中学，对表演艺术特别重视，他们有个非常好的舞蹈项目，我女儿就在那儿上学。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职业舞蹈家，你真应该去亚拉巴马艺术学校好好了解一下。”

海丝回来后，便向她的舞蹈老师询问关于亚拉巴马艺术学校的情况，老师告诉了她关于这个学校的许多优越之处。

虽然我是个职业教育工作者，以前却从未听说过这所学校。我打听到这所学校是一所“有吸引力的学校”，而且是所公立学校。学校有严格的入学条件，要求出示能力合格证书，并不是每个想去的人都能入学。海丝自己也去信询问情况，我们得到的所有信息都很诱人，因此，海丝决定我们应该去访问亚拉巴马艺术学校。

学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实际上都在校园里寄宿。学校按普通中学课程教学，同时对学生所选择的一种表演艺术进行深入的培训，如戏剧、音乐或是舞蹈，所有课目的质量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不太愿意海丝刚从聋儿中心学校回来一年，就又要离家住校。有可能的话，我希望她能住在我父母家，买长期车票每天乘车到市区的亚拉巴马艺术学校去上学。

虽然亚拉巴马艺术学校从未接收过一名失聪的学生，但是，学校里每位和我们谈过话的人对于海丝想上这所学校的志愿都予以尊重和照顾。然而，校长纳尔逊博士却十分坦率，他说：“海丝，你知道在所有的艺术职业中，职业芭蕾舞可能是最难闯入的领域。”

他的讲话丝毫未动摇海丝的志向，海丝告诉他“我热爱芭蕾舞艺术，我知道它需要投入巨大的努力，但是，我一直习惯于艰苦地工作，我希望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

我想纳尔逊博士一定被海丝的矢志不移所感动，我自己也深受感动。

纳尔逊博士告诉海丝，她在诺思维优的成绩单表明她可以达到本校的学术标准，但是，她仍需进一步证明她能胜任学校舞蹈科目的严格要求。他说：“遗憾的是，秋季科目的审评工作已经结束。”看到海丝脸上的失望表情，他赶紧又说，“但是，今年七月份我们将在塔斯卡卢萨市的亚拉巴马大学举办一个扩大的夏季舞蹈班，无论如何，这对你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在这个培训班上，教师将有机会评价你的舞蹈水平，这样他们就可以确定是否接收你作为亚拉巴马艺术学校秋季学期的候选人。”

我感谢纳尔逊博士接待了我们，并告诉他我们将考虑参加舞蹈班的建议，然后即动身回家。我认为海丝决心已定，她再次找到了她所需要的实现自己梦想的学校。虽然她尚未被接受，但是，我盼望着这扇大门能向她开放。参加那个特殊的夏季舞蹈班是打开大门的第一步，它的学费是一千美元。除了有关海丝未来计划的问题之外，我与比尔婚姻的紧张局势也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关系在斯苔希婚礼前后恶化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连海丝都知道了内情。她与爸爸之间甚至发生过几次争论。我认为比尔把从我这儿受挫的怒气发泄到了海丝身上，因为我多次听到他挖苦地把海丝称做“小达芙妮”。

令人悲哀的是，这类挖苦像许多细微的发音变化一样对海丝丝毫不起作用。她完全被弄糊涂了，愤怒地回答说：“你为什么要叫我达芙妮？我叫海丝，我的名字是海丝！”

早在那个春天，当我通过传闻得知比尔有外遇时，我估计他已决心结束我们的婚姻了。因为我曾听过许多可怕的故事，讲到一个女人在某一天下班回家后，发现整栋房子几乎全空了，才知道她的丈夫带着实际上是他们共有的一切东西搬走了，为此我感到忧虑。我去找律师，说明我们的情况，询问如果我和比尔确实分居或离婚了，我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公平合理地分割财产。律师建议我在比尔搬走以前递交一份正式文件，说明未经双方同意家中任何物品都不得转移，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些。

我猜想比尔很吃惊，我知道他很不高兴。他指责我策划和他离婚，想搬出这个城市，并从他身边带走他的女儿。我向他保证自己从未这样做过，甚至从未考虑过这事。我的家是多森，我在那里已教了十二年书，我有朋友在那里，我没有理由永远地搬走。

不久，比尔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公寓，当他一旦真正搬走以后，一切又变得比较惬意而令人愉快了。我让他从家中拿走一切他想要的东西，我甚至鼓励女孩们去他的新公寓，帮助他整理衣橱，给他的桌子铺上台布，提供诸如此类的一些帮助。

我不知道以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使形势变得更加不愉快，也可能我们二十一年的婚姻以破裂告终，确实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我去找比尔，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们的婚姻还有希望的话，我愿意再试一次。他告诉我，即使我是这个地球上留下的最后一个女人，他也永远不想再找我回来。正如我所不愿承认的那样，以后事态的发展甚至更加可怕。

比尔告诉梅丽莎和海丝，他不能再负担梅丽莎去俄罗斯旅行和海丝夏季舞蹈班费用中他应付的那一半。他试图告诉女儿们，她们应该知道这些令人扫兴的事，都是离婚造成的不幸后果。但幸运的是，我的校长从一位朋友处获悉，梅丽莎的赴俄计划由于缺少资金而难以成行。于是，他背着我在全体师生的大力支持下，从一位学校年度资金筹集人处得到了足够的捐款，使梅丽莎如愿以偿，条件是当她回来以后，要为同学们举办一次集会。同时，我父母执意为海丝的舞蹈班交纳了五百美元学费，我自己只支付了另一半。

比尔很快就进入了约会期，并且极为兴奋地向我炫耀他的辉煌成绩。他曾告诉梅丽莎，他要使我在多森的日子陷入难堪。时隔不久，我才理解了这话的真正含意。有几个朋友告诉我，镇里流传着一些谣言，其言语是如此的低级，使我无法用文字复述。当我和比尔对质时，他令我震惊地承认，他确实讲了我所听到的这些谣言。

“你可以忘掉你我曾经结婚二十多年的事实，”我告诉他，“只是你得向我解释，你为什么要制造如此令人作呕的谎话，以此败坏你女儿的母亲的荣誉，从而伤害了你自己的女儿们？”

他耸耸肩膀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别人认为我们离婚，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

1988年6月，在结婚二十一周年纪念日过后不几天，我们办完了离婚手续。比尔的要求中有一条是让我放弃他的姓，重新改姓我娘家的姓氏。他说他从来不希望有两个赫伯特·威廉·怀特斯通夫人，显然他认为他已经有了

一个新人来填补这个位置，她能够做得比我更好更多。

但是，我使用达芙妮·怀特斯通的名字已有大半辈子了，从未想过改姓。我必须先征求女儿们的意见，三个女儿告诉我这件事不会困扰她们。斯苔希说她已经使用了丈夫的姓，梅丽莎和海丝也准备在她们结婚后这么做。我同意了比尔的要求，签署了离婚文件，再次成为达芙妮·格雷。

到此时，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为比尔留在多森。当海丝给舞蹈班负责人留下美好印像，并被亚拉巴马艺术学校接收入学以后，我立即开车到伯明翰去找一个新职位。校长助理萨瑟尔先生为我写了一封极好的推荐信，但他警告我，在那个时候想找个当年的教学职位可能已为时太晚。但是，我相信要做成任何事情，不冒风险必然会一无所获。

就在我前途未卜之时，上帝似乎又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得知一所新建校区仍需一名数学教师，我去作了面谈。回到多森的下一个周末，我便得到好消息，九月份我就可以在胡佛市的学校，得到一份新工作了。

梅丽莎从俄罗斯回来后，我告诉她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应该做的安排。这样，她可以在多森与父亲、祖父母或任何她喜欢的人住在一起，完成她在诺思维优中学最后一年的学习。我告诉她，“我再也不能呆在多森了。”

令我吃惊的是，梅丽莎决定与海丝和我一起走。所以我腾空房子准备出卖，和我的两个女儿一起动身到伯明翰，共同翻开生活中新的一页。

## 第十四章 幽默感

由于我无力购买或租用一栋房子，父母建议我搬去同他们一起住。“好吧”，我同意了，并说“我只住到卖掉了多森的房子，在经济上能够自主为止”。

那年，当我对搬回伯明翰的费用一筹莫展时，亲人们的慷慨大方帮助我度过了这次相当意外而又困难的生活骤变。我妹妹斯蒂芬妮和她四岁的儿子特雷已经和我父母住在一起，合用一个公寓租约。因而，海丝、梅丽莎和我住进他们三间卧房的最后一间，在这个单独的小房间里，合睡一张大床（幸亏是个特大号的）。每当晚上回自己的房间时，我可怜的女儿们会同所有沃尔顿家的人一样，要说上一圈：“晚安，外公！晚安，外婆！晚安，斯蒂芬妮姨妈！特雷睡好觉，别让臭虫咬！晚安，梅丽莎！晚安，海丝！”

我父母在他们应该安度晚年的岁月里，接纳了我们所有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圣徒。我唯一的希望是在他们享有天年之时，我们不致于把他们吵疯了。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上帝在用他那无限的智慧照料着海丝、梅丽莎和我。那时我们不知道，在那段可能是我们一生中 most 困难的时期里，还会发生什么事。但正是这个家庭，尽力支持了我们。

海丝需要适应亚拉巴马艺术学校新科目的严格要求。梅丽莎在一个不熟悉的新城市，以及与从前不尽相同的新学校里，希望自己能脚踏实地地完成中学最后一年的学习。我则开始在一个新的校区，担任中学数学教师。因此，可以断定，要保证我们每天的日常活动，交通问题该是多么可怕。终于，我们制订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计划，每天我们等候在各自预定好的碰头地点，然后开车一块儿回家。

梅丽莎自己开一辆老式的大型家庭面包车去伯利中学，那辆车由于不常使用，已成为孩子们的车。我则每天早晨刚过六点钟，就离开位于伯明翰南郊的父母家，开车送海丝去亚拉巴马艺术学校。它位于伯明翰市区的西北部，离市中心很近，正靠近 1-65、1-20 和 1-59 三条公路的交汇点。如果我尽早放下海丝，就可避开早晨最拥挤的市区交通高峰时间，正好回到不太拥挤的通向外边的州际公路上，开往我的学校，它位于伯明翰东南部的胡佛市。

下午就更加复杂了，梅丽莎下课后自己开车回家。但是，我必须将离开学校的时间精确地计算到分，以便全速赶到市区，四点半钟准时在亚拉巴马艺术学校门前的大街上接海丝，她那时刚完成每天下午的舞蹈训练走出来。我们要赶在下午交通阻塞的高峰时间前，努力逃离伯明翰市区。否则，晚接海丝五分钟，就意味着我们回家的时间要延迟四十分钟。

然而，交通并非唯一的问题，海丝的学习是每天更大的挑战。事实上，亚拉巴马艺术学校以前从未接收过失聪的学生，甚至也不具备所有地方学校系统所能提供的专门的特殊教育服务，因此结果就十分严重了。虽然海丝的老教师们千方百计试图做到尽善尽美，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一个有听力障碍的学生，能较好地达到学校对课程和体能两方面的严格要求。

海丝的舞蹈老师索尼娅·阿罗娃经验丰富而且令人尊敬，海丝在她锐利、严格的目光下，每天要一丝不苟地进行三个多小时的训练。除了学校课程规定的九十分钟芭蕾舞课以外，索尼娅老师还要求每天放学后增加额外的训练。可能是由于海丝觉得在聋儿中心学校时，耽误了那么多次的舞蹈练习，

也可能是她意识到通过这种强化训练，她将会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总之，海丝似乎从这种每天使她精疲力尽的日常训练中，体验到一种真正快乐的感受。她对这一切几乎着了迷。

其实，海丝的舞蹈训练除了消耗掉她可用于生活、学习等其他方面的大量精力外，并未给她带来不愉快。我们从索尼娅老师处得到的全部反馈表明，海丝显示了作为一个舞蹈家的天资、献身精神和扎实的功力。

海丝在其他课程方面的进展并不理想。亚拉巴马艺术学校缺乏教育聋生的经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而最大的障碍可能出在海丝每节课都必须使用的听力训练器上。虽然所有的老师都很乐意合作，戴上这个话筒装置。但问题是，离亚拉巴马艺术学校一步之遥便是高速公路，每当海丝打开接收器时，老师的声音经常受到公路上卡车司机使用的对讲机上传呼声的干扰。持续的电波干扰和震颤声经常分散着海丝的注意力，令她厌烦。要知道，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海丝要想听懂在嘈杂的教室中的讲话，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当海丝想努力听懂科技知识课，或想听明白英语课指定的作业细节时，司机的“喂！喂！”声使她感到厌烦丧气。我们一次次地拧开听力训练器，无论调到那一种频率，司机的讲话声都会不时打断或压过老师的许多授课声，这使得课堂学习几乎成为不可能。

我们所能采用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让海丝为每一节课录音。每天下午一回到家，当海丝开始做代数作业时（即或有过，她也很少需要数学课方面的帮助），我就将她这一天其他课程的录音写成文字。一旦我写完一个录音带，就将手写的抄本交给她，这样她就能够开始复习功课或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作业，同时我接着听下一门课的录音带。多少个夜晚，都是斯蒂芳妮或妈妈，或是她们俩人一起在帮助我完成这种转译工作。我们一般要到十点或十一点钟，才能转译完录音带，向海丝提供出完成家庭作业，以及预习次日功课所需的全部资料。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能开始评阅试卷或准备我自己教授的课程。

对于海丝，她每天都必须完成两天的工作量。她的汗水没有白流，在她的成绩单上永远保持着A和B。但是，海丝为了取得那些让她精疲力竭的舞蹈课和学业的成功，从精神上、身体上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也同样如此。

事实上，如果没有我的家庭始终如一的支持，我们俩人谁也不能熬过哪怕一年。

我的家人们的贡献不仅仅只限于每晚长时间的帮助海丝学习，在我们搬到父母家以后不久，我的父亲——上帝保佑他洞察入微的仁爱之心，向我指出我从未注意过的海丝的一些表现。

“这孩子需要有较好的幽默感，”他说，“当有人取笑她时，她一点儿也不明白。”对于我父亲这样的幽默大师来说，他认为任何一个不会和别人开玩笑，或用笑话愉悦自己的人，在性格上都是一种严重的缺陷，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性残疾。从那以后，在我们同住的整个时期，父亲都把亲自锻炼培养海丝的幽默感，当作他生活中的主要任务和责任。

海丝最根本的问题是听力障碍，而不是性格乖僻。虽然她的听力和交流技能已锻炼得如此之好，以至我经常忘记了她是耳聋的。但是，当她学习唇读和使用自己残存的极小的一点儿听力去理解别人讲的话时，她从助听器听到的声音是如此的微弱和失真，以致她很少能理解这些话是怎么讲出来的。

她从未学会通过声音辨别和区分冷嘲热讽、挖苦或讽刺的口气。事实上，她听到的一切都只是根据字义去理解的。由于她不能从别人的声音中察觉出讥讽的语气，因而当她自己（或是别人）受到嘲弄时，她一无所知。

比如，晚上当她拿出一筒冰激凌作为睡前小吃时，父亲会讲这类的后，“孩子，你都把我吃穷了，瞧瞧你长得多胖了！在你明白这种危险以前，我不得不去找个承包商来加宽所有的门。”由于海丝把他的当真的话当真了，她的反应是把冰激凌送回冰箱，并逃离房间。她不懂用语言善意地开玩笑。

海丝不仅在每当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感到沮丧，并且当人们对她所不明白的事发笑时，她也认为是在取笑她。于是，父亲采取了正面进攻的策略。在和海丝相互交流时，他经常不留情面地取笑她，他刺激她、戳她、打击她、逗她，直到她学会以牙还牙后，他们就都大笑起来。母亲为此经常嗔怪他说：“吉姆，她是位年轻的小姐，你这样难道是教她做个淑女吗？”

父亲坚持说：“她需要学会如何开玩笑。”他认为这种幽默自然的打闹玩笑是培养幽默的语言玩笑的先决条件。他决心给她指明生活并非总是一本正经的。

海丝最初不知如何对付她的外公。有很多次，他假装生气地讲话或开玩笑，把她气哭了，跑出房间去。母亲斥责说：“你瞧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走得太远了。”

父亲摇摇头，说：“外边的世界并不风平浪静、温文尔雅，琼，如果海丝不学会忍受一点嘲笑，她将如何能变得足够坚强以生存下去呢？”

父亲是对的，他的努力不久就得到了回报。我父亲和小女儿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时常常可以听到发自肺腑的笑声，表现出相互之间深厚的喜爱和感情。

我也开始欣赏并受益于海丝性格的这种新发展，不久，我也能用自己以前从来未想到过的方式来与她幽默一下。

有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忘了海丝的听力障碍，当她在另一个房间时，想对她讲话，或者当我们正在谈话时，我漫不经心地走到她看不到我的口型的地方做事并继续和她交谈。当她听不懂时，我就假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你是聋了还是有别的毛病？”（若海丝的一些朋友在场时，你会看到我的这种过错在她们脸上引起的惊讶表情。）但是，海丝会笑着回答我，“我本来就是聋子，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

海丝慢慢地，但却实实在在地有了很好的幽默感，这主要应该感谢我的父亲。这丰富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但是，海丝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在与我父母共同生活期间受益巨大的人。我并没有意识到，近来我们的家庭创伤使得我和女儿们的感情变得多么的脆弱。但是，我父母的稳定婚姻和充满浓浓亲情的家庭，为我们受伤的心灵提供了一贴有效的安慰剂。

我在刚刚经历了婚姻的痛苦结局后，就不得不离开我尚未卖出的房子和割舍不开的生活，抛开熟悉的一切，把最亲密的朋友留在三小时的路程之外，在一个新地方开始新的工作，并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挤在一间卧室里，她们各自也都不得不面对这些变化。我承受着难以言表的压力，我虽能明确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但尚未能全部理解它。从分居到离婚的痛苦折磨开始以来，我无法规律地吃饭或睡眠，体重已下降了二十五磅多，我的身体几乎崩溃了。

我憎恶自己现在的形像：一个感情不稳定的女人，失败的婚姻和失控的感情使我变得恐慌和脆弱；一个越来越爱抱怨的女人，头脑中报复前夫的想

法时时威胁着我自己和我的亲人。我对自己说：“你不是个神经质的、爱抱怨的人。”至少我以前从未如此过。由于我不再能把握自己，我的自信心也随之消失了。

当离婚带给比尔一种富于希望的新生活时，我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困难却依然如故。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再有他的任何一点帮助，而且家庭收入也突然减少一半。此时女儿们成了系接我和比尔的唯一纽带。我想她们同样面对离婚的比尔，或者至少知道比尔是导致我的消极情绪的根源，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们没有和我同样的怨恨。

那时我与海丝、梅丽莎之间经常出现持续性的低度紧张状态，每次周末她们从多森回来时，似乎都要发作一次。我知道她们在受夹板气，每当她们从比尔那里回来，我都要问：“你们的旅行怎么样？你们的爸爸带你们去哪儿了？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她们觉得我在试图从她们口中打探有关比尔的情况。她们过得很愉快的事实，使我在潜意识里有点心烦意乱。所以，在她们回家后的头一两天里，我们经常至少会有一次大的争吵。

一段时间以后，当我努力不向她们询问有关探望比尔的情形时，她们又指责我不关心她们。我无法摆脱困境，也无法消除认为自己是这场交易中唯一的输家的感觉。

以前，我永远是我女儿们生活中各方面的靠山。可是离婚和必须探望比尔这件沉重的、我又完全无能为力的大事，改变了我的形像。我们甚至无法做到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件事，我感到家中一贯的融融亲情被关闭和掠夺了。我觉得它只能增加怨恨，强化紧张状态，使我们的冲突升级，成为似乎无法控制的恶性循环。

当然，并非所有的事都那么糟。同住在一间卧室里，确实让我们保持了必然的肌肤亲近，从而促使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寻求生存。而且，每个女儿也都从那年的学校生活中，留下了自己值得纪念的最精彩的回忆。

当伯明翰有名的亚拉巴马芭蕾舞团要在亚拉巴马艺术学校的学生中挑选演员，参加他们的由专业演员演出的重大年度节目“胡桃夹子”时，海丝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出现了。

海丝扮演童话中的一个拟人植物，虽然她扮演的算不上重要角色，但这仍然是在整个假期中令她激动不已，倍感骄傲的相当重要的事件。

当我坐在大剧院里，观看自己的女儿第一次与专业芭蕾舞团同台演出时，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三年前的情景。海丝去聋儿中心学校的第一年回家过圣诞节时，我的父母、斯蒂芬妮和我带了三个女孩去看亚拉巴马芭蕾舞团演出的“胡桃夹子”。我记得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地看着海丝那副出神入迷的样子。她坐在座席边上，紧握剧院楼厅的扶手，目不转睛地看着舞蹈演员。我很想知道，她到底能听到多少管弦乐队的演奏，因为她看去显然是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此后，我才明白海丝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才能。尽管她只能听到一小部分乐曲，但是，她对音乐、舞蹈的热爱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她能够凭感受想像出其余的部分，从而欣赏全部的演出。

那天晚上，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海丝兴奋异常，兴高采烈地不停谈论着演奏家和舞蹈家。她宣称：“总有一天我也要参加演出，我要在亚拉巴马芭蕾舞团的‘胡桃夹子’中跳舞。”

大部分时间我只是默默地听她讲，欣赏她的激动和梦想。但是，当车停在十字路口，路灯的光亮足以让她看到我的口型时，我转向她说：“海丝，

那将多棒啊！到那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看你跳‘胡桃夹子’中的克莱拉。”

现在，她的梦想已经实现。她演的是不是主角对于我无关紧要，即或她演了主角克莱拉，也比不上我现在为她感到的骄傲和快乐。

那一年，海丝的另一个值得纪念的精彩事件是她的十六岁生日。为了知道它为什么如此特殊，首先需要了解一点背景情况。我记得从很早的时候起，海丝和上帝之间就一直有着亲切而意义深远的个人交流。但是，当她参加集体礼拜时，她发现自己的听力是个很大的限制，使她对教堂中进行的事理解甚少。我的记录无法快到帮她跟上布道，甚至当我们坐在前面，能够比较容易地唇读时，她知道还有许多讲话被遗漏了，她为此感到格外烦恼。

不管你是不是相信，后来电视在海丝的宗教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将电视摄像机调节到零时，可以看到许多讲话人面部的特写镜头，所以海丝从电视上比从当地教堂的礼拜中能得到更多的宗教灵感。我和她定期地看很多的电视报道，她特别喜爱的一个节目是每周一次的南加利福尼亚的罗伯特·舒勒博士的布道节目。我认为他吸引海丝（也吸引我）的地方，是经常强调信仰的重要性，以及信仰的巨大威力。海丝每周看舒勒博士节目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是最先使用闭路电视的节目之一。最后一个原因是，海丝能够跟上这个节目的每一步拍节。

斯苔希和汤姆结婚后不久，就搬到了南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们曾一度参加奎斯托大教堂的礼拜，并做志愿者工作。她偶然告诉一位同事，自己的妹妹海丝如何欣赏每周的闭路电视节目，海丝认为舒勒博士有多好，以及她多么希望告诉舒勒博士，他的布道对我们家庭的意义。她的同事听完后说：“你应该给舒勒博士写封信，把你刚才告诉我的事写给他。也许他会给你妹妹打个电话或是写一封回信。”

斯苔希问：“你认为他会这么做吗？”

同事回答：“问一下总没坏处。”

斯苔希就这么做了。大约一周以后，在海丝过生日前，我接到舒勒博士秘书的电话。她说斯苔希的信让他们深受感动，舒勒博士希望给海丝打电话，祝贺她生日快乐。但是，2月24日那天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他是在旅途中。然而，如果他能将这件事挤进日程的话，他将设法溜出去打电话。所以，我给了秘书一个我们能在家的时间表。但是，我没有告诉海丝，因为我希望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另外，一旦事情办不成，免得让她失望。

我能想像，如果真的来了电话，海丝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她会不相信，会认为是另外一个人，是外祖父开的玩笑。因此，我在电话打来之前，作了些特殊的准备。

在约好的时间里，电话铃响了，我迅速跑去接电话，肯定了来电话的人是谁以后，立即叫海丝接电话，我说：“这是你的电话。”

“是谁呀？”当我递给她电话听筒时，她问道。

“一个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和你谈话的人。”我告诉她。

她将听筒举到耳边，说：“喂！”以后，电话中传出一个人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我高兴地看到她脸上露出的迷惑不解的表情，歌声一停，她问：“您是哪一位？”

突然间，她的脸上布满了怀疑的表情，“这不可能，不，您倒底是谁呀？”她问道，“是外祖父吗？是我的外祖父请您给我打电话的吗？”

正在那一刻，我举起早已准备好的指示牌，上面写道：“是的，海丝，这确实确实是罗伯特·舒勒！”

当她知道这是真的以后，睁大了眼睛，说：“您是罗伯特·舒勒？”我猜她最后开始辨认出他的声音了，“真的？是您？妈妈，这真的是罗伯特·舒勒。”

我笑着用唇语说：“我知道。”

“我每周都看您的节目，”她告诉他，“您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呢？”

他告诉她有关斯苔希的信，他们又谈了几分钟，直到他不得不走时才停止。一整天，海丝情绪高涨得像个断了线的风筝。她想给每个人打电话，让他们知道罗伯特·舒勒亲自打电话给她了，还唱了“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她不停地讲：“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其实我也如此。当我打电话给斯苔希，告诉她这一切时，我和她开玩笑：“以你在南加利福尼亚住了这么长时间的经验，你是不是可以动员罗伯特·雷德福特在我过生日时，也打个电话来吗？”她笑着答应设法去办。

又有两个月过去了，我知道海丝和我在那个春天，必须作出一项严肃的决定。几个月来，我一直害怕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亚拉巴马艺术学校的舞蹈科目对于海丝来说有多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如果她将来想以舞蹈为职业，那么对她来讲，在亚拉巴马州没有比那所学校更好的地方了。但是，我刚刚卖了在多森的房子，到了应该考虑搬出我父母的家，为我们自己找个房子的时候了。而且那年夏天，梅丽莎就要追随斯苔希的足迹走进空军学院，到秋天家中将会只剩下我和海丝两个人在一起了。如果只靠我自己一个人来完成海丝全部课程录音带的转译工作，我想，我们俩人谁也无法保证能有足够的维持生存的睡眠时间，谁也无法保证继续达到学校在学业方面的要求。

我认为，应该让海丝转到附近的伯利中学来学习。由于梅丽莎已经在那里上学，海丝会对它多少有些了解。我已得知这个学校可以安排人专门负责与海丝的联系，以保证她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再者，亚拉巴马半数卡车司机的传呼声不会再干扰海丝的听力训练器，这样她就可以听懂课堂上大部分的讲课。

重要的时刻来到了。那天，海丝带回家下一年的入学登记表，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低声祷告，祈求上帝帮助，然后说：“海丝，你在亚拉巴马艺术学校渡过了艰难的一年，我认为这对你非常好，特别是对你的舞蹈训练大有裨益，你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家不能够再像今年这样过下去了。”

“我懂，”海丝回答说，“我认为与舞蹈相比，我的教育更加重要。”

她的回答是对我祈祷的感应。

我们谈了一会儿有关各种选择的问题，当她讲到自己跳舞的经历时，我发现她在亚拉巴马艺术学校学到的东西比我估计的还要多。她已经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在做决定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事情的各个方面。她看到有些人对跳舞几乎着了魔，她说：“我不愿像那样。”作为一个母亲，我由衷地为她的成熟和智慧感到骄傲。

海丝告诉我，她很高兴能转到伯利中学学习。实际上，她期盼着再次进入一所正规中学，翘首期待着那里新的机遇和环境。我向她保证，我们将设法帮助她能够在附近练习舞蹈。但是事实上，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去办。

## 第十五章 面对生活

伯利中学没有正规的芭蕾舞课程，于是我们只得为海丝找一位私人舞蹈教师。海丝的舞蹈训练已经大有进步，现在必须每天进行练习并接受指导，这样才能保持和提高她的舞蹈技能。我猜想，这种强化的私人舞蹈训练计划所需的费用，即使我们能承受得起，也必定高得吓人。

这段时间我也在开始考虑，我们应当让海丝重新接受定期的语言矫治。到这时为止，我们已经离开多森近一年了，在这期间，海丝未能再到黛安娜·斯廷兰那里做定期治疗。虽然我不能说现在海丝的语言能力退步了，但我认为她也没有什么大的进步，而在前些年，海丝的语言能力一直在明显地提高。这种情况令我担心，海丝的语言能力是不是已经到顶了，或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

当我开始在伯明翰打听学语矫治的费用时，发现这里，即使是私人基础语言矫治费用也高至每小时一百二十五美元。（而且还不是声觉语言矫治方式，因为当时除黛安娜外，在本州很难找到受过这种训练的语言矫治专家。）这就使我更深切地感到，黛安娜对海丝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和专业帮助的难能可贵。

我根本负担不起海丝的舞蹈和学语矫治的辅导费，而且梅丽莎秋季上大学的费用也没有着落。科罗拉多的空军学院已通知梅丽莎入学，并提供四年的全额奖学金和免费食宿，但每个月的其他花销，包括隐形支出（交通、服装等）的其他开销也为数不少，仍需要由家里承担。

要求比尔分担一部分这些“额外”的费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只得找我的律师商量，决定和比尔一起再上法庭，要求修订关于子女抚养方面的协议。因为原协定中规定，从梅丽莎满十九周岁起，比尔就不再为她提供抚养费，而我则希望能延续到孩子大学毕业，这样我就可以保证梅丽莎在大学期间每个月的其它开销了。律师认为法庭不会作出对我们有利的判决，但不妨试一试，也没什么坏处，也许会有机会为海丝争取到一些附加抚养费。

我为此作好准备，然后回多森向法庭提出申诉，在这过程中，我感到极大的愤怒，同时也十分灰心丧气。我意识到自己在感情上依然十分脆弱，比尔对我的生活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让我的心中更增添了许多沮丧与懊恼。怀着这样的心情，在法庭上对质绝对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

结果，法庭判决维持原协议，即从梅丽莎十九周岁起，比尔不再为她提供任何抚养费。法庭还补充说，海丝的舞蹈训练不属于语言矫治手段（虽然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舞蹈是一种语言训练方式），而且海丝在学校成绩不错，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矫治辅导。这样，为海丝和梅丽莎多争取一些抚养费的努力便彻底落空了。但这次申诉绝非一无所获，法庭认为鉴于海丝失聪的特殊情况，要求比尔每月为海丝提供抚养费，直到海丝能自食其力为止，而不能以十九岁为限。由于我们对海丝上大学的费用毫无着落，这项重要判决使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抱有一线希望。

这次法院听证还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收获，那就是我突然开始感受到了上帝的帮助，并且意识到，数月来他一直锲而不舍地在试图帮助我。

回首往日，我可以清楚地感到上帝是如何通过我父亲和我谈话的。我记得父亲曾多次与我促膝谈心，一遍又一遍地开导我如何对待离婚的受挫感。他告诫我，对比尔的怀恨抱怨会影响我与女儿们的关系，我不应该期望女儿

们产生像我一样的痛苦、愤怒和怨恨。他提醒我，比尔终究是女儿们的父亲，她们永远需要父爱，需要与父亲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尽管我对父亲的肺腑之言并没有完全理解和接受，但他对事物的准确洞察和充满哲理的见解已开始渐渐渗入了我的心田。

上帝还通过教会的活动在与我和女儿们交流。我从小就是在基督教卫理公会的氛围下长大成人的，到多森后又加入了比尔从小就信仰的圣公会，现在，女儿们和我又开始参加浸礼会，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伯利中学的许多孩子还参加了萨德山浸礼会的活动，那里基督教青年的活动十分活跃，女儿们很快感到那里自由自在、温暖如家。

我参加了多次“单身者周日学校”的活动，结识了许多能够理解我的痛苦的人。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世界上唯一遭此大难不幸的人。”现在想起来这种说法真是太天真了，简直像是电影中的台词一样。但是，在离婚后很长时间内，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我猜想，当一个人经历了巨大的个人痛苦时，会失去正确看待事物的能力，也会像我这样想，“世上还从来没有人曾经经历过这么倒霉的事”。

然而在周日学校，通过与周围同伴们的客观讨论和推心置腹的交谈，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艰苦跋涉的人。周日学校中的一些人（或许多人）曾经有过和我相同或比我更不幸的遭遇。每当我感到寂寞孤独时，我能体会到我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因为上帝永远与我同在，时刻在支持着我。上帝通过我在萨德山浸礼会得到的支持和友谊，在治愈抚慰着我受伤的心灵。

最后一次开庭结束后，千头万绪似乎汇集到了一点。虽然我不能说亲耳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但我的心灵确实感受到上帝在清晰而严厉地对我说：好了，达芙妮，为了海丝的将来，法庭已经给了你一些额外的支持。难道你不觉得现在该面对未来了吗？难道你还要继续沉浸在愤怒和怨恨之中，让辛酸痛苦啮蚀你的心灵、破坏你和别人的关系吗？你看不出女儿们需要母亲？你不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海丝需要你的支持？事情过去快两年了，你不觉得现在该面对自己的生活了吗？我随时会帮助你，你准备再次相信我吗？

我告诉上帝，我遵从他的旨意。我将振作精神，不再怨天尤人。然后，我向每个女儿道歉，告诉她们我感受到了上帝的旨意。离婚后我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其实我自己也不喜欢那样。尽管我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好让我改变那一切，但这是办不到的，我告诉孩子们，我对她们太不公平了，因为我希望她们像我一样地对待她们的父亲。我过去总是沉浸在痛苦之中，放纵自己的情绪，结果是破坏了我和她们的关系。上帝帮助了我，在今后的岁月里，我要做一个更好的母亲。

我不能说上帝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我。但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我的生活里第一次呈现出灿烂的光彩。我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和女儿们的关系。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开始逐渐找回自己以往的自信，自我感觉也好些了。然而，这只是开始。

我们经济上的压力并没有丝毫的减轻。我无法同时负担海丝的舞蹈训练和语言矫治所需要的费用，这样，我们选择了去上舞蹈课，而某些矫治训练只能由自己承担。因为多少年来，尽管是非正式的，我天天都在作着语言矫治方面的辅导，以巩固在黛安娜那里定期治疗的效果。现在，当我们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家就成了一个强化语言练习的实验室，从早到晚二十四

小时从不间断。每当我母亲、斯蒂芬妮或我听见海丝说错了话或发音不正确时，我们都会纠正她，直到她做对了为止。

我想，家庭和我也许能够为海丝提供合适的语言矫治。但是，海丝要进一步训练才能成为一个舞蹈家，而我们却无法对她进行必要的专业指导，这笔钱我们非花不可。舞蹈训练的费用十分昂贵，我父母主动为我们提供了帮助。

有一天，斯蒂芬妮和我谈起了伯莱尔坞芭蕾舞团的一些事。她告诉我，这个芭蕾舞团实际上隶属于附近伯莱尔坞长老会教堂，她的一些亲戚的孩子也在那里接受训练。

我了解到这个舞蹈团是牧师的妻子芭芭拉·巴克成立的，她一直梦寐以求的事业就是建立一个基督教舞蹈团，专门从事舞蹈教育和演出，并借此献身于上帝。想起家里人以前和海丝开玩笑，说她有一天会成为“舞蹈修女”，我笑了，心想“这对海丝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们做了进一步的了解。海丝和我发现，芭芭拉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舞蹈教师，这里的舞蹈计划有许多长处。尽管提高班秋季的名额已满，但看过海丝跳的舞蹈之后，芭芭拉做了特殊的安排，将海丝编入水平最高的一组。

海丝非常喜欢伯莱尔坞舞蹈团日常的训练和频繁的演出，并且不久就意识到，她可以用舞蹈表达自己对上帝的崇敬之情。

那一年，海丝在伯利中学过得也很开心。三年来海丝转了三所学校，对此我曾经有点担心。但梅丽莎比海丝早一年就到了伯利中学，这使海丝对这所学校感到亲切。同时，海丝在教会的青年活动中也认识了许多伯利中学的学生，所以她很快就适应了这所学校。

然而，就在梅丽莎去科罗拉多之前，我们家那辆旧的棕色大轿车彻底坏掉了，海丝和我突然陷入了交通窘境中：下班后我根本来不及从我的学校赶去接海丝，然后再送她去参加舞蹈训练。但通过我们发挥自己创造性的想像力，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虽然解决的方式有点“标新立异”，但十分简单。具体安排是：早晨由海丝（在亚拉巴马艺术学校时，她在伯明翰市区的街道上接受过驾驶训练）开车送我去上班，然后再开车去伯利中学上学、下午放学后她开车去上舞蹈课，五点钟左右再开车赶回胡佛市接我回家。

一些同事和我开玩笑，说我们家妈妈蹭女儿的车，而不是女儿搭妈妈的车。但这种安排还真管用，下班后我不用再像以往那样开车赶路。每天在等待海丝来接我的这段时间里，我一般都能批改完作业、准备好第二天的课程。海丝接我回家后，我就可以用晚上的时间来帮助她学习。

幸运的是，对海丝来说伯利中学的学习环境要好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胡佛市的学校体系有优良的教学条件和从事特殊教育的人员。海丝每天都有一个小时和她的特别指导老师莉萨·阿姆斯特朗在一起。莉萨是一个受过训练、专门从事聋哑人教育的注册教师，她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海丝和每位教师进行交流。实际上，莉萨为海丝做的许多事就和我在多森时所做的一样。那时海丝正在上小学，我每天都得提前找出课堂上要学的材料，让她有针对性地预习，向老师了解她是否能理解各种作业和进行正常的交流，防止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或产生的误解。莉萨不仅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好，而且还成了海丝的亲密朋友，对海丝充满信心。有多少个夜晚我都在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让我们遇见了莉萨，感谢上帝引导我们作出了把海丝转入伯利中学的决定！

现在，海丝在课堂上又可以使用听觉训练器了，而且耳机里再也没有卡车司机不停的谈话干扰声，她好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为了防止海丝听不懂老师讲的话或是对内容有疑问，我们还是把课堂上的一些讲课录下来，可现在我们不必像以前那样把课堂录音整理成文字了。高中一年级时，海丝的成绩一般都是 A 和 B，但我们不用像在亚拉巴马艺术学校时那样，为此花费大量的心血和眼泪了。

似乎总有一些新的事需要我们考虑，并为此花费精力。这真是太好了。

在海丝上高一时，我们开始考虑她将来上大学的事。当第一次得知海丝重度耳聋时，有人曾经估计她最多只能达到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尽管如此，我却一直相信海丝有一天会上大学，海丝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

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大部分私立学校很快就被我们排除在了选择之外。我们确实考虑过南伯明翰大学，因为那里的舞蹈课程出类拔萃，但该校没有专门为聋哑学生服务的人员和条件，我们只好放弃。在莉萨·阿姆斯特朗的鼓励下，我们对隶属于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系统的伯明翰—亚拉巴马大学、蒙得维罗州立大学和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三所学校进行了仔细的了解。莉萨认为这三所学校能提供海丝所需要的学习条件。我想海丝和我都倾向于选择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因为该校有许多聋哑学生，学校提供的特殊服务设施也受到广泛的好评，聋哑学生在那里不仅可以跟上正常的学习，而且可以过上正规的大学生活。那一年，我们参观了这三所学校，结果似乎更坚定了我们为海丝所做的选择。

我们在一个周末参观了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我想我和海丝一样对这所学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的教师富有经验，全身心地帮助听力有困难的学生取得成功。不仅如此，他们还坦率、诚恳地回答了我们的所有问题，丝毫不掩饰海丝将会面临的困难。

我特别欣赏丹·米勒先生亲切而又直接了当的谈话方式。米勒先生是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聋哑学生服务项目的主任，他告诉我，如果海丝不会用手语进行交流的话，那她将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我们为每一个有聋哑学生的班级配备一位受过训练的手语翻译，我们想把听力有缺陷的学生尽量组织在一起，至少是在一起上基础必修课，这样一个教员就可以同时为几个学生进行翻译。我们的译员只能用手语，因为这是他们与所有学生进行交流的唯一一种通用方式。如果海丝不能和其他聋哑学生一样懂手语，那她将根本无法利用我们学校为听力有缺陷的学生提供的一种最主要的帮助”。

从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开车回家要花九十分钟，我们在途中讨论了丹所说的话，“妈妈，”海丝对我说，“我得学会手语。”

我猜想，海丝以为我会对此表示异议，然而我却说“如果你想学手语的话，我想现在也许是时候了”。这话或许会让海丝感到吃惊，我得承认，长期以来我一直坚决拒绝“专家们”让海丝学手语的建议，这时我还是有点想说“这没有必要”或者“现在不行”。

我以前反对海丝学手语，是因为我认为海丝以后总能学会它，但她必须先巩固口头表达技能，而对她说这要难掌握得多。说心里话，我知道海丝也许总有一天要学手语，用手语作为第二语言来辅助第一语言——英语。如果到时候是这样的话，我想那时她已经具备了最好的能力来同时进入两个世界：我们大家生活的有声世界和另一个较小的、有其丰富而独特内涵的无声世界。

我从始至终（现在依然）自信不疑：正是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口语训练，并且随后能够百折不挠地坚持听觉语言方式，现在海丝才会具有进入两个世界的可能。而且，我不再耽心“学习手语会妨碍海丝的口语交流”之类的问题，海丝已经证明自己能够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海丝长大了，有能力作出自己的判断了。

当海丝学习手语，为自己能够掌握并具备接受无声文化的能力而感到高兴时，我还未意识到一生中的这一刻是多么艰难。纵然如此，我依旧认为，即使在一开始我就明白了其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当涉及到海丝的教育问题时，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同以前一样的选择。

当莉萨·阿姆斯特朗得知海丝想学手语及其原因之后，便与高中的管理部门协商，准备从下学期开始组织一门“英文手语”课。伯利中学所有感兴趣的学生都可参加，虽然海丝是班级里唯一的失聪生，但是有十几个听力正常的孩子也和她一起选修了这门课，共同学习手语。

这些孩子中有一个叫米莎·琼斯的聪明可爱的女孩，后来成了海丝高中时期最亲密的朋友。两个女孩发现她们日益娴熟的手语，为俩人初露头角的友谊，平添了一分美妙绝伦的情趣。她们不仅具有了一种秘密语言，使她们能够在拥挤的大厅过道里公然进行绝密对话，而不必担心泄露机密。并且不论上什么课，俩人都可以随时交谈，从不会惹得老师生气。放学后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可以坐在车里你来我往地说个不停，直到分道而驰为止。

我想两个女孩之所以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是与米莎坚持不懈学习手语的努力分不开的，她以此证实了自己对友谊的珍视和投入。换句话说，她的行动无疑向海丝表明，她已完全接受了朋友的一切，包括海丝的残疾。

我知道，那时海丝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用这种方式接受她，尽管如此，和绝大多数十几岁的孩子一样，海丝渴望融入群体之中，不愿意离群独处。因此，她总是把头发梳成能遮盖住助听器的式样，结果高中的许多同学竟然一直不知道，海丝是个失聪的姑娘。

我记得一天下午，海丝放学接我回家，她告诉我有一位熟人问她：“你是不是太势利了，为什么我在大厅里向你打招呼，你居然不理我？”

“我不过是没听见而已，”海丝向我抱怨道，“现在可好，她觉得我是个势利眼儿。这真让我伤心，妈妈，其他人会不会也这么想？”

“也许会吧，”我告诉她，“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公开你的听力毛病，告诉你周围的人，你的听力受损，提醒你的每个朋友，如果她们想和你谈话，必须在你能看到的情况下，直接对你讲。”

海丝最终还是试着采取了坦然和直率的态度。但这种做法也有不利的一面，午餐时的情况尤其糟糕，她觉得几乎不可能从餐厅不停的喧闹声中捕捉到她要听的声音。这样，她只能靠注视同餐桌人的口型来判断他们在说什么。“我老得让朋友重复我听不清的话，”她承认，“我自己都烦了，我想他们有时也会烦我。所以，周围人笑的时候，我只好跟着笑。我想参加对话，但我做不到，这真不是滋味。”

当海丝告诉我这些时，我几乎要哭了。海丝很痛苦，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朋友们之外。听着她的诉说，看着她那痛苦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

虽然海丝在学校有不少朋友，但我知道她的社交圈子相当有限，这点我倒并不特别担心。她每天参加舞蹈训练，晚上花很多时间完成学校的作业，实在也没有时间或精力去参加社交活动。海丝坚持去参加教会的青年联谊活

动，在那里她感到可以和大家融为一体，只要时间允许，她尽量参加那里的每项集体活动。

海丝在高中实际上从未真正体会过与人约会的情形，对此我并不感到担心。海丝告诉我，她打算参加学校的舞会，哪怕她得自己去邀请男生和她一起去。说这话时她眼神里充满了自信，我真感到高兴。她心中一定有了候选人，但只是不知道那男孩会不会接受自己的邀请。

我理解海丝的担心，如果那男孩不愿和她一起去的话，她会有遭人拒绝的感觉。我也有同样的担心。

我尽力劝说海丝，任何有头脑的男孩都会乐意接受她的邀请。可是我也知道，总会有几个男孩不是那么有头脑的。因此，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最后我们学校的一位教师朋友告诉我，她有一个漂亮的儿子，正在上大学，最近刚和女友分手了，如果海丝邀请的话，他一定会很高兴地与她一起去参加舞会。当我安排好了这个“备用方案”后，我鼓励海丝大胆些，去邀请她第一次选中的舞伴。

然而，我告诫海丝，男孩子说“不”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多样。有些高中男生仅仅是因为一见到漂亮女孩就惊慌失措；有些男生则可能不那么成熟或缺乏必要的自信；还有些或是由于和一位失聪姑娘约会他们会觉得不自在。如果那位男生真的说“不”的话，我希望海丝不要介意，别把它当作是对自己个人的拒绝。

其实我根本不必担心。大卫接受了海丝的第一次邀请，和海丝一起参加了她的第一次舞会。他们在一起显然玩得很开心，因为在那学期结束之前大卫又来邀请过海丝好几次。

总的来说，海丝在舞会上的经历要比她第一次和男孩子的“约会”好得多。其实，那次值得记忆的失败还算不上是一次“约会”。我记得那好像是海丝在聋儿中心学校的最后一年，回家度春假时发生的事。出于某种原因，我和女儿们谈起高中时我和一个双胞胎约会的事。最初几次约会时，我总是不敢肯定他究竟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一位。但是，在我真正认识他之后又发现，他们兄弟俩其实并不像我开始接触时感觉的那么相像。

我想，这件事让斯苔希生出真的开一个大玩笑的念头。虽然斯苔希和海丝年龄相差四岁，但两人长得很像，以至于有好几次斯苔希学校的朋友们看见她的妹妹时，竟一时辨不出谁是谁。那天晚上，斯苔希的男朋友本恩正好要来接她去约会，斯苔希想试试看能不能糊弄住他。

我们都认为这个玩笑会非常有意思。我们让海丝穿上斯苔希的外套，把她的发型整理得和姐姐的一模一样。当本恩来按门铃时，我请他进了灯光昏暗的客厅，告诉他斯苔希一会儿就来。斯苔希则在屋里大声道歉，“对不起，要迟到了，我马上就来。”接着顷刻间，海丝急急忙忙地走进客厅，直接朝大门走去。她一句话也没说，本恩根本一点儿没看出有什么破绽，两人穿过门廊，上了门前的小路，一直朝本恩的汽车走去。斯苔希看着他们走了出去，急切地想知道，究竟要过多久本恩才会发现上当了。

我不知道海丝当时想到了什么。也许，看见汽车时她意识到了，自己马上就要和一个把她误认作斯苔希的陌生男孩乘车出去了；也许，她发现自己不知道在即将到来的令人尴尬的约会中该说些什么。反正不知是什么原因，海丝突然顶不住了。

“噢，天啦！我干不了这个！”海丝尖叫着跑回屋里，把那个手足无措

的十几岁男孩子撒在身后，目瞪口呆地站在路边。这时，我正站在门廊外，笑得差点儿喘不上气来，斯苔希也走了出来躲在我身后笑个不停。本恩脸上那副莫名其妙的窘态，更加使我们无法控制地笑得前仰后合。

我和斯苔希过了很久才止住自己的笑声，向本恩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我想本恩可能觉得这事一点也不幽默。也许正是因为这件事，他以后再也没和斯苔希约会过。

我知道，应该向这个男孩道歉，但我却一直没有这么做。现在我该让他知道，他曾经和未来的美国小姐进行了她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短的一次）“约会”，我只能希望这一点让他感到某种安慰。

## 第十六章 跨越两个世界

海丝在从初中进入高中时，到密西西比的杰克逊郡参加一个宗教巡回舞蹈团，玛格尼凯芭蕾舞团主办的暑期学习班。那儿的经历加强了她第一年在伯莱尔坞感受的一切：舞蹈是证明上帝、膜拜上帝的一种优美而生动的方式。

在密西西比的那段时间，玛格尼凯芭蕾舞团的成员对参加学习班的年轻人讲述芭蕾舞团的历史、现在的职责以及将来的目标，告诉她们这个芭蕾集体是如何生活、工作并在全国各地为教堂和学校巡回演出的。这些年轻的职业舞蹈演员把她们的环境描绘成一幅令人兴奋又极富诱惑力的图画。在学习班的最后一天，当玛格尼凯芭蕾舞团团长感谢学员们的参与，赞扬她们的进步，并表示希望她们在毕业后考虑再回来加入舞蹈团时，海丝当时就准备签约。

“我想是上帝的旨意要我成为一名舞蹈家。”她回家后告诉我。

“也许是的，海丝，”我对她说，“我怎么可以违背上帝的旨意呢？不过我敢肯定，上帝也希望你能受教育。”

可上学对海丝来说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从而可能促使海丝渴望去跳舞，也可能她被作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的生活魅力所吸引，当一名舞蹈家成了她最大的梦想。无论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海丝开始考虑要不要再继续上学。如果要当一名舞蹈家，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当作职业呢？她想立刻就加入玛格尼凯芭蕾舞团。

“海丝，也许上帝真的要你成为一名职业舞蹈家，不过一切还没有确定，至少现在玛格尼凯芭蕾舞团还没有给你具体的职位，在这之前，你得准备上学。”我的这番话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海丝觉得我的话违背了上帝的意愿。显然她把玛格尼凯芭蕾舞团对学习班学员的口头许愿“希望以后加入我们”当成了正式的个人邀请。我的异议使她觉得，我不仅是在反对上帝对她的安排，而且是在怀疑她的天分。经过这么多努力，长期以来我一直在鼓励和肯定海丝。我非常不愿意做一个不支持孩子，给孩子的梦想泼冷水的母亲，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正在这样干。

在海丝的一生中，我所遇到的人们都认为我不现实，想教育重度耳聋的孩子与人交流、想让一个失聪的女孩进舞蹈班、坚持让她受常规教育、还有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不过今天我想实际一点。

我意识到自己处于尴尬的地位，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所以我继续诚恳地与海丝交谈，重点放在教育的重要性上。“你中学毕业后，如果芭蕾舞团聘用你，你自然有很多机会开始你的舞蹈生涯，甚至成为芭蕾舞团的台柱子，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后情况又会怎样呢？很少有几个职业舞蹈家能永远跳下去，你得有个退路，所以必须受教育。”

这个说法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我用“退休”来吓唬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或说服力，所以我赶紧换了一种方式。

我调查了玛格尼凯芭蕾舞团。该团的专业性和职责给我印象很深，如果海丝大学毕业后加入它，我会很高兴，我还知道这个宗教舞蹈团不能自给。舞蹈演员像其它地区教堂的“传教士”一样，大部分的生活费用得靠自己。于是我告诉海丝：“如果你想以此作为终生职业，你得考虑一下经济来源。你经济上总依靠家里和朋友，你会幸福吗？你是否想有另外一份工作来弥补你作为职业演员的清贫呢？”

我想“独立”对于一个要强的孩子来说，比“退休”更能引起她的注意。我做对了。海丝把独立当成头等重要的大事。

“那么好好想想，你有可能选择哪些职业？最好的办法是根据自己的优势来考虑，你最喜欢什么课？”我知道她会说什么。“数学，”她回答，“不过我并不想当一名数学教师。”

我意识到她的防卫又开始了，我得赶快撤退。“我不是因为我是数学教师，所以希望你也得作一个数学教师。”我对她说，“很多工作都用得上数学的技巧，记得妈妈在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采访丹·米勒博士吗？”我们曾问他最适合于耳聋学生的大学专业有哪些？他告诉我们，许多听力残疾的学生在财会方面很有天份。

“我记得。”

“以你的数学优势，财会或许是个很好的选择。我认识一些会计师，他们生活得很好。你可以全职或是半职地干一阵，同时仍然可以跳你的舞，到年龄大些的时候，你或许想自己办一所学校，晚上或周末教舞蹈。受过正规训练的会计总会有人雇佣，会计看起来是一个牢固可靠的职业，有了它，你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海丝觉得有一定道理。我不能肯定她是否已放弃了去玛格尼凯芭蕾舞团的想法，但至少我们又在谈上大学了。海丝后来在上高三时选修了会计入门，以获得一些感性认识。

每当我和海丝谈起上大学一事，钱的问题就来了。即使一所像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这样的公立学校，它的学费也超出我的支付能力。海丝知道我们的经济状况，并懂得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很多大学生打零工支付自己的费用，我也可以找份小时工。”她说。

我很欣赏她的想法，不过重度耳聋，使她必须全力以赴，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在学习上，在大学当然也不会例外。当我告诉她这一点，她作出了让步。但我了解海丝，我知道她不会真的放弃在经济上助我一臂之力的想法。幸运的是她上高中的那年秋天，我们偶然得到了一份最不同寻常的经济援助。

作为胡佛市教育系统的一员，我和凯茜·麦特萨克是同事。一天上班时，她对我说她和莉萨·阿姆斯特朗（海丝的导师）还有弗朗西丝·莫恩（伯利中学的很有献身精神的顾问）谈起海丝。她告诉我，她听说了海丝杰出的舞蹈才能，也知道我们正在寻找大学奖学金的来源，她找我就是为了谈这事的。“你说海丝会愿意参加我们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杰克逊郡少年小姐奖学金赛吗？”她问。

我说现在还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准备？”我问道。她给了我一份前一年的宣传册，我飞快地翻了一遍，看了比赛的目的和目标。他们要求参赛的女孩子必须有气质，具有领导才能、天资聪颖以及其他一些特点。这些海丝都具备，但再认真看看头一年的比赛摘要，我又觉得很玄，摘要似乎很强调课外活动，诸如啦啦队、合唱队、车队、学生会、年刊编辑、荣誉会、辩论会、校际运动会以及各类学生俱乐部的活动等等。

“这些海丝都没参加过，”我告诉凯茜，“她的学习用去了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除了舞蹈和教会青年的活动，其他什么活动她都没有参加过。”

“哦！那没有关系。”凯茜宽慰我说，“少年小姐考虑得更多的是品格，而不是她参加活动的多少。莉萨和弗朗西丝对我说，海丝正是少年小姐所需要的那种女孩。加上她跳舞的背景，我想她很有可能获得那份特长奖。”

我说，我会告诉海丝，看她怎么想，不过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

海丝和我开始的反应一样“这些我都没干过。”她边看比赛摘要边说道，“他们肯定不会要我的。”

我告诉她，凯茜希望她参赛，并且相信她能获奖，尤其是其中的特长奖。于是海丝同意参加下周的杰克逊郡少年小姐赛的预备会议。

我和海丝一起去参加会议，我很惊奇地发现，她显然对此很感兴趣。然而到会议结束时，我们两人都特别失望，因为我们不属于那个地区，海丝不够参赛资格。

我感到一切没什么指望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海丝要求我与我们居住地——谢尔比郡的负责少年小姐项目的人取得联系。我们联系上以后，更令我惊讶的是，海丝决定参加谢尔比郡少年小姐赛，虽然她不认识参赛的任何一个女孩。

我帮她填好了所有的申请表格，然后我们两人才意识到参赛需要花费许多精力和投入，短短的时间竟然有这么多要作的事。我把海丝三年前在斯苔希婚礼上，当女宾相穿的绿裙的袖子拆下来，在衣领处加上一些莱茵石，还做了一些其他加工，把它改成一条晚礼服。为突出海丝的特长，又把她以前的一次芭蕾舞演出裙改了一下。然后用几个小时录音编辑了一段特拉·巴利斯的富有灵感的宗教音乐“无比美好”，把它编辑成特长比赛所要求的时间长度。在十一月赛前的整整两星期里，海丝除了她自己的舞蹈练习外，还须和所有参赛的女孩子整晚整晚长时间地排练。

准备工作可把我忙坏了，但期望、兴奋、紧凑的时间安排使海丝充满了活力。

她第一次去排练时，我还真有些担忧，因为那是在另一所学校，和一群她以前从未见过面的女孩在一起。我想海丝自己心里也没底，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比赛主任和谢尔比郡的一群女孩特别关照海丝，使她觉得自己是她们的中很受欢迎的一员。整体排练时，海丝的舞蹈特长帮了她很大的忙。头一天晚上当她十一点多回家后，她几乎用了一个小时向我讲述她晚上的排练，我这才知道我们两人的担忧是多余的。海丝是如此喜欢排练，急不可待地盼望着下一次排练的到来。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很快活，至少在整体大排练时，排演的舞蹈，使那些没有舞蹈基础的女孩十分沮丧。然而，这些舞蹈要求对海丝来说，简单得就像游戏。

其中，有一个参赛者，她的特长是唱歌，她和海丝一样是为特长奖而来的。她连基本舞步都做不来。“我跳不了。”她在跳乱了不知道几十次舞步后，埋怨道。但当老师宣布休息时，海丝赶忙跑到那沮丧的女孩面前。“快来，我帮你，你一定能行的！来，看我，像这样。”海丝抓住每个机会鼓励她的新朋友，直到那女孩开始跟上来为止。

我是到后来才知道这些的，当时我只知道赛前那段时间，海丝对一切都充满了向上的活力。每晚排练到很晚才回来，但她并不感到精疲力尽，而是兴奋无比，有一种以前我从没有见过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因此，在正式比赛的那个晚上来临之前，我已知道少年小姐赛的整个参与过程，对于海丝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

比赛本身只不过像糕饼表面的一层酥皮，而参与的内涵已远远超过了比

赛的意义。

像许多壮观的大型比赛一样，谢尔比郡少年小姐赛历时三个晚上。前两晚一半参赛者表演她们的特长，另一半展示她们的晚礼服，裁判们从她们中选出十个参加决赛。这十个人将在最后一晚进行她们的特长和晚礼服表演，并在台上当场答问，以展现她们的才能和气质。

在预赛中，海丝身穿绿色晚礼服，舞姿优美、神态典雅。我相信最后大家一定会选择她！虽然，我也承认自己有偏向，但我母亲、我妹妹和她六岁的儿子特雷、甚至包括我那被生抓硬拽来观看比赛的父亲，都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觉得冠军非海丝莫属。

进入最后一晚决赛的小姐们，令我们惊叹不已。海丝被选为十名决赛者之一。之后，正式表演开始了。当海丝身着晚礼服走过舞台时，惊喜使我几乎都坐不住了。轮到她跳舞时，我们都屏住了呼吸（显然观众们都很喜欢）。那晚最最令人紧张的一刻来到了：海丝走了出来，站在台上麦克风前，等待对她的现场“采访”，她能听懂问题吗？她知道问的是什么呢？她会清晰地回答吗？人们听得懂吗？如果海丝不懂的话，她是否会不好意思说请重复一遍？她会不会去猜问的是哪个词？如果她误解了或是说错了，她会觉得自卑，以致半途而废吗？我是多么焦急！

当主持人要海丝向观众解释“目标”一词时（我们在申请表格上为她列了密苏里州冠军），海丝迅速作出了回答，我知道她听懂了这个词。她的回答清晰而准确，我们现在可以放松了，她会赢的。虽然这个预见似乎是太早了。

决赛的选手们又回到了队列里，二十九个女孩最后排成一行，等待宣布获奖名单和谢尔比郡少年小姐的得主。我记得，每个参赛者都有奖。所以颁奖从最低的开始：一百美元。海丝的名字第一次被念到时，是B组的“精神奖”。然后她获得了“全能精神奖”，这是女孩子们自己推举的唯一的奖。授予她们中最有气质或最具互助友爱精神的参赛者。此外，海丝还赢得特长赛第一名。

当所有其它奖项颁发完毕，我们期盼的最后的冠军得主会是谁呢？

“第二亚军，海丝·怀特斯通小姐。”

海丝没有赢。但我们全家，包括比尔，他为了这个晚上专门从多森开车过来，骄傲地拥抱海丝，祝贺她。虽然我肯定，海丝对没有拿到冠军有些失望，但她发现把所有奖金加起来有一千四百美元之多，她可以用这些钱申请下一年的大学费用，这远远超过了她放学后去卖汉堡包的收入。

那晚我回到家中，为我的小女儿感到无比的骄傲，既为特长奖、更为她的“精神奖”。但最令我骄傲的是，参赛官员吉姆·戴维斯对我说的话：“您不知道，您的女儿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对所有这次参加比赛的人是多么大的鼓舞。”接着他告诉我，海丝怎么帮那女孩掌握舞步，他还说：“您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儿。”我感谢了他，并表示这也是我的看法。

当我和吉姆交谈时，他的妻子走了过来，我才知道吉姆就是维基·戴维斯的丈夫。维基是我头一年在胡佛市学校任教时的副校长，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现在她已经是附近一所小学的校长。那天晚上，我们两人很快认出了对方，我当时并没想到这场意外的重逢会带来什么重要的意义。后来，回想起来，我才发觉这是上帝的安排，是他使我们从不能参加杰克逊郡少年小姐赛的失望中摆脱出来，而在谢尔比郡获得了成功。然后他又将我们和吉姆、

维基带到了一起，使他们后来成了海丝和我无比珍贵有益的朋友。

我为吉姆·戴维斯的话感到骄傲，为海丝所获得的奖金而高兴。但最令人鼓舞的是获得了积极的比赛经验，增进了海丝的自尊和自信。全凭她自己，我一点也没有插手，海丝就进入了那全新的环境，不仅被接受，而且赢得了敬佩和尊重。也许这是她一生中，头一次证明了自己、给了她前所未有过的自信。

海丝的高中时代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我知道有时候在学校由于她的听力障碍使她觉得孤独。当朋友们伤害了她，当同学们在谈话时没有顾及到她，当她一个又一个周末坐在家中没有约会时，她有多么难过。有时她受的伤害如此之深，以至于她开始对我送她去常规学校的决定产生疑问。她想如果我们送她去一所聋儿学校，她或许会好过一些。在那里，她和同她一样的残疾儿童一起成长，他们会理解她的无奈和挫折。

但我知道，当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伯利中学毕业的那天晚上她很自豪，而我比她更骄傲。我知道她仍然有些疑惑，然而，就是由于那些疑惑，后来才使我意识到那是几乎每个青年对人生归宿的一种基本追求。此后，使我大感意外的是海丝宣布，她要参加那年六月在塔拉德格的亚拉巴马聋儿学校举行的亚拉巴马聋人小姐大赛。我不知道海丝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说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场大赛，“不过你要参加，我没意见。”我告诉她。当得知获胜者将代表本州参加在丹佛举行的美国聋人小姐大赛时，我想那可是一个去看望我在科罗拉多州的妹妹黛博拉的好机会。因为老实说，她在少年小姐赛中获得成功后，我就猜想她会赢，因为她的特长，更因为在她那个领域里竞争对手极少。

我当然还得学许多东西。

我学得很快——从海丝参加亚拉巴马聋人小姐大赛开始——那是在我们开车去塔拉德格的路上，从我们一路上的交谈中我才开始懂得的。

“妈妈，这个周末对您来说也可能会非常好，那时您将看到真正的聋人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您从不属于那个世界。”当我意识到海丝此时是从聋人的角度看待我，我顿时对那即将到来的一刻充满了不安，我只是听着。但当她说到我“应该学会意识到，听觉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重要和必不可少”时，我真忍不住要流泪。

她说完，我想了一会说道：“海丝你可能是对的，这对我来说很可能会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也许对我们两人都是。我真的很高兴有这么一次机会，并且很想看看这个周末我能学到什么。”

我学到的头一件事便是我的想法是对的：这次经历对我们两人都有收获。当我们到了亚拉巴马聋人学校的校园时，我们找不到宿舍，便停下来向一对年长的夫妇问路。我想他们应该懂得海丝的英文手语，但他们用美国手语回答，而海丝却不大懂。她显然是给弄糊涂了，她又问了一遍，于是那男士又试着指路，这次是美国手语和方向手势相结合。海丝还是不懂，而我就算什么手语都不懂，但从那人的形体语和手势已猜出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于是我点点头，谢过那两人，准备抽身走开时，海丝对我有些不满。“走吧，”我说，“我知道我们该往哪里走。”我忍住笑，心想：看我们这两天谁会觉得不适应。而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海丝已经够沮丧的了。

我们找到宿舍，登记之后。海丝去开参赛者会，我出去散了一会儿步。她终于回来了，我一眼看出她正在为什么事情烦恼。

“怎么啦？”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告诉我，她已见到了参赛的其他几位姑娘，一共只有六人。她们笑话她带着母亲一块儿来。海丝说，当她们知道我是个有“听觉”的母亲时，更为恼火。她们说她不需要我，并坚持聋人社团才是她“唯一真正的家”。

我听到那一点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冲出去找到那几个女孩，告诉她们我的想法。但我什么也没说。海丝继续道，这些姑娘告诉她，无论如何在第二天晚上的比赛中绝对不能在台上说话。“她们只要我打手语！”那最后通牒显然对海丝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天晚上去比赛前，她告诉我“我不管她们怎么说，我是要说话的！”

我必须说这次亚拉巴马聋人小姐竞选赛，对于海丝、对于我的确都是一次独特的经历。

正如海丝自己说的，在表演开始时，她打着手语，同时大声地向观众介绍自己。我没有看到她的竞争对手对这种冒犯有什么反应，至少没有人赶她下台。

海丝开头的表演使我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初衷，不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我的确对海丝的特长节目很有信心。

直到第一个参赛者出场，为热情很高反响很大的观众表演了她的“特长”时，我才意识到我错估了形势。第二个出场的女孩表演的是一个很相似的讽刺剧，剧中有关聋人的尊严和自身价值的宣言，通过尖锐愤怒的形式表达出来，当这一切受到同样热烈的捧场时，我有一种下沉的感觉：海丝古典优雅的舞蹈不是观众所期望的。

果然，当海丝出台，摆好舞姿开始跳时，我发觉大部分是聋人的观众根本没有听音乐。他们不是在欣赏那芭蕾是如何优美地展现特拉·巴利斯的“无比美好”那一曲美妙的旋律，而

只是看见一个女孩在舞台上轻快地飞啊，转啊，跳啊。他们根本不为之所动。在海丝完成了精彩的舞蹈后，只响起稀稀落落表示礼貌的掌声，包括一些举在空中来回摆动的手，这掌声连听都听不见，这是“聋人的掌声”。

我首先看看我的父母，斯蒂芬妮和她儿子特雷，他们是特意来给海丝加油的。然后我看了一眼我的三位教友，韦思、爱莱和爱蒂，他们都是那晚特地开车来塔拉德格给海丝和我鼓劲的。我们交换了眼色，彼此间心照不宣。这个夜晚不属于海丝。

尽管如此，仍不乏是个有趣的夜晚。我特别喜欢那位当姑娘们到后台换衣服，等待裁判们判分的间歇里，出场给观众讲“有听觉人的笑话”逗乐的人，他是从东海岸来的。

结束时，我一点也不惊奇海丝没有赢，但我不相信她竟连什么名次都没有。这当然是一个学习经验，我安慰自己说。

表演后我们和海丝交谈，她没有流露出沮丧不安的情绪，像往常一样感谢家里人和朋友们来参加她的比赛，并告诉我她要和参赛的姑娘们一起去吃披萨饼，回头我们在宿舍再见。

当她终于在一个小时或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我告诉她：“我想你应该赢的！”

“没关系。”她微笑着说。

但我知道她不想说话，所以我们都默默地换了睡衣准备睡觉。当她钻进被窝时，我关了灯，自己也上了床。

几分钟后我听到我们一楼宿舍有敲窗的声音。“是谁？”我大声问道。

“怎么啦？”海丝问，她什么也没听到。“有人敲窗子。”我起身去查看，是另外一个参赛者的父母在外面。晚上宿舍的门都锁上了，他们需要有人帮忙放他们进来。我示意他们等着，然后离开房间下楼让他们从后门进来。我回到房间后，给海丝解释发生的事情。我很怕自己忍不住要说：“就是，这证明我们根本不必介意周围的人们说什么。”

才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有人轻轻地敲窗子，我再次放一些姑娘们进来，我乐意这样做。我再回到房间时，问海丝：“哎，我想幸亏你没有把老妈忘在家里，是吧？”

当几分钟后第三次敲窗声传来时，我想：难道校园里人人都知道，这个周末我们住在哪间房子吗？如果我不在这，她们会睡在屋子外边吗？第三次回到屋里时，我忍不住大声笑起来。但海丝面对着墙，被子盖过了头，所以我说什么她也听不到。

在回家的漫长旅途中，她还是不愿说话。事实上，海丝回家后的两天，整天闷闷不乐，不是哭就是烦恼。按她说的，是我毁了她的一生。使她既不属于有声世界，也不属于无声世界。

我的感觉也同样特别不好，我很快厌倦了这种态度，在那以后的第二天我终于到她房间说：“我们两人得谈谈。”

我说，对她感情上受到的伤害，我真的感到很遗憾。同时我也告诉她：“我要为你做些上帝曾为我做过的事。这事总得有个完，我看你现在到了人生的岔路口。你需要作出一个重要的选择，该是你自己作决定的时候了：你准备在哪个世界中生活——有声世界还是无声世界？由你来定，所以你得看清楚，停下来从头到尾仔细地考虑。但你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堂。不论你走哪条路，都会遇到难题。如果你决定在有声世界中生活，你可以按照你秋天的计划，去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为你今后的生活作准备。如果你觉得你的将来在无声世界，你也许可以去华盛顿，查一下盖洛德的情况（国家办的重点聋人大学）。一切由你自己来决定，我不再为你选择。”

“不过我得告诉你，在上个周末，我确实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坚信你两岁时，我为你作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庆幸，我没把你留在聋人世界。特别是当采用无声文化的人们说，你的有声家庭永远不应该是他们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候，我认为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我太爱你了，因而不能有其他的做法。在这世界上，我梦寐以求的便是我们能融为一体，你是我世界的一部分，而我永远是你的世界的一部分。”

“你现在成年了，我不能再告诉你应该去做什么，但我永远是你的母亲。直到我死的那一天，你都会知道我所想做的一切。去问你的姐姐们吧，我说这些，不是因为是你或你是聋人，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是你的母亲，我爱你。”

“现在，完完全全由你自己来选择做什么。”

后来，海丝哭着告诉我，在亚拉巴马聋人小姐大赛中，那些姑娘们是怎么避开她，给她难堪。她又告诉我，大赛后去比萨饼店的情形，姑娘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使侍者（他不懂手语）明白她们的意思，最后是海丝从其他女孩的手语中知道了她们想要什么，并为每个人点了吃的东西。

“如果她们会说话，事情就容易多了，”她下结论道，“聋人会说话有很多好处，那样你就可以在两个世界里与人交流。”“我同意，”我告诉她，“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我一直在想，也许上帝想要我做这两个世界间

的桥梁。就像我在比萨饼店在侍者和那些姑娘们之间做的一样。”我想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梦想，“你想怎样做？”我问她，“你是按计划好的准备去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呢？还是想去聋人世界，去盖洛德？”

海丝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去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

决定已经作了，她要成为会计，职业舞蹈家，或者干完全不同的别的什么，一切还不能确定。但从那天起我们两人知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海丝想成为有声世界和无声世界之间的桥梁。

我们相信有一天这梦想会实现。

## 第十七章 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

上大学对学生，对家长，都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里程碑。事实上，我大部分的朋友和家人不光为海丝的命运，也对我的命运担忧。

“要知道，看着你最小的孩子离开家总是最难的！”有人说，“或许海丝会好的。不过你会怎样？”也有人说。“不管怎样，你对海丝已尽完义务了。我们知道，让她离去不是件容易的事！”

人人都认为送海丝去上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上的难关，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当海丝还是个感情上不成熟、脆弱的没有什么交际能力的十一岁的孩子时，我就让她跨过半个国家，寄宿在很远的学校上了三年学。那才是难呢！

与去聋儿中心学校比较，送海丝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的独立的十八岁的孩子去大学念书，而且开车只有半个小时，简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我实际上是在高高兴兴地帮她整理行装。

当海丝告诉我，她想提前几天去学校，参加大学女生联谊会活动周时，我感到很高兴。在我们最近关于有声世界和无声世界的讨论后，我想活动周对海丝是个很好的考验。“太好了！你也许可以在里面担当哲塔、阿尔法之类的角色！我上亚拉巴马大学时，就是哲塔。”

“妈妈！”海丝反对道，“我不想当哲塔！”

“当然！由你定”我肯定，她没有再谈下去。

我自然想到，海丝的残疾也许会影响同伴们对她的认可。活动周竞争气氛很浓，不过在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显然也有很多听力残疾的学生，海丝不会有什么适应不了的。活动周结束时，正是学校正式开学之前，她决定向科学进军了。

虽然海丝喜欢她在女生联谊会里与朋友在一起的经历，但她很快知道了作为一个预备会员不利的一面，联谊会的联系和职责需要占用很多时间，超出了她的课余时间。

不到一个月，海丝便正式退出了女生联谊会。她告诉我，她想集中精力学习，空余时间则用在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的校园浸礼会组织的活动上，我知道放弃加入女生联谊会对她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理解并分担了她的失望。同时我更充分地看到，海丝在处理主要和次要事情的矛盾时，已经学会作出迅速坚定的选择。我想这显示了她的聪颖和成熟。

我还不知道，海丝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她生活日程中最重要的事，她的将来以及她的目标。1991年10月2日，在一篇新生必修的写作作业的日记中，海丝在她的题为《我的生活目标》中开头道：“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美国小姐。”

海丝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她七岁时在电视上看到美国小姐大赛的情景。当她看到一个参赛者跳芭蕾舞时兴奋不已。以后几年，每当她自己练舞时，总会想像有一天要到亚特兰大去表演。去年在谢尔比郡少年小姐竞选赛上获得的特别奖，又燃起了她成为美国小姐的梦想。作为一个美国小姐，她结束道，她将可以证实上帝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并且以此鼓舞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失聪的孩子们”。

我是三年后才看到那篇文章的，我一直不知道海丝那时的眼光就那么高，我也不知道海丝已开始为她的梦想在一点一滴地打基础。

初秋的一天，海丝来到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接待中心，找在招生处工作的一位朋友，准备将借的课堂笔记还给她。这位朋友的上司正巧在那里，朋友便介绍道：“海丝，这是特蕾莎·斯特科兰。”海丝肯定看起来很惊讶，因为那女孩指着的办公室墙上的一排历年曾当过亚拉巴马小姐的本校学生的照片，说“那就是特蕾莎！”

海丝飞快地看看特蕾莎，又看看照片，再回过来看看特蕾莎。她的脸上放出了光彩，“您曾经是亚拉巴马小姐吗？”海丝问，“我去年也参加了一次选美赛，不过只是第二亚军。你想看看我的照片吗？”

“当然了，”特蕾莎说，“下次你来，带着照片，我很想看看。”

不到一星期，海丝又回到了招生处，给特蕾莎看她在谢尔比郡少年小姐竞赛中的照片。这些照片，引起了特蕾莎的兴趣：“海丝，你跳芭蕾？太好了。不过你怎么听到音乐呢？”于是海丝解释，我让她跳芭蕾以便锻炼听力，她在亚拉巴马艺术学校和伯莱尔坞芭蕾舞团跳过芭蕾。特蕾莎听了十分感动。她告诉海丝，“现在大部分参加选美的女孩都是唱歌，而你是跳芭蕾，也许你可以考虑参加今年的杰克逊维尔州小姐竞赛。”

她们两人谈了很久，海丝问了许多，得知特蕾莎不仅是亚拉巴马小姐，而且在美国小姐选美竞赛中获得过第一亚军提名奖。“你得了很多奖学金吗？”海丝想知道。

特蕾莎告诉她，在七十年代，竞赛赛主要都着重“选美”，并不像如今重“奖金”。那时学校给她的奖学金已足够支付她读研究生的所有费用。“如果你对奖学金感兴趣，那就该参加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赛。冠军得主免一年的学费，特长奖是免费一学期。”

这些真的引起了海丝的兴趣，她告诉特蕾莎她一定考虑参赛。也许你不信，特蕾莎·切桑·斯特科兰并不是海丝那年秋天在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遇到的唯一的亚拉巴马小姐。她还在校园里遇到了一个牧师的妻子简·莱斯·豪罗韦，比特蕾莎早几年，她也曾是亚拉巴马小姐。所以，海丝也和她谈起了竞赛，并表示对奖学金感兴趣。那年下半年，简作为裁判出席了华勒斯区小姐竞赛（和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的竞赛赛一样），也是亚拉巴马小姐选美系统范围内的地方选美资格赛。她问海丝是否愿意一起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海丝去了，并决定参加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的竞赛。

听说海丝想参加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选美，我很高兴。同时她还告诉我，她也要参加圣·克莱尔小姐竞选（另一地方性的选美，离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赛只有两星期）以便积累经验。我同意她的计划，我想多些经验总是好的。我看到海丝对竞选越来越感兴趣，头一年的疑虑已成为过去，看来她也有意在有声世界里站稳脚跟。

我想这真是太好了。但我们却还不知道这么做要付出的繁重代价：时间、更多的钱以及没完没了的案头工作。

海丝头一年仍可以穿少年小姐竞赛赛时穿的衣服。但她还需要在接受裁判面试时穿的晚礼服和其他服饰。亚拉巴马小姐以及美国小姐竞赛赛规定，每个参赛者都要单独上演讲台，谈论一些她愿意而且能够谈论的重大的社会话题和为实现一个目标而制定的可行计划。因此，海丝除了要填写各种申请书和履历表，写清有关家庭、学校、个人的简历以及关于过去和现在参与任何社区活动的状况外，还得把个人的台上表演摆在首要地位。

斯苔希帮着采购物品，因为她丈夫汤姆提前从军队复员到社会上找工

作，这期间，他们带着外孙沙恩一起帮我忙了一段时间。在工作日里，斯苔希领着沙恩逛商场，寻找合适的衣物，以便海丝周末回家时我们可以带她去试穿。斯苔希对时装很有眼光，并且很会讲价。但即便是半价，海丝的新兰色晚礼服也花去了五百美元，而这才仅仅是开始。

大家齐心协力，为海丝参加 1992 年 2 月 29 日的圣·克莱尔小姐竞选赛作好了一切准备。那是一个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夜晚。

那天晚上的主持人恰巧是特蕾莎·斯特科兰。海丝在节目开始前，在后台碰到了她，并热情地打招呼，而特蕾莎的反应只是一脸的疑惑。后来我们才知道，特蕾莎当时没有认出海丝来，对此我毫不奇怪。因为每次海丝把头发盘起来化了妆，连我都会认不出来，真是判若两人：从一个人人们每天在校园里看到的“邻家可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十分成熟妩媚的窈窕淑女。我认为那天晚上，海丝着泳装和晚礼服的表演都很美，而且舞也跳得好。然而到即席答问时，麻烦就来了。每当海丝站在麦克风前等着提问时，我的心便悬了起来，而那一刻似乎总是给人一种持续到永远的感觉。

“海丝，”提问开始了，“作为一名芭蕾爱好者，请告诉我们，谁是你最喜欢的舞蹈家？为什么？”

我的心一惊，因为我知道她会说“谁”，我只好祈祷她能说清楚他的名字，使观众和裁判能够听懂。

海丝转向观众微笑着答道：“我最喜爱的芭蕾舞家是米哈伊尔·巴利什尼可夫。”她以那样的姿态，清晰地说出了这个名字，我想欢呼。当问题重复前，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为什么？”

此刻，海丝慌了，也许是她的大脑一时抑制住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连海丝自己也解释不清。她对自己那么崇拜的那位了不起的俄国舞蹈家米哈伊尔的描述，对那“为什么”的解释只是“因为他跳得高”！

那便是她当时的回答，即使恢复过来后，海丝依然想不出要再说些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他跳得高！”这种话听起来，让人觉得就好像她只是个小学三年级学生。

那晚，海丝什么也没获得。演出后，当我们这一大帮家人和朋友跑过去慰问她时，她显得抑郁而尴尬。观众们从演出厅匆匆散去，我在台前等海丝换衣服。特蕾莎·斯特科兰找到我，把我拉到一边重新介绍了她自己：“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您和海丝第一次来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时我们见过面？”

我说我记得。她又说：“我只想告诉您，不要让海丝放弃参加选美。我感觉她在今晚之后会打退堂鼓。”她继续告诉我，她怎么被海丝的舞蹈所打动。当她站在台上宣布海丝的名字时，她又是多么吃惊：她在后台碰到的漂亮姑娘和初秋时到她办公室来给她看少年小姐照片的小新生竟是同一个人！“海丝的潜力很大。她在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竞选赛中会发挥得更好的。”当我告诉海丝特蕾莎的话时，她宣布，“我是不会参加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选美的！我再也不参加任何选美了。”

“太晚了，”我告诉她，“我已经寄了报名费，我不想白交那三十五美元。”我说，“另外，我们花五百美元买了那套礼服，我想至少应该让它穿上两次！”

“我太不好意思了！”海丝抱怨说，“太糟了！我真是糟糕透顶！”我不让她再说下去，而是告诉她我的观感。我终于让她明白，她在泳装、晚礼服以及特长部分都做得很不错，“主要毛病出在即席问答上。你可以在那方面多练一练，其他的都很好。”

“没有用的。我想那些裁判不喜欢我，因为我是聋子。”她争辩道。然后，她抱怨那天下午她与选美裁判们的会面，“他们甚至看都不看我，显得那么不自然，就因为他们觉得我根本不应该在那儿。”

“我猜是他们自己紧张，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和你打交道。”我告诉她，“我知道有可能不公平。不过也许得靠你自己来使他们轻松自然起来。”

庆幸的是，我不是唯一鼓励她的人。汤姆和海丝谈起她的选美经历，就像他现在找工作的情形一样。“我去面试，我就得推销自己，就像你在裁判面前一样，我觉得这对今后的生活也是很好的经验。”

斯苔希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海丝，如果你不高兴的话，就不要再参加选美。不过，我认为你该再试一次。如果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选美大赛不是那么有趣，那就再不要参加任何选美了！”

星期一，海丝回学校去了。我不知道她心中的打算，但显然全家的联合进攻改变了她的主意。她请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聋生协助组的珍妮特·怀特帮她找个政治科学指导员辅导她一些目前形势的问题。接下来的两星期，她利用所有业余时间准备那个永远令人毛骨耸然的难题：即席问答。

二十三名姑娘参加了历时一晚的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竞选赛，表演很长。因为我们得看每一个姑娘从头到尾表演的所有竞赛项目——泳装、晚礼服、特长以及问答，这个程序和圣·克莱尔小姐竞选赛上一样。

斯苔希、斯蒂芬妮和我在节目进行时作着冗长的记录。因为我们知道海丝一点也听不到其他女孩在台上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如果她要做到知己知彼，我们就得成为海丝在赛前与赛中的耳朵，以便在赛后方便的时候告诉她。

海丝的泳装、晚礼服表演依然十分出色。漫长的夜晚继续着，我觉得她获特长奖的机会很大，而那也会使她感觉好得多。我只希望她能够通过问答部分，不要再出现尴尬的场面。终于到了问答时间，海丝信心十足地走向麦克风。“海丝，你认为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们投票赞成为他们自己提薪，对吗？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

天哪！我想，不要再提出关于米哈伊尔·巴利什尼可夫那样的问题！

海丝这次回答准确。我紧张得都记不得她说了些什么，不过她一点也没迟疑，她的阐述清晰而符合逻辑。好了，这回她通过了！

表演终于结束了。二十三个姑娘排成一行，等着宣布获奖名单。宣布的第一个获奖者是第四亚军。然后，主持人才意识到她应该首先宣布特长奖得主，于是又回过去说：“今晚特长奖得主和获得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一学期学费的是海丝·怀特斯通小姐。”

从海丝迷惑不解的面部表情，我知道她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奖。她或许以为自己获得了第三亚军。我相信，当她得知自己获得了这一学期的奖金时会有多么高兴。

主持人依次宣布着获奖名单，第三亚军、第二亚军、第一亚军，然后是“1992年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海丝·怀特斯通小姐！”

突然，我们全家和朋友们都开始雀跃欢呼，我母亲抱着小外孙和沙恩也尖声欢叫着。此时，她怀抱的孩子哭喊了起来，可是我们好大一会儿都没发

觉，因为大家的欢呼声早已把孩子的哭声淹没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海丝赢了！并不是因为她聋，而是因为她仅仅是一个参赛的普通新生！我想冠军该是大三或大四年级学生的。我不知道从前是否有过新生当上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的。

后来特蕾莎告诉我，海丝在大赛前面试时，把所有的裁判都征服了。“她是如此轻松自如。”她评论道。

海丝说，她是听了全家的忠告，并且提前反复练习即席答词，努力使裁判们轻松起来。她把开始的面试部分，当作是在找工作。但她更多的是尽量让自己放松，体会其中的情趣，“真是别有趣味！”她笑了。

太好了，不管喜不喜欢，海丝已答应再参加一次竞选赛。作为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她自然有资格代表学校参加三个月后，在伯明翰举行的亚拉巴马州小姐竞选赛。

我们很快收到了至少有一英寸厚的比赛须知，里面都是资料和信息。好在它非常详尽地告诉我们，在亚拉巴马州小姐竞选赛之前应该做什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为什么、怎么做。麻烦的是，所有这些都必须在竞选赛之前完成。

三月底到五月中旬前，几乎每星期都有一些文字工作必须赶着如期做完。我们需编辑两盘为海丝准备的题为“无比美好”的音乐磁带，海丝得有一本专业选美照相簿，还要有一份更全更新的演说词……似乎有没完没了的事在等着我们去做、去准备、去计划。

仅仅是海丝所需的那些衣服就够我的信用卡承受的了，赛前一星期，她每天至少要换一套新衣裙。每个女孩在赛前三个晚间的招待会上，都要穿不同的晚礼服与观众见面。

有人教我去借所需的衣裙，但我在海丝的服装上不想吝啬。她长这么大，衣橱里从来就只是从她姐姐那里接下来的衣服。我总对自己说，我们买的套服和便服足够她穿好几年的。但如果不是斯苔希花的时间和讲价的技巧，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幸运的是选衣服不成问题，没有多少人与海丝的身材类似，二至四号的小巧服装从不会脱销。

尽管如此，那年冬春夏季，我还是在服装和其他与竞选有关的费用上花了约五千美元。光是那件竞选亚拉巴马小姐所要求穿的、传统的、新的纯白色晚礼服就是一千美元。

除了经济紧张和时限的压力外，另一个意外是海丝的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赛的指导结婚了，突然辞职搬走了，她本来是海丝参赛全过程的顾问。如果不是特蕾莎、简、珍妮特和另外几个好心人的帮忙，我们真的会不知所措，尽管全家都想帮助她，但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么复杂的选美过程。

5月1日，我和海丝参加了亚拉巴马小姐理事会召开的一年一度的赛前讨论会，心中才有了些底。那个周末最有价值的是，我有机会与其他经历过这些过程的母亲们交谈，她们给我们这些新手们传授经验。她们的忠告多的简直要用车载斗量，而我们却只剩下六周时间作最后的准备了！

在计划和准备过程中，我们母女之间大部分时候都配合得相当默契，但有一点我们两人的意见很不一致，那就是海丝的造型。

海丝喜欢把头发披下来，因为那样简单些。我认为这样使她看起来大小，像一个天真的小女孩，主张她把头发盘起来，可以显得大一些、也成熟一些。而她觉得作头发，把头发盘在头顶上简直是受罪。直到我必须把她交给在伯

明翰桑福德大学校园内的竞选赛官员们的前一天下午，我们还在争来争去。

参加亚拉巴马小姐竞选赛的每个参赛者都必须自己做头发，海丝坐在她房中的镜子前烦躁不安。她满头黑发那么亮滑，无论她怎么夹，大股的头发仍然到处跑。

海丝烦透了，怪我硬要把头发盘起来，然后宣布：“我不盘起来，妈妈，它们根本不听话！”

“你不可以把它放下来，”我说。

“是我的头发！”

“用那个香蕉发夹，你得把它盘起来！”

“我不想盘起来！我喜欢头发披下来！”

眼看一场冲突就要爆发了，斯蒂芬妮碰巧来了。“请你去看看海丝的头发该怎么弄。”我请求她。过了好一会儿，不过我不在场，她们两人终于选定了一个海丝觉得她自己可以弄的发型。我真想欢呼上帝万岁，使劲拥抱我的妹妹，她真帮了大忙。不过我一个字也不敢说，生怕海丝改变主意。

实际上，斯蒂芬妮那天不仅是来道别和祝海丝好运气，而且是来帮我一起完成我俩计划好的一些小惊喜。在比赛讨论会上，其中一位母亲提议在准备的那一周，我们每天将送给自己的女儿一份特别而有新意的小礼物，或是一张鼓励的字条。

斯蒂芬妮和我送给海丝准备比赛的第一天的礼物是最大的一件。有人老早建议海丝把长毛绒动物放在屋里的椅子上，把它们当作裁判来练习面试。她那样练了好几个星期，最后一星期她还多带了两只小动物作额外练习用。不过斯蒂芬妮和我都知道，她一定不好意思把自己最喜欢的一直陪伴她的长毛绒动物——最亲爱的老朋友大熊，带到亚拉巴马小姐竞选赛上去。所以，我们把大熊装在一个大盒子里，并附上一张字条，写着：“我跟你这么多年，我知道没有我你是不成的。所以我藏了起来，今天我来了！”

我可以想像，她打开用彩带彩结包好的盒子时，那略带羞涩的惊喜样子：“哦，妈妈！”我也知道有大熊陪着她，她会格外开心的。

星期一上午，我把她送到桑福德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在台上看到她。竞选赛的官员们把姑娘们隔离在校内，为四个晚上的比赛进行排练、面试和强化训练。我们只能在每天晚上预演后的公众招待会上聚上一会儿。但在那一大群人中，我与海丝的见面只是她给我一张单子，上面列着诸如消毒剂，浴巾，清洁剂、裤袜之类需要我第二天送到她宿舍去的东西。好像每次我们谈话，她都要更多的裤袜，只那一星期她就穿坏了二十五双裤袜。

几个月忙碌的准备之后，比赛周本身似乎显得格外地平静，平静得几乎有些令人失望。直到星期三晚上的预赛，家人和朋友们一连四个晚上都在那儿助威。母亲、斯蒂芬妮、斯苔希和我都是爱紧张的人（这时斯苔希和汤姆已搬到科罗拉多，他们是专为亚拉巴马小姐周而来的），唯有父亲总是在那里不愠不火地抱怨：“整整四个晚上！都是黄金时间！这竞选赛耗费了我不少养神的功夫，你怎么回报我！我说，最好是值得在这儿才行。”

那晚，当海丝穿着她的预赛泳装走过舞台，我父亲探过身来耳语道：“看她在台上那模样，就知道她多盼望这一刻！”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对我来说这似乎不可能：那穿着泳装和高跟鞋在两千人面前信心十足地从台上走过的漂亮女郎，和那平日去海滩游泳都坚持要在泳衣外面套上一件长长的T恤衫的女儿，竟会是同一个女孩！

这与我们曾经历过的所有事情截然不同，我们全家比在任何州级竞选赛上都要紧张。除了海丝，无人例外。她似乎又一次稳操胜券，在星期五的预赛中，她获特长奖小组第一名，我们想她肯定会进入决赛。我们期望越高，也就越紧张。

海丝果真闯入了最后一晚的决赛。这意味着，那天晚上她在舞台上又要从头到尾表演一遍。观众从一开始就对海丝很热情，当她身穿配有闪亮小片的兰色晚礼服出现，开始那二十秒的演说词“有了向上的勇气、自尊与自强和上帝的帮助，有志者事竟成”时，人群中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当她随着“无比美好”的乐曲表演完芭蕾后，全场观众都已为她倾倒了。我想也许，只是也许，她赢了！

当主持人宣布海丝获得全能特长奖时，我更加肯定她会赢了。所以当她在获得第一亚军时，我不禁有些失望，她离目标近在咫尺，就差一点儿了。

海丝自己欣喜若狂。她已决定第二年再角逐冠军。

第二天早晨，海丝突然说她的下颚疼痛难忍。星期——大早，离亚拉巴马小姐竞选赛结束还不到三十六小时，我就找牙医为海丝预约了急诊，拔去了四颗有病的智齿。同天下午，海丝还不能说话，就坚持要我打电话给迪凯特的波特马兰小姐选美大赛的官员们，那是第二年的亚拉巴马小姐赛的第一资格赛之一。要我告诉他们，她打算在七月四日的周末参赛，离现在只有一周半的时间了。

我打了电话，但当我看到女儿那张肿胀着的脸时，就不得不摇着头说：“可惜明天那里没有金花鼠小姐竞选赛，不然你赢定了。”

她至少还没痛到不能笑的程度。

## 第十八章 “哀伤之路”

每年的独立节，在亚拉巴马州迪凯特城外的一个庞大的娱乐公园里都要举行一场历时两晚的波特马兰小姐竞选赛，每当波特马兰小姐在公园的露天大舞台上戴上桂冠，五彩缤纷的焰火就在头顶上腾空而起，划过田纳西河上的夜空。

这情景使选美赛进入令人兴奋而难忘的尾声。由于波特马兰小姐竞选赛每次都组织得很出色，而且颁发的奖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好，使它享有极高的声誉，是亚拉巴马小姐竞选赛系统中最受青睐的称号之一。加之波特马兰小姐是第二年州竞选赛的第一场地方比赛，便成了选美圈中每一个年轻女子都想参加的亚拉巴马小姐资格赛要求的第一期比赛。

因此，海丝在波特马兰的比赛中相遇的大半是熟悉的面孔，都是两星期前她在伯明翰竞选赛中曾较量过的姑娘。这些参赛者和海丝一样，已经决定下一年追求她们的梦想。

这已是海丝五个月内的第四次参赛，我们全家都是真正的竞选赛中的老将了。尽管我们在警告海丝和我们自己不要过分自信，我还是觉得成功在握，所以得知海丝当选为 1992 年波特马兰小姐时，我一点也不惊奇。

显然我不是唯一预料到那结果的人。那天晚上另一个女孩的母亲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时说：“海丝太棒了！她获得了这次冠军，下次州竞选其他女孩们只得碰碰她们的运气了。”至少在她心目中，海丝是下届亚拉巴马小姐的种子选手。

我希望她是对的。但当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女儿如此友善时，疑虑又来了。

那年夏末，我意外地接到了贝佛利的长途电话，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住在多森。她说一个我们共同的熟人刚刚告诉她，偶然听到亚拉巴马小姐理事会的一位理事对多森的一个商人说：“没有哪个聋女会被选为亚拉巴马小姐的！海丝·怀特斯通明年不会有机会的！”

我认识告诉她这消息的女士，她不可能编这种故事。贝佛利气愤极了，“你就没有一点法子吗？也许可以去法庭控告他不公正，有偏见或是什么的。”

“不行，”我说。虽然我对这议论很不高兴，然而我只是把它当成无知和偏见。“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海丝以行动来证明他错了。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不知怎么这些话又传回到那位理事的耳朵里（选美圈内的神速交流真令人惊讶）。过了不到两个星期，他打电话给我，“达芙妮，你不会相信最近散布的谣言吧。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不是真的。有谣言说，我在全州公开说海丝不能成为亚拉巴马小姐，因为她是聋女。当然，我可以肯定我没说过，你知道那是极其荒谬的。我打电话只是想在你听到其他人说什么之前，告诉你这都是无中生有。”

我告诉他，我不想相信任何人说的这种话。我对他表示感谢。不过我得承认，我挂了电话后想，太妙了！我原来所有的疑虑，现在都烟消云散了。我当教师久了，常遇到一些人做了坏事确又不顾一切地想要遮羞藏丑。

我从来没有对海丝提起过这事，我知道这只会让她生气。感谢上帝，我不心担心她自己会发现。残疾带给她的区区可数的好处之一便是使她不必去

听那些流言蜚语，自然也免去了这类小事引起的苦恼。我想她不知道的和她会知道的事，当然也就不能伤害她。

海丝获得波特马兰小姐称号的有利之处，就是她差不多可以有一年的时间来为下一次州竞选赛作准备。虽然我们要到春天才能收到官方消息和申请表，但我们已经历过那些过程，知道该做些什么。为了第二年夏天的亚拉巴马小姐竞选赛，我们这一年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

海丝想获得波特马兰小姐称号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从社区服务和公众形象方面来要求获奖者的。海丝认为这种经历会帮助她变得更成熟，事实也是如此。

海丝每个月都得有一两个周末需开车到迪凯特去（从伯明翰开六个小时车）。此外，由于她是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小姐，免不了还有一些额外的事情要作（到1993年3月前，她都得这么忙碌）。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她仍在挤时间去上课，而且她第一年的成绩都是A和B。在我全力支持她的梦想的同时，有时也担心她负担过重。有些周末，她在迪凯特的约会，甚至一直到星期日晚上才结束，当我们最后回到伯明翰时，她已是精疲力竭。我把她送上床，然后将闹钟拨到清晨三点半或是四点，以便我可以及时叫醒她开车赶到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上周一上午的课。

尽早知道海丝将再次角逐亚拉巴马小姐的另一个好处是，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分期承受各项费用。因为头一年我的信用卡已用到了最极限，现在很难需要多少就能取多少了。

但即使有充足的时间，光靠我的工资还是不够海丝选美所需的花销。我得想法子筹集必要的资金，我已经每星期在课余时间辅导学生一两次，挣些额外收入，但我还得多干些。

我一直是个热爱艺术和手工艺品的人，便自然而然地把这种爱好变为了一种赚钱方式。斯蒂芳妮，作为好妹妹、好姨姨，自愿与我合伙，制作各种各样装饰性的木质乡村建筑小工艺品，当把它们的小屋顶拿掉并折叠起来，就会变成使用方便的卡片盒。如：一所漂亮的小房子可变成圣诞卡盒子；一个小小的乡村教堂可成为装夹盛大婚礼计划、人名卡的盒子；一间小乡村教室可装夹教师们用的班级名册、时间表以及学生卡片；还有各式五颜六色的小农舍可以作为无可挑剔的烹调菜谱夹子。

斯蒂芳妮的公公，汤姆·沃德把后院的木工房租借给了我们，还教我们怎么用那些工具：带锯，钢丝锯，槽刨，磨砂机等，我们用这些工具把整张的胶合板切割成小建筑工艺品的墙和屋顶。

我父母的地下室成了漆房，工作室兼货仓。我父母帮了很多忙：刷油漆以及用砂纸没完没了地打磨，海丝只要有空就会加入我们的行列。很多时候，她与斯蒂芳妮和我一起度过大半个晚上（和凌晨的一部分），手里拿着粘胶枪，油漆刷或砂纸，彼此笑话着对方，我们的头发沾满了锯末、木屑，脸上这儿一道、那儿一道的油漆，指甲下干结着木匠胶。像以往一样，海丝对梦想的追求凝集着这个大家庭的承诺。

不幸的是我们家在微型建筑小工艺品的生意上投入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获利却并不多。在那年的手工艺品展销上和礼品店里，不夸张地说，我们卖掉了差不多一吨建筑模型，但还是挣不够。除了大堆的半英寸厚的胶合板，我不得不又开始在那些点点滴滴的小开支上精打细算。

那一年最大的事是，海丝居然能找出时间来进行社交，我真不知道海丝

是怎么对这一切应付自如的。首先，我为她高兴。显然她对第一个正式的男朋友对她的专注感到很高兴。和海丝一样，我也看到了那男孩在努力学习手语（这样与她交流容易些），这种对她的责任感令人感动。但他似乎把自己愿意学手语看成是，他比海丝不会手语的家人更爱海丝的证明，这点令我心中不快，所以当他们分手时我并不感到遗憾。

我从来没想过海丝会怀疑家人对她的爱。但她的男朋友对我们家的态度，确实引起了她的一些疑问。她开始问我父亲，“外公，您为什么没有学手语？”

“如果不是因为运用声觉语言方式，我们肯定都学会了，”父亲回答说，“不过我们相信你母亲说的话，如果大家不强迫你使用自己的听觉和声音，你永远都不会学会说话的。”

然后她又来逼我解释，为什么在她能说话以后我也没有学手语。我回答：“我也想过在你上中学修手语课时也学学手语，我相信那对你有好处，而且手语是一种漂亮的语言。我想那么多年我承受着压力，反对教你手语，如果我自己学的话，不免觉得与自己的理论背道而驰。不过我没学手语，也不愿意让其他人学的主要原因是，我知道说话对你来说更困难。像每个花样滑冰冠军或体操冠军每天得练习敏捷一样，你得天天练说话，才可以与他人有效地交流。在你的生活中，我们——你的全家都是你的教练和练习伙伴。如果跟你最亲近的人学手语，或许有时我们的交谈会容易一点，但你的生活中就再没有什么地方、什么人与你练习口语交流。而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自从海丝获波特马兰小姐到她第二次参加亚拉巴马竞选赛的十一个月之间，另一件事有了关键的发展，我们决定在海丝的特长部分作一些大的改变。

第一步是海丝的常规个人舞蹈课。在校的时间，海丝离伯明翰太远不能继续参加伯莱尔玛芭蕾舞班。她无法预先知道时间安排，甚至包括周末，这样使得她根本不能按计划约定的时间到伯明翰上课，因此接受个人辅导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就在那时我们发现了莫妮卡·巴内特·史密斯，她不仅自己参加过一些亚拉巴马小姐竞选赛，她还当过好几次亚拉巴马小姐竞选赛的舞蹈设计人。她对竞选赛系统非常熟悉，并且愿意在星期五晚上或是星期六，在海丝方便的时候对她进行指导。莫妮卡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第二步是对海丝的特长表演作出的一个重要改变。

常人认为，“东西没有破，就不要修补它”。所以人们对我们所作的改动，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不管怎样，除了没被选上圣·克莱尔小姐，海丝获得了参加过所有各次竞选赛上的特长奖，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

但海丝和我们都认为，如果要想成为美国小姐，在舞蹈中应该加些更令人兴奋和激动的动作。虽然“无比美好”，优美高雅流畅，但由于没有节奏的变换或是速度的突变，所以没有戏剧性和感染力大的动作，也没有跌宕起伏的跳跃和旋转。

好几个星期以来，我一个商店又一个商店地寻找另一首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宗教歌曲。这只歌曲不仅要优美抒情、富有戏剧化的速度和感人的情绪，而且唱起来足够洪亮使海丝能够听得到，同时还必须是只可以删编的曲子，因为比赛中特长部分的时间是二分四十五秒。

特拉·巴利斯的声频恰在海丝的最佳听觉范围内。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找另一首特拉·巴利斯的曲子，结果一无所获。我在磁带上花了一大笔钱，

因为在商店我不可能全部听完，只能将最合适的买回家，看海丝喜欢哪盘（她喜不喜欢那歌？她听不听得着？），还得看是否容易缩编。

夏末，我们没有任何进展。一天海丝和我参加了一场亚拉巴马小姐音乐会。音乐会上，曾击败海丝而当上1992年亚拉巴马小姐的金姆·维默唱了她自编的桑迪·帕蒂的成名曲“哀伤之路”。金姆站在台上，在柔和的染着微微红色的黄色追光下，大声唱着那首曲子。我突然知道了我们要的乐曲，上帝给了我答案。在我心里我已经可以看到：海丝穿着黄裙——那上边染着的红色象征着基督的血，和着桑迪·帕蒂唱的“哀伤之路”跳起那最动人的舞蹈。

节目完毕，我告诉海丝，“我发现了一首最好的歌曲：你可以跳‘哀伤之路’。”

“绝对不可能！”海丝答道。

“为什么不可能？没有再好的了！”

“那是金姆的歌！”海丝说。

“金姆没有在亚拉巴马小姐竞选赛上唱过。”

那对海丝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可她现在在唱，这是她的曲子之一。”

“你又不是唱这支曲子，你是跳这个舞。”

“那是金姆的歌，我不可以用的。”

我出去买了桑迪·帕蒂唱这支歌的磁带。我用我自己的录音机将它改编到要求的长度，在一间录音室里作了专业处理后，中间的剪接部分天衣无缝，我认为妙极了。

我一遍又一遍地放给海丝听，她特别喜欢那音乐和歌词。但她仍坚持道：“我不可以用金姆的歌伴奏。”

我继续找其他曲子，但再也找不到有同样效果的了。因此我征求莫妮卡的意见，她同意，“哀伤之路”是海丝特长表演的最佳选择。

海丝像告诉我一样，也对莫妮卡说：“那是金姆的曲子。”

莫妮卡答道：“海丝，那实际上是桑迪·帕蒂的歌，其他很多人都在用它。”

“像金姆！”海丝说。

“可你不会像金姆一样唱它。而金姆在亚拉巴马小姐竞选赛上根本没有唱过。你只是跳舞，并且是桑迪·帕蒂自己在唱。你没有模仿任何人或任何事。我认为没有。”

海丝最终决定跳“哀伤之路”。那年初秋，她和莫妮卡开始编舞。有时她们让我看看进展状况，问我感觉如何。我提的唯一建议是，当海丝走过舞台，在表演最开始时，用手语表示“心想耶稣基督”，其他地方则都很好。

海丝和莫妮卡花了几个月时间完善这个舞蹈。秋天，冬天和春天，海丝差不多每天都在练。

直到三、四月份，我们才突然意识到有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们当初填写参加亚拉巴马小姐选美的申请表格时，我们填的是“无比美好”作为海丝的特长节目。开初没意识到有什么关系的，现在我们才知道，如果参赛者中的一个首先点唱了“哀伤之路”（我们已知道一个地方选美冠军选手唱了这支歌，作为特长节目），海丝就不得不另选一支曲子。而我们已经为此编了舞并选好了服装，一旦不能用时，那几个月的辛苦，无数小时的排练都将付诸东流。我不愿去想，如果海丝的特长节目到最后不得不改变时，她会怎么反

应。

我们只有一线希望，海丝首先得改她的申请。而所有参赛的申请表都是在每年春天，一切地方选美最后结束之后同时发出的，我们得想想怎么办。当海丝的邮包被送到迪凯特的波特马兰选美主任那里时，我们请贝佛利·沃尔克打电话告诉我父母（我在学校）。先由贝佛利填好所有需要她填的表格，然后当天晚上和她丈夫朱利安一起开车与我和我父亲在迪凯特和伯明翰之间的一个中途休息站见面。在那儿我们两人在柜台上将表格摊开来，贝佛利把所有需要海丝和我完成的剩下的表格看一遍，而我差不多整晚将我自己能够做的全部打印好。第二天放学后，我开车到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找海丝，看她有什么补充，然后让她签名。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再将海丝给我的补充意见全部打印下来。第二天我向学校请事假，以便及时将所有的东西进行公证，并亲自把它们按时送到伯明翰的亚拉巴马小姐办公室。

“你好，达芙妮，”亚拉巴马小姐办公室唯一拿薪水的秘书桑蒂拉·加德纳跟我很熟。在头一年，没有任何地方选美指导帮助的情况下，当我们第一次经历那些复杂的申请过程时，她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你带来了海丝的申请表？太好了。你是第二个来交表的。”

“第二个？”我紧张极了。

“第一个是几分钟前来的。”

“是谁？”

当她们告诉我是谁，我全身凉透了。她就是我们最担心的那个女孩——那个在本地资格赛上唱“哀伤之路”的姑娘。

我们该怎么办？我怎么对海丝说？

## 第十九章 第一亚军

“好了，达芙妮，”桑蒂拉·加德纳一边一页页地翻着申请表，一边说，“我们还是在你走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吧。”“噢，”她停了一下，又说：“海丝已决定把特长竞选项目那一部分的音乐换一下，她想用‘哀伤之路’，对吗？”

“噢，好家伙！”我心想，“这下麻烦了。”

“那应该是很不错的。”

“什么？不错？”

“那首乐曲的旋律非常优美，为海丝的舞蹈表演伴奏真是太好了。告诉她，我祝她好运。看来，这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感谢上帝！另一个姑娘似乎改了主意，她选择了另一首乐曲为她的特长竞选伴奏。

我一到家就给海丝和莫妮卡打电话：“你们猜怎么着？简直难以相信……”我把这件事告诉她们。

除了这场虚惊之外，我和海丝都觉得第二次竞选亚拉巴马小姐的准备比第一次要充分得多。我现在已被认为是极富经验的人，不断在为每年新参加竞选的姑娘们的母亲提供咨询。

竞选前的一切准备都在按我们的希望顺利进行，这使我们很满意，因为那年春天我们还要举行两次大的家庭活动。五月底到六月初，我和海丝将同我的父母亲一起去科罗拉多，在斯苔希和汤姆那里住六天，主要为了参加梅丽莎在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并于两天后参加她同托尼的婚礼，托尼是与她一同毕业的同学。

斯苔希已为海丝在那里的例行舞蹈训练找好了练功房，它是当地的一个舞蹈教师的。不幸的是，一到那里海丝的高原反应非常厉害。直到我们回家时，她仍很虚弱。我很担心她到竞选时仍不能全部恢复，从而无法达到最佳竞技状态。好在她很快就恢复了。

第二次面临竞选周既有优越之处，又有不利之点。它有助于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同时有更多的人认为海丝是预期问鼎的选手之一，但这不见得是好事，过高的期望带来的是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闲言碎语。

这一周的最初两天，两位竞选者的母亲想安慰我，告诉我说海丝在预赛时对竞选裁判的面试很不愉快，“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我告诉她们。

“对不起，我们以为你肯定已经知道了。”

“不知道，我还没有与海丝通过话呢。”显然，有些女孩子不像海丝那样严格地执行亚拉巴马小姐的竞选规定：不得与家长通话。

“听说海丝被裁判和他们的问题弄得很难过，我们心里也很不舒服。”

我很客气地对传递消息的人表示了谢意，并再一次强调我确实还没有从海丝那里得到任何信息。“不管怎样，现在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相信上帝会保佑我们的。”

在内心深处，这些消息使我很难平静。我意识到预赛的面试对海丝是多么困难。为了能看到海丝在一年前的亚拉巴马小姐竞选中的全部表演，我们花一百七十五美元买了一盘她的个人录像带。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一起观看她第一年的表演，并对各个方面加以评判。

在录像带中我也看到了预赛面试中那些裁判们的样子。当时海丝走到房间的中央，坐在五个裁判面前，在十分钟内回答任何一位裁判想问的问题。

其中一个裁判就曾问过她，听力受损对她的生活有何影响，以及她对自己的残疾的感觉。当时，她对这个裁判嫣然一笑说：“我想我对自己残疾的感受与你们对自己残疾的感受不会有什么不同。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残疾，而你们的残疾也许并不明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存在某种残疾，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它。”

我第一次从录像带上听到这段话时，心里一紧，但同时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倾注给海丝的，已经在她内心深处生根了。在她的回答中，我分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的回响。我不敢肯定那位裁判对海丝的坦诚会作何反应。结果，那位裁判却成了海丝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此时，我又想知道又很担心，不知裁判们会在海丝的竞选分数上划上什么样的曲线。

后来我们才知道，海丝的确对她的顶赛面试感觉不佳。一个裁判一边向海丝提问，一边却低头看手中的记录，而另一个裁判则留着胡子，挡住了嘴巴，使海丝不能唇读，从而无法准确地理解他们的问题。但最让海丝不安的还是对一个她自己认为完全听懂的问题的回答。

裁判问她：“海丝，你家里有多少人？”

“嗯……”她犹豫了一下，“我不敢肯定，三十，也许四十。”

后来，海丝对我说：“当时我真尴尬，开始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是在问我自己的兄弟姐妹，我还以为他是问我们的家族，我把姥姥、姥爷、舅舅、姨妈以及所有的表兄弟姐妹全都算进去了”

“你没有必要尴尬，”我说，“事实上，你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回答的，他给了你这样的大家庭，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关心你。”

消除忧虑的机会直到后来才出现。在竞选的第一周里，我只是非常想知道面试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所听到的那些消息使我非常担心。当然，我时时在为海丝祈祷，希望我和斯蒂芬妮寄给她的每日惊奇小礼品能振作她的精神。

我很喜欢塞巴斯蒂安的形像，这是迪斯尼的《小美人鱼》中的角色。在海丝穿泳装竞赛的那天，我们寄给了她，还夹了一张便条提醒她：“今天千万别焦急发火！”因为，海丝从来都不喜欢早起。但我最喜欢的礼物是一个塑料的小丑矮人，我知道它一定会让海丝发笑。这个丑娃娃有一头乱蓬蓬的、发着莹光的红头发。我仔细地把娃娃的鲜红色的头发卷起来盘到它的头顶，还系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发型督察：将头发盘起来！”

此次我们随行的家庭成员和朋友比头一年还多，他们全都来助威，而且住到第四个晚上。我们可不是唯一认为海丝能赢的人。

整整一个星期，多种传闻此起彼伏。星期六早晨，我在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她是选美竞赛的志愿工作者。她无意中听到几个了解内部消息的人的秘密谈话，说海丝·怀特斯通是不可能赢的，因为她是聋人。她接着说：我不是有意让你们难受，只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些准备。我知道许多人都认为海丝是有希望获胜的人。“没关系，现在命运在上帝的手中。”我声音洋溢着对上帝的信任和忠诚。

说实话，其实我的心里非常不平静。那天晚上，当海丝再次被宣布力第一亚军时，我真是灰心丧气到了极点，并且对整个选美机构充满了愤怒。滑稽的是，她竟输给了卡琳·查普曼——那位头一年夏天在波特马兰小姐竞选中获得第一亚军的姑娘。

我非常了解海丝，知道她失望的程度是难以言表的，但她仍以惊人的镇静走完竞选后所有常规性程序，诸如庆祝、照像等等。直到她回到观众厅，回到等着祝贺她的亲朋好友之中时，才放声痛哭。我从未见到她如此伤心过。

我对她说：“我原以为你能赢的，不过即然没有赢，我们只好相信，现在还不到上帝给我们安排的时机。如果你想明年再试一次，我会帮你，如果不想，也没关系。你看着办吧。”为使她放心，我又重复一遍：“这全由你自己决定。”

当其他人都离开后，我和斯蒂芬妮等着海丝到后台整理她的东西。这时，我们的朋友吉姆和维基·戴维斯走过来问道：“你们认为以后她还会参加选美吗？她不应该放弃。”这整整一年里，他们都非常帮忙，总是不断地鼓励我们。

我答道：“说真的，维基，我也不知道。不过，只要她决定明年再试一次，我一定作她的坚强后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从未见她像现在这样沮丧过。所以，很难说她会作出什么决

当天晚上，斯蒂芬妮开车把我和海丝送给我父母的家，一路上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父亲家里已聚集了所有住在郊外的亲戚朋友，当这个毫无生气的聚会终于散了之后，我和海丝回到自己的家。海丝一下子就看到了新鲜的烤面包圈（这是她最喜欢的），这本来是买来在早餐时表示庆祝用的。海丝说“这些面包圈看起来真不错”。为了振作精神，除了甜面包圈，我们又拿出了小零食和可口可乐，一边大嚼这些高糖食品，一边看卡罗琳·萨普的录像带（卡罗琳是1992年美国小姐，她在第四次参加选美时才获得夏威夷小姐桂冠，在此之前，她四次竞选，两次获第一亚军）。

看完录像，天色已近黎明了。海丝开玩笑地说：“如果我要再次出赛的话，一定给卡罗琳写封信，告诉她，她不再是获得第一亚军次数最多的保持者，我的亚军纪录很可能比她更多。”

我们太疲倦了，需要乐一乐。

几个星期之后，戴维斯夫妇再一次问我：“她决定了吗？”

我说还没有。然后他们说：“我们有一个想法，要想使海丝赢得亚拉巴马小姐的桂冠，就必须让选美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知道她，了解她，看到选美舞台之外的她，并且意识到她能胜任这个角色。”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让她去亚特兰大观看九月在那里举行的美国小姐竞选。路费由我们出，她可以亚拉巴马小姐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去。这不仅能使那些人会更多地了解海丝，也是给海丝一次机会，看看竞选国家级小姐是怎么回事。也许这也可以帮助她对明年的竞选作出决定。”

我非常感激他们，把他们的慷慨相助告诉了海丝。她同意前往。

我和斯蒂芬妮在手工艺作坊的帐户上只剩下了四百美元。她认为我该用这笔钱陪海丝到亚特兰大。我说：“我们一直都在一起，这次也还是一起陪海丝去吧。”我们便决定各付各的路费，又清理了一下我们合伙经营的剩余资金，用这笔钱作为伙食费和观看竞选所需的各种费用，以及与海丝合住旅馆房间的费用。

这次旅行遇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事情。首先是在那个星期四的下午，我们在带有很多包厢的会议中心，坐在其他几个亚拉巴马州的代表附近，大家正在一起观看台上的表演。这时，一个人走向海丝，带着浓重的德克萨斯州的口音问海丝是否还记得他，海丝说记得。他是海丝第一次参加选美时的裁

判之一，就是他曾直接了当地问过海丝有关她残疾的问题。现在，他当着亚拉巴马代表团成员们的面对海丝说，他希望海丝再试一次竞选亚拉巴马州小姐，因为，他认为海丝很有潜力，终有一天会成为美国小姐的。

有一位新闻记者也正在搜寻着有关选美的幕后新闻。他认为海丝专程来支持战胜自己而夺冠的亚拉巴马小姐非常难能可贵，更令他感兴趣的是海丝是个失聪姑娘。他在现场采访了海丝，并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特写，发表在第二天的新泽西州报上。

海丝为此很高兴。那以后的几天里，无论我们在亚特兰大的哪个角落，都会被人们拦住问海丝是不是参赛者之一。海丝告诉他们：“不是，我只是作为支持亚拉巴马州小姐卡琳·查普曼参加竞选的代表团成员。”

接着又出现了一位为海丝进军亚特兰大开道的人，他是亚拉巴马选美代表团一个官员的私交，当时他靠近他的朋友小声说：“我告诉你吧，”一边说一边朝海丝点着头，“你把那个姑娘拉回舞台上来，你们就会有自己的美国小姐了。”

当然，我并不知道所有这些究竟起了多大影响，但我知道亚拉巴马州选美委员会的官员们通过那次旅行，对海丝的看法已从不同角度上得到了启发。但是否就有了维基和吉姆所希望的那种确实的影响还很难说。不过有一点非常明确，即海丝、斯蒂芬妮和我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一直到星期六早晨，经过三个晚上的预赛以及星期五晚上传统的彩车表演，亚拉巴马代表团一致认为卡琳表现出色，大家都肯定她将赢得十位半决赛者中的一席之地，甚至还认为她也许有一碰桂冠的运气和机会。

卡琳成为美国小姐的可能性使海丝深感不安。她确实是在支持自己的朋友，但我清楚，她并不想以这种方式成为亚拉巴马州小姐。如果卡琳当选为美国小姐，按惯例，作为亚拉巴马州第一亚军的海丝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亚拉巴马州小姐，但她也将因此而失去参加下一年国家级选美的资格。

我对她说：“我们一直在说，相信上帝，相信他的安排。”

海丝说：“我明白，可一想起这些就很烦恼。今晚你和斯蒂芬妮跟我一起祈祷，然后再去看选美好吗？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我会从上帝那里得到安宁。”

我和斯蒂芬妮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结果我们只顾忙于尽快地穿戴整齐提前赶到赛场，在慌乱和喧哗之中竟忘了事先计划好的祈祷，直到穿过恺撒宫长廊时才想起来。

“噢！”海丝突然在急行中停下来：“我们忘了祈祷！”

大家都不想再回到房间里去。我看看拥挤的旅馆想着，这可不是作祈祷的地方，甚至作一个非常短的祈祷也不行。

“我们可以在去会议中心的路上选个合适地方。”斯蒂芬妮说，于是我们又继续赶路。

川流不息的人流在娱乐厅外的长廊中来回涌动。这里也不是合适的地方。就在这时，我们穿过一个很小的花园似的凉亭，这里远离旅店的大厅商店，四周围绕着一簇簇茂密清新的绿叶。我一把抓住海丝的胳膊点点头：到这儿来。我们一行三人钻出拥挤的过道，进入花园这片宁静圣洁的角落。太完美了。我们装作欣赏花草，面对着花园，这样也许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

“斯蒂芬妮，还是你来为海丝祈祷吧，好吗？”我建议，她点点头。我们手拉着手，我闭上眼睛，斯蒂芬妮开始祈祷。我已经记不得她说的每一句话，

只记得祈祷的时间并不很长，她感谢上帝给她这次机会，与大家一路同行，以及在一起渡过的愉快时光；她感谢上帝赠予我们全家的所有祝福；她为海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在海丝的生活中所作的一切安排，并请求上帝不论那晚的竞赛结果如何，都能帮助海丝接受并处理好面临的问题。祈祷完毕，我们睁开眼睛，斯蒂芬妮几呼惊叫起来。

一个男人站在离她不足六英寸远的地方，正热切地盯视着她的脸。这个人深色头发，穿着高雅的西装，脖子上戴着好几个金项链。我快速地瞥了海丝一眼，显然对我们俩的大惊失色，她正使劲憋着不使自己发笑。为了唇读斯蒂芬妮的祷词，海丝一直是睁着眼的，她看见这个人走过来，又看着这个人停下来站在那里，屏住气等着看她的姨妈和妈妈将有什么反应。

我很惊讶妹妹怎么能够忍住而没叫起来。但她确实是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个人非常有礼貌地道了歉，然后说：“多么美的祈祷。您能为我祈祷吗？”这更令我们惊讶不已。

斯蒂芬妮惊慌失措地看着我，我耸了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离我们十五英尺远的地方，站着两个强壮的小伙子，像是保镖，当我的眼睛和海丝的眼睛对视时，发现她显然快要憋不住地笑出声了。斯蒂芬妮问这个人：“您想让我为您祈祷什么呢？如果为您今晚上在赌台上大赢，那我是不会干的。”

这人回答：“没关系，不管什么，只要是祈祷就行。还从来没有人为我祈祷过。”

斯蒂芬妮同意道：“好吧，我们为您祷告。”我们又都低下头，开始了祈祷。我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斯蒂芬妮尽可能快地为他作祷告，但又不敢太短。从他的外表看，我怀疑他也许是什么恐怖组织的秘密人物或是南美毒品交易巨头，到亚特兰大把他非法得来的钱在赌台上挥霍一空，谁知道呢？

待斯蒂芬妮颂完祷词，我们又一次睁开眼睛。我意识到我们过于沉浸于恺撒宫这一宁静的角落了，也许我们太希望安静了！

在继续赶往会议中心的路上，我们责备海丝说：“你应该告诉我们，那个人差点儿把我们吓死！”

海丝辨解说：“您正在祈祷，我不能出声，斯蒂芬妮姨妈。”

“至少你可以咳嗽或作点儿其他形式的警告呀！”斯蒂芬妮说。

一直到我们找到座位坐下，海丝仍在笑。

不出所料卡琳·查普曼进入了复赛圈，但她被排在五名之后而未能进入决赛，1994年美国小姐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的金伯利·艾肯。

因为有亚拉巴马代表团选美委员会的会员资格，我们享有去后台的优待。所以，当大多数人都还拥挤在观众厅后面的时候，我们已经奔到楼上的舞厅了。那里挤满了美国小姐的亲朋好友以及倾慕者，大家都等待着竞选后的新美国小姐，急切地想先睹为快，一饱眼福。结果直到午夜，金伯利才终于到场，作了一个简短的亮相式的获胜演说。

我们挤出舞厅，海丝提议下楼到会议厅，再看一眼，我们便紧跟其后回到大厅。

人群和照像机都已撤离。曾经人声鼎沸的大厅现在空空如也。只有一小组工人在忙着拆除所有装置，为下一次重要活动作准备。

“您说他们会让我在那条入选甬道上走一趟吗？”海丝问道。“那我们

得问问，才能知道。”我说。

她便走上舞台的台阶，问一个工人：“我可以在这甬道上走一趟吗？”

那人抬起头看了看，点点头说：“当然，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我妈妈跟我一起走一趟呢？”

我看见那人耸耸肩：“我不在乎。”

海丝向我作了个让我过去的手势。“走吧，斯蒂芬妮。”我叫妹妹一起走。

“你去吧，我在这里看你们走。”

我小心地踏上舞台，往下看那条非凡的甬道，涌上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它像玻璃一样光滑，我可千万别摔了！”海丝挎着我的胳膊，在空荡荡的大厅中我们一齐走过那条长长的发光的甬道。我们先向斯蒂芬妮招手，她正独自站立着，向我们挥手欢呼，然后我们又向数千个座位招手，好像它们就是那些崇拜者和敬慕者。

我敢肯定，如果台上的工人们注意到我们的话，一定会想：她们真需要体验一下另外一种生活。

后来，海丝告诉我，也就是在那一时刻，在亚特兰大会议中心那条闪光的甬道上，她终于下定决心：明年我一定要再试一次，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一定要以参赛者的身份再次回到这里，来竞选美国小姐。

## 第二十章 难以明说的问题

我们从亚特兰大回到家之后，海丝说她已下定决心再次竞选亚拉巴马州小姐。我们立刻动手查阅有关即将开始的地区级竞选目录。在那些“开放”式的竞赛中（“开放”是指没有居住区域或报名条件的限制），我们选中了卡尔曼区小姐竞选。因为它的时间比较合适，又距我们居住的伯明翰北部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于是，我很快地把海丝的所有参赛表格填好，发了出去。

再一次用“哀伤之路”伴舞，海丝获特长项头等奖。这是她连续第五次竞选。紧接着宣布了竞选优胜者名单，海丝获得最终胜利。上届的卡尔曼区小姐莉丝·谢勤为海丝戴上了桂冠。而莉丝·谢勤的波特马兰小姐桂冠，正好是上届的该区小姐海丝在七月四日卸任时为她戴上的。

1993年秋，有卡尔曼区小姐的桂冠在手，对我们来年夏季第三次参加亚拉巴马州小姐竞选就更有利了。海丝把这次参赛作为最后的冲刺：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因此，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同支持我们的人坐在一起，仔细地评价、分析海丝的全部参赛过程，研究还有什么该改进的地方，怎样才能做到完美无缺。

事实上，我们已经更换过一次海丝的伴奏音乐，没有必要再在这上面动脑筋。但我们计划今年要换一下她的舞蹈服装。此外，莫妮卡想再让海丝多作些体力和技巧上的步伐训练。在舞蹈的常规动作方面要增加创新性和刺激性。

亚拉巴马州小姐选美组织决定那一年的竞选，要对泳装表演的规定作些改变。参赛者可在五、六种颜色的四种不同风格的泳装中进行挑选。这点算不上是根本变化。

对于海丝穿晚礼服参赛的项目，我们感觉轻松多了。因为我们可以只花二百五十到三百美元的价格租穿一次，而不用花一、两千美元去把礼服全套买下来。参赛前的冬天，也就是海丝第二次竞选亚拉巴马州小姐时，她和其他几个州的竞选小姐为安·诺辛顿作了一次慈善性质的时装表演。安是一位天才的亚拉巴马州服装设计师。她的设计风格是每套服装都各具特色，从不重复。安和海丝在那场表演中相处得很好。海丝称安为“我的神奇教母”。海丝说：“只要穿上安设计的服装就会使我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如同灰姑娘去参加盛大的舞会。”

当时安已经开始为第二年夏天的亚拉巴马州小姐竞选活动设计晚礼服了。海丝一定能穿上。因此，晚礼服的竞选项目倒使我们感到很放心。

现在，唯一需要认真考虑的是社区服务的项目要求。我们发现，海丝的义务工作和她的演说主题一直未能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把这两件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海丝在这两个领域的表现就会更突出，也会更得力。

在第一年参加了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的选美之后，我们又立刻投入了亚拉巴马州小姐竞选，因为时间太匆忙，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只能把海丝已做过的事罗列一番，作为她的社区服务项目。其中有海丝参与的去圣·路易斯的新生春游，这是校园教会联谊会组织的一次活动。这次活动主要是为无家可归者的避护所服务，并整修了一座市内教堂。

第二年，为满足对社区服务竞赛项目的要求，我们提供的是海丝在“心灵之声”组织中进行的工作。“心灵之声”曾经是一个音乐组织，海丝作为

该组织在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的外围学生，又重新把它组织起来，并负责指导。它的成员包括听力健全和听力残疾的大学生，他们专为中小學生表演一些充满奋发向上精神的节目，目的是提高孩子们的自尊与自信，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这些孩子也包括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听力健全和听力残疾的学生。这项活动扩展到了整个州的东部，海丝把这一组织看作是连接有声世界和无声世界的一座桥梁。尽管“心灵之声”的宗旨与海丝的演讲所强调的“自尊与自信”相一致，但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

海丝在领导“心灵之声”一年之后，觉得自己应该把服务的重点放在更小的孩子们身上。她感到，她接触过的许多十几岁的孩子自我意识已基本形成（无论是好是坏），甚至根深蒂固，比较难于改变。似乎从更小的孩子做起，才会收到最好的效果。

我认为海丝的判断很正确。但还是告诉她：“你知道吗？在教育方面，人们总是告诫我们，你所教的对像越小，讲授的内容就越需要形像具体，这样才能使他们更明白。所以，如果你要从事为更小的孩子服务的项目，你必须通过形像生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帮助他们理解并记注你所教授的内容。”

有那么一段时间，海丝努力思考，将“彩虹”与她的主题相结合，用前者说明后者，可怎么把它们联系起来呢，始终没有灵感。最后我说：“我们为什么不从反方向去找答案呢？先说说你要使那些孩子获得成功、建立自尊的最基本的要点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些要点反过来找找看，也许会有什么启发。”

她果真照着去做了。斯蒂芬妮、斯苔希用长途电话和我一起帮海丝把她立题的主要内容压缩到五点。这样，我们联想到星星有五个尖，这便是海丝的“星光”项目命名的来由。“星光”的意思是：靠行动来取得成功并实现梦想（STARS — Success Through A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your dreams）。通过项目，海丝向孩子们宣传强调“星光”主题中的五个要点：1）积极进取；2）相信梦想；3）刻苦努力；4）诚实求是，敢于正视自身的弱点和障碍；5）互相支持信赖。

这些基本点都出自并代表了海丝自己的生活经历。她能够使这些要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因为这些都曾经有效地帮助过她。实际上，这一整套项目概括了我们全家曾经用来帮助她在生活中度过不可想象的难关、克服障碍而取得成功的全部策略。

我们立刻重新写出海丝的演讲题纲，并交给好友维基·戴维斯。她向海丝提议把绿色峡谷小学作为开展社区服务项目的试点学校。维基·戴维斯是这所小学的校长，海丝可以在这所学校里实施完善她的项目。维基·戴维斯告诉海丝：“这个项目很有意义，适合于各个年级，让我们试试吧！”

我们从编印“星光”小册子入手。我弟弟迈克和他的妻子洛伊丝在周末帮助设计，并用计算机打印出来。海丝把它们分发给小学高年级学生，让他们作为她的信息传播队。维基突然又想起学校里有一大盒塑料星星，是很久以前留下的，已经没人记得当时是为组织什么活动而准备的。她建议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徽章重新涂上颜色，海丝就可以用它们做‘星徽’，这种东西非常形像，又可当做纪念品，可以把它们发给一年级或学前班的学生，他们太小，比起海丝的小册子来他们对‘星徽’会更感兴趣。”

我们都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就这样，一天晚上，海丝去维基和吉姆家

把这些星星都涂上了颜色，那晚他们一直忙到深夜，大家都很累，便打趣开心。维基拿起一个刚刚刷好的金色星星，举到眼睛前，模仿小丑的面具，然后说：“发光吧！海丝，发光吧！”大家全都大笑起来。突然，我们发现这又是一个启示：“星星”是要闪烁的，“星星”是要发光的！

就这样，“发光吧！海丝，发光吧！”成了令人振奋的口号。绿色峡谷小学的学生们把这个口号写在标语上和旗帜上，并把它们悬挂、张贴到学校的各个角落来欢迎海丝。表示他们支持海丝在竞选亚拉巴马小姐中获胜，同时也提醒自己去实践“星光”项目的宗旨。这一年，绿色峡谷小学的孩子不仅把海丝看作是相互支持的团体中的一员（这是海丝“星光”项目的第五点），并且，他们对项目宗旨的反应也非常热烈，海丝很快就把“星光”项目扩展到了卡尔曼区内的其他学校，并以“面向更小的孩子！”为口号，动员年轻人投身社区服务项目，这样做在许多方面都使我们获益匪浅。海丝从中意识到她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显然也非常喜欢她。

那年，我们考虑到海丝竞选策略的另一方面是面试。台上问答并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因为对这种不可预测的即兴问答，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作好准备。让人放心不下的是海丝怎样在竞选周之前，与台下的裁判们在预赛面试中达到更深的默契。这不仅仅是因为面试对海丝的交流能力是一种挑战（她发现在分别与五位裁判对话时，她常常不明白他们的问题），就连裁判自己似乎也很尴尬，他们不知道当海丝不明白所提的问题时，他们该怎么办。从海丝头两次竞选亚拉巴马小姐的录像中，我们注意到，有好几次，海丝完全或部分地误解了裁判的问题时，裁判仍是任她按自己以为正确的理解来回答，他们从不向海丝澄清他们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很显然，他们尽量想使自己的言行礼貌周到一些，为了使海丝能放松一点，而不让她知道她并没有明白他们所问的问题。但我们想，他们的这种“帮助”，从长远的目标讲，势必影响海丝的分。但当时我们还不清楚该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以前海丝的竞选活动中，我们遇到过一些人很坚决地劝阻我们，让我们不要提海丝是个失聪姑娘。“可她确实是个失聪的姑娘，”我们说，“根本不可能假定她不是。这可不是那种能够轻易忽略不计的残疾。”对海丝的听力残疾我们一向开诚布公，这正是星光项目五点宗旨中的第四点。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一障碍。现在我们也丝毫不打算有任何改变。

因此，在她第二年竞选亚拉巴马小姐时，我们决定勇敢地面对这一问题。海丝把一小打纸片和一支铅笔带进了考场。这样，一旦她感到理解问题有困难时，便把笔、纸递给裁判，并解释，如：“很抱歉，我由于听力损伤不能完整、准确地抓住每一个问题，但我很想尽可能地回答所有的问题。如果您能为我写下来，我们便可节省些时间。”尽管如此，我们发现海丝还是漏过了一些问题，裁判们对此仍是听之任之。

后来是吉姆和维基·戴维斯的女婿布兰登·布兰肯希普非常准确地给我们指出了问题所在。戴维斯夫妇最初参与竞选是由于他们的女儿唐娜·李的缘故，唐娜·李本人在海丝参加竞选的前几年曾竞选亚拉巴马小姐，她现在常常是海丝的义务工作人员。因此，他们全家都非常积极地参与竞选工作，也非常熟悉竞选过程以及那些参与竞选的人们。

布兰登在海丝决定第三次竞选亚拉巴马小姐时就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们都是海丝的支持者，又都是选美迷。但我想，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否则，海丝永远不会成为美国

小姐，这就是与裁判的面试。”

我们说，我们已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两年了，就是不知道怎样解决。

他告诉我们，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是裁判所能提出来的问题，对海丝来说，真正的障碍是裁判们不能明说的问题！也是他们永远不会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丧失了听力的女孩子有能力承担得起亚拉巴马州小姐或美国小姐的重任吗？我能想像，即便是世界上最不尽情理、最苛刻的裁判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我很明白，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于海丝参与的所有竞选中，存在于每一个裁判的头脑中。除非海丝能回答这个问题，并能使裁判们满意，否则，她永远不会在州或国家级竞选中获胜。

“我当然相信海丝有这个能力，但她必须首先要说服裁判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她必须想方设法引出并回答这个使人难以启口的问题。”布兰登说。

我们心悦诚服地认为他的确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但大家对如何解决仍感到束手无策。整整一年，我们都在反复地讨论着这个难点。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中除了选美就没有别的事情了。我仍在忙着教书，海丝也正处于大学最艰难的一年。

海丝在决定再次竞选亚拉巴马州小姐之前，就已经决定转到蒙得维罗大学。当时她三年级，在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的生活使她感到很愉快。不过，亚拉巴马州小姐竞选中获得的特长奖为她在蒙得维罗大学提供了全部四年的学费。除了这个在经济上非常诱人的原因之外，这所学校离伯明翰最近，只需往南开车行驶半小时，这样可以保证海丝坚持每周六天（星期日除外）参加莫妮卡的私人舞蹈训练。

我弟弟迈克毕业于蒙得维罗大学，在我们开始权衡是否转学时，他和我父亲同海丝一起参观了这所学校。招生办的人介绍了大学里有关帮助聋生的项目。海丝、我父亲和弟弟都对这所学校为参观者服务的手语翻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海丝转学后，学习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当然，蒙得维罗大学的确有一个帮助聋生的项目，为失去听力的学生服务，但这种帮助并不像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所提供的帮助那样适合海丝的需要。为了让海丝完成她的文学课，我们别无选择，我必须陪她一起参加指定她出席并评论的戏剧表演。这样，由我作记录，给海丝解释台上的剧情发展，以便使她获得足够的资料写出报告。她极其努力地想方设法赶上其他许多课程。我和斯蒂芬妮突然发现，自海丝上中学以来，我们自己又一次重新坐下来，将她的许多课堂录音带不停地笔译过来，至少是将其中的要点摘出来，帮助海丝，为了不使学习成绩在那一年跌落得太厉害，我和海丝付出了数倍的心血。

但学业上的重负并没有使我真正担忧，以前我们曾应付过这些情况。真正使人担心的是我们面临的从未有过的经济上的压力。感谢上帝，海丝免了学费；感谢上帝，我们不断收到来自州政府的康复服务项目的资助，才帮助我们解决了吃住问题。因为，去年选美的花销已使我们在经济上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所有的银行储蓄都在最低限上。现在为来年的亚拉巴马州小姐竞选，我们还要支付一长串的开销。此外，如果海丝真成了州小姐的得主，谁知道竞选美国小姐又要花费多少呢？

对我来说，似乎最好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卖房。我可以用它偿还一些债务，也许还可有些剩余来填充我的信用卡，为即将来临的选美花销作准备。我对自己说：“家里其实并不需要整栋房子。现在只剩下

你和海丝了，她大多数时间都是住校，公寓更适合你。维修费要少得多，也不需要保养。这是一次明智的搬家，而不是什么自我牺牲！”我也是这样对别人说的，包括海丝。就在那年春天，我在房前竖起了“出售”的牌子。

很幸运，恰恰是以往我们认为在竞选中所存在的较大的问题，这次却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当我们在四月份收到竞选办公室寄来的跟往年一样厚的申请及信息资料时，才知道裁判面试的程序有所变动。以前的面试要求参赛者走进房间，首先宣布自己的名字，之后立刻答复裁判提出的各种问题。今年，也是第一次，每一位参赛者有两分钟的时间作一个开场陈述。在这段时间里，选手们可以说任何自己想说的话，然后才是正式的提问。

我们立刻明白这两分钟可以为海丝提供一个好机会，阐明那个任何裁判都不会明确提出的关键问题。但海丝怎样才能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呢？我们不停地祈祷、商量、思考，直到竞选周的来临。

房子卖掉了。我们忙于收拾东西、搬家、完成学业、参加周末的选美研讨会，以及其他所有与每年一度的大型的州级竞选有关的准备工作。我们几乎没有空余时间。在竞选周之前的星期日下午，最后一个意外又冒了出来：海丝竞选时穿的白色晚礼服的拉链突然坏了，我们慌忙打了几个电话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在紧要关头做这种修补的人，她是我母亲的朋友。

尽管如此，星期一早晨，我们离开了新公寓，把海丝送到参赛者宿舍。我觉得我们俩都很有信心，同时也为我们有可能取得的结果作好了思想准备。“就这样了！”

我们心照不宣，但彼此都非常清楚，这恐怕是海丝赢得亚拉巴马州小姐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也是她最后一次向竞选美国小姐冲刺。

那一周的头两天，海丝完成了她的面试。她步入考场，说：“我是海丝·怀特斯通，卡尔曼区小姐。当我一岁半时，生了一场重病，药物挽救了我的生命，却彻底地夺走了我的听力。人们告诉我母亲，说我不可能过正常的生活，比如，我将永远不能开车，不能上普通学校。然而，感谢上帝，在我们家庭的字典里找不到‘不可能，这个词。星期三晚上，你们将会看到‘坚信梦想’会结出什么果实。现在是我运用自己的全部机智和能力来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了。”

“我梦想成为美国小姐，我梦想获得大学学位。但我知道，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同样的问题，我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一位失聪女孩能胜任亚拉巴马州小姐和美国小姐的职责吗？我的回答是：能。我能够胜任！因为我意识到，在上帝的帮助下，有志者事竟成。我并不把耳聋看作是障碍，而看作是创作性思考的机会。我通过‘星光’项目在小学传播这一信念。”

“此外，我想说明，因为唇读最多只能使我理解别人所提供的信息的百分之五十。因此，我也许会重复你们所提的问题，以便确认我是不是真正明白了那个问题，或者，我可能请你们写下这些问题，以节省时间。”

“这次面试使我非常激动，请开始吧！”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海丝的开场陈述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们觉得这个介绍至少能让裁判明白海丝的意图，解答了一切他们难以启口的问题，排除了他们心中对海丝的疑虑。

这一年，我们没有听到像以往那样的小道消息。所以我只能注视着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希望海丝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和斯蒂芬妮把我们传统的“每日惊奇礼品”寄给海丝。

我知道，当她在星期四打开礼物，发现那个红色卷发小矮人再次出现在眼前时，一定会大为吃惊地笑出声来。因为在我们进行搬家前的小拍卖时，海丝将这个娃娃扔进了垃圾箱。我私下把它从被泥土掩埋的厄运中救回来，想让它为今年的州小姐竞选再效一次力。跟它一块寄出的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你觉得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头发披下来时，我——发型督察又回来了。请把头发梳上去！”

听说海丝要在星期六晚上，穿上她最喜欢的安设计的晚礼服上场进行最后的角逐。我包好了一个特别的小礼物，这是我所能找到的非常漂亮的马拉车的微型玻璃画。把它寄出时，我在里边夹了一张小条：“海丝，愿你今晚像灰姑娘一样，梦想成真！爱你！妈妈。”

我不知道海丝是怎样的感受。那一晚，我简直紧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天晚上是亚拉巴马州小姐竞选的决赛时刻。想到这是海丝的最后一次机会，就更增加了我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以往任何一次竞选都无可比拟的。

在我突然意识到海丝已赢得1994年亚拉巴马州小姐桂冠时，是我平生最激动的时刻，当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如释重负之感油然而生。

遗憾的是由于竞选亚拉巴马州小姐的传统方式，我根本没能听到宣布海丝获胜的激动声音，也没能在那儿看到女儿戴上亚拉巴马州小姐桂冠时的情景。

美国小姐的竞选共有五人参加最后的决赛，而亚拉巴马州小姐的竞选则有十位。最后这十位女孩子跟其他参赛者一起排队站在台上，主持人开始宣读名次：“第四亚军……”，待掌声平息过后，宣布下一位，“第三亚军……”依次宣读下去。

通常在宣布第一亚军的同时，一位选美官员会悄悄溜进观众席，刻板地抓住即将被宣布为冠军的小姐的家长，快速离开观众席。所以我所经历的竞选的最后时刻是听到主持人宣布：“第一亚军艾米·欠思迪肯林小姐。”

就在宣布第一亚军的同时，离我最近的出口门打开了，一位官员进来把我拉出座位。当然，所有坐在我周围的家人和朋友们看到这一情景，顿时发出一阵狂喜的呼喊，他们狂呼着：“海丝是冠军！海丝是冠军！”这时，台上还没来得及宣布冠军得主的名字呢。

然而，这伟大的时刻到来时，我却不在那里，我没有看到观众的反映，也没有看到女儿感情上的反映。我永远也没有机会看到海丝是怎样踏着胜利的脚步，头戴亚拉巴马小姐桂冠横穿舞台的。这时，我正由那位官员陪着快速地下到一个无人的楼梯口绕到后台，而台上台下的一切，只能由我去想像了。就在那帷幕后面，我不耐烦地等待着时机去拥抱我的女儿，祝贺我的女儿。而这一期望直到很晚很晚的官方招待会上才得以实现，这大大地刺伤了我，但海丝毕竟赢了！海丝终于赢了。激动的热泪流过我的面颊，我对自己说：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不记得几周之前我是否就已预感到会有这个结果了。

## 第二十一章 梦想成真

在竞选后的大型招待会上，家庭成员才有机会与海丝共同度过少得可怜的几分钟。而我则有幸与海丝多呆了一段时间，我们走上赖特中心的楼梯，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下桑福德大学的客人公寓，海丝将在这里度过整整一周。在这段时间里，她和全体亚拉巴马州选美委员会的官员们一同处理参加九月在亚特兰大举办的美国小姐竞选的所有申请事宜。

再过一周，海丝将开始按照那旋风一般的时间表向全国展示她亚拉巴马州小姐的风采了。我唯一能够想像的是，海丝对所有这一切一定是激动不已。对我来说，只要能在报纸上看到她的照片，能在收音机里听到有关她的报导，就已经很满足了。开始，她忙得不可开交，我简直找不到机会与她通话。

由于过度兴奋，头几个星期与海丝联系很少并未干扰我的情绪。但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滑过，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被远远地关在门外，而这种情形是在亚拉巴马州小姐竞选一结束时就发生了。这是后来所有事情发生的先兆。现在，我似乎才明白过来，自己已实实在在地被隔绝在女儿的生活之外了。

显然，亚拉巴马选美委员会认为海丝“如同巢中雏鸟”，现在该是鸟妈妈将雏鸟推出鸟窝的时候了。“你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自己飞翔了，海丝。你需要离开那窝，脱离家庭自立了。”他们甚至还告诉她，“美国小姐寻求的是独立的女孩子。”这暗示着，如果海丝流露出对家庭的过分依赖，她将永远不会赢得美国小姐的桂冠。

问题是，说这些话的人并不了解我的女儿。一位帮助选美工作的老志愿者同我谈起她与亚拉巴马选美委员会一个成员的对话。这位成员以一种恼怒的口气抱怨说，“我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海丝该做什么，可她就是不。”

这位志愿者是我的朋友，她回答说：“你知道吗？如果你把让海丝做的事写下来，就不会有那种麻烦了。海丝是个失聪的姑娘。可她掩饰得非常好，所以你根本没有看出来她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听懂你的话。”

这位官员对我朋友的建议只是转了转眼珠，这种表情究竟是说明她认为这种建议太可笑，还是表示与耳聋的海丝打交道令她束手无策，我无从知晓，无论是哪种可能都使我担忧。

家人们有过可数的几次机会去看望海丝，时间非常短，其中有一次使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星期天。父亲、母亲、斯蒂芳妮、特雷和我应邀与海丝及她的陪同共进午餐。饭前的时光在愉快的闲谈中渡过。可每当我们问及海丝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如：“你的舞蹈训练进行得怎样？”“你买了什么衣服了吗？”或者“你是不是已开始作面试前的准备了？”等等，海丝立刻不停地说：“我们别谈这件事了。”“我不能讨论这件事。”或者，“他们告诉我不许涉及与竞选美国小姐有关的事。”很显然，有人已警告海丝，任何与竞选美国小姐措施有关的问题都是被禁止的。海丝越是重复这些话，我越是烦躁、恼怒。

终于，在午餐快结束时，这种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当海丝读错一个单词的时候，斯蒂芳妮很自然，也很随便地打断海丝，纠正她的发音，这正像我们家庭从海丝呀呀学语时起就一直做的那样。

突然那位陪同非常气愤，告诫斯蒂芳妮说：“英语课上够了！开始吃甜食吧！”

我慢慢地，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盘子往桌子里边推过去。斯蒂芬妮后来说：“你就像在为一场战斗打扫战场。”

好在没有真的争执起来，尽管我非常想说几句有分量的话，可还是没说。几分钟后，我们在紧张的气氛中吃完甜食，礼貌地与她们道了再见。

这次聚会使我想起我母亲的直觉。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跟我说“海丝那边的情况看来很不对头。”

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替海丝担心。十分清楚，那些负责海丝竞选美国小姐的人并不理解海丝，也不知道她的需求。显然，他们更不了解海丝的家庭成员，不懂得这个家庭在她成长中起的作用。似乎，他们只是把我和家里的其他成员都看作是公认的引人注目的忠实随从人员（包括我的父母亲、海丝的姐姐们及她们的夫婿，还有姨妈、舅舅、表兄妹及朋友们……其中一些人热情而兴奋地几乎对所有的情况都作记录）。他们认为这些人的出现不是积极的支持，而是消极的干扰。

没有人事先向我们提供海丝在公共场所露面的时间表，所以，我们也无法通知家人和朋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可以看见海丝。而某些我们确切知道的活动，又被强硬地阻止参加。

人们很自然地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有关海丝的情况：“她一定非常激动！她对即将来临的美国小姐竞选的感觉如何？她在做哪方面的准备？这个星期她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得不重复着：“估计她会很激动，这个星期我还没有跟她联系过，我想她正在做大量的舞蹈练习，我知道她今天和明天出城，但不知具体去哪儿。”作这种回答使我很尴尬。

在海丝出发去亚特兰大（途经迪斯尼世界，她在那里将同其他所有参加美国小姐竞选的姑娘们一起度过整整一周的时间）之前五个星期里，他们没有让我与海丝见过一次面，没有人告诉我，在这种国家级选美活动中，选美委员会为亚拉巴马州小姐选了什么服装。他们甚至不允许帮助海丝整理行装，到机场为她送行。

现在，当我回顾这一切时，最刺伤我的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丝毫机会留下任何可纪念的东西。许多年来，我和我的家庭保存有许多与海丝共享的能带给我们美好记忆的东西，包括海丝竞选时的收藏品，记录等等。然而从七月的州选美到九月的国家选美之间的三个月中，我们却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海丝作为亚拉巴马州小姐，所开展的活动的全部记录。今天，当我们共同全力以赴去追求、去实现海丝的美国小姐之梦的时候，作为母亲和女儿，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本应有的“共同分享”的机会却被剥夺了。我们没能分享共同制定计划的紧张，没能分享这最后三个月中所共有的期盼与激动。这三个月是海丝通往她的最终理想的不平凡旅程的最后一步。这本该是我们最美好，最有价值，最幸福的时光，却被离别和担忧所造成的情感上的痛苦所替代了。

我很担心海丝的健康。整个夏季，亚拉巴马州小姐必须履行的活动的紧张时间表已使她疲惫不堪。她并未得到我们曾许诺给她的彻底放松的假日，她常常由于白天过多的公众场合的露面，而不得不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才能完成她的日常舞蹈训练课。

我也同样担心她的情感健康。她的精神状况如何？她总是能在陌生人面前作出愉快的表情，而把真实感情隐藏起来。现在，她的周围都是陌生人，

因此，他们不可能知道她的真实感觉。当她不得不在没有通常支持她的人们帮助和鼓励的情况下，独自步入竞赛第一关时，她将如何应付？谁来为她鼓劲？谁会真正知道她什么时候需要鼓劲？

我担心的事情太多了。这三个月里，我的体重减轻了三十磅。这个数目比我因离婚所遭到的情感挫折而减轻的体重还多。我唯一希望的是，这一切在我们到达亚特兰大后能慢慢得以好转。

形势确有转变，但也不算上什么好转。

我最为担心的问题是，海丝在竞选美国小姐上究竟作了哪些精神准备？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海丝的耳聋却反过来保护了她，把她从周围的不利于家庭的传闻中隔离开来，阻止了她去听那些对她持否定态度的人们的议论。当然，她能感觉得到那紧张的气氛，好在她还没有学会看出许多感情上的细微差异和暗讽。此刻，她的听力障碍真是一种优势，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把她从对我来说十分明显的，充斥了整个夏季的紧张与对抗的气氛中隔离开来。

只是现在，当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上帝不仅巧妙地运用海丝个性上的优势帮助她，还神奇地运用她的“弱点”来保护她，使她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投入竞选。甚至就连她所拥有的支持系统（“星光”第五条）的潜在的不良作用也突然地、彻底地消失了。使海丝到达亚特兰大，能信心百倍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正如最后结果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在亚特兰大期间，所有的事情都按我们希望的那样进展着，甚至更好。

我同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美国小姐竞选期间渡过了极其愉快的时光，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激动的几个星期，它给我留下了美好而不寻常的记忆。看看我们这个集体的成员吧：我的父亲、母亲，斯苔希和她的幼小的女儿特萨，梅丽莎和托尼，斯蒂芳妮和特雷，我的大妹妹黛博拉和海丝的最亲密的表兄霍利，我的大弟弟吉姆和她的夫人迪贝，吉姆的岳母和她的大儿子本，吉姆和维基·戴维斯，布兰登和唐娜·李·布兰肯希普，海丝的朋友和前亚拉巴马州小姐——特蕾莎·斯特科兰，此外，还有我的同事们：韦恩、马莎、夏洛特、特里西娅、卡米尔和安妮特等，她们特地停课一周来与我共同分享这一时刻。我们所到之处，处处引起轰动。如步入餐馆，跨上赞助美国小姐竞选的日游车，甚至当漫步在我们居住的特朗普雷金斯旅馆前的沙滩上的时候，等等。而比起前来支持海丝竞选美国小姐桂冠的拥有二百五十人的亚拉巴马代表团来说，我们这个集体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组”。

竞选美国小姐的预赛总是在竞选周的星期二晚上拉开帷幕，然后连续进行三个晚上。选手们被分成三个小组（分别用美国小姐联谊会名字命名，如纒组、阿尔法组和西格马组），每位小姐参加每晚中三个主要竞赛项目中的一个。

星期二晚上，海丝和纒组的其他姑娘们登上舞台作晚礼服着装表演，其他两组分别是泳装和特长表演。结果那一晚上的竞赛结果一直没有公布，当时的选票被作为无效票秘密地收入裁判的票箱中。因此，我们无法按官方的标准来判定海丝究竟在周二晚上表现如何。我们当然是毫无偏见地认为海丝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星期三早晨，我们得到的意外之喜是公众对海丝的第一个肯定。当时，我正准备同家人和朋友们坐上汽车去附近的历史名城观光，一位选美工作的

志愿者走上前来，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一个名为“生命价值之果奖”庆祝颁奖会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一奖项是为在社区服务领域竞赛中成绩优异者而设的。海丝被命名为该奖的第一亚军，并获奖金两千元。我匆匆离开远足的家人，坐在会场后面，骄傲地注视着海丝接受一周来公众对她的第一次认可。

紧接着，同一天晚上，海丝又在泳装预赛中获胜。我们这一群人简直疯狂了，因为这一连串的成功大大地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到了星期四上午，有关海丝的议论沸沸扬扬。获得生命价值之果奖的第一亚军，又在泳装预赛中排列第一，这一切使海丝突然之间成了竞赛关注的焦点。地方报纸立刻刊登文章，描述人们感兴趣的、来自亚拉巴马的这位丧失听力的参赛者。人们偏爱海丝。

整整一周，亚特兰大快报都从头到尾详细报导着选美竞赛。有关海丝的报导总是超出她应享有的版面，所以我父亲每天都要买很多份，分发给组里的所有成员。这好像成了他的工作，甚至他还拥有一个自己最喜爱的、很特别的、总是推销热点新闻的报摊。到周末时，报摊老板一见到父亲就主动上前打招呼，并下意识地顺手抽出已捆好的二十份报纸递给父亲。

那一周，我们尽可能地享受着有利于海丝的所有报导。不过，我们也很清楚，舞台上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可以想像，当海丝在周四晚上又赢得特长预赛第一名时，我们的激动真是达到了疯狂的顶点。

无论如何，同时获得预赛中的两项冠军（泳装和特长），这一非同寻常的成就使海丝理所当然地占据了问鼎桂冠的位置。一些有经验的竞赛观察家告诫我们，这很有可能只是一种不祥之兆。他们说，有一半的竞赛显示，预赛中的双冠得主在周六晚上的决赛中往往被评为第一亚军。

我知道，无论结局怎样，我都会为海丝感到骄傲。我告诉自己：赢不赢没关系。

可它的确有关系。海丝的梦是成为美国小姐，而不是第一亚军。我简直不敢想像，一旦她就在离目标仅仅一步之遥便颓然倒下的话，她的失望该是怎样，她将怎样面对这一事实呢？

到了周五，就连海丝的家人和朋友也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无论我们走到亚特兰大的哪个角落，人们总要同我们谈论海丝，记者们给我们留下厚厚的一叠电话记录，要求采访。电视的录像镜头把我们拦在旅馆的大厅里。幸亏我的竞赛身份片上印的是“格雷”这个姓，否则我不会轻易地逃脱新闻媒体，那样的话我恐怕整整一个星期都要不停地对着麦克风说话了。

美国小姐选美组织安排了整整一周的优秀管弦乐表演，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尽兴。

在如此美妙的一周中，唯一令人扫兴的事就是把海丝同她的家庭隔开，这时时引起我不可抑制的懊恼和丧气。前亚拉巴马州小姐的母亲曾事先告诫过我，整整这一周，参加竞选的姑娘们非常繁忙，她们的活动时间表安排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张，几乎没有时间让家人去看望她们。只有当她们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舞台上和每一次预赛后在舞会大厅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才能得到一点点宝贵时间，通过拥挤的人群看她们一眼。因此，我们并没指望与海丝有更多的联系。

然而，这位母亲还告诉我们，周一晚上专门安排有一段自由时间，让姑娘们与家人聚会。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在周一很早就赶到那里，比竞赛的日期整整提前了一天。为了期待着与海丝一起进餐，共度傍晚的时光，周一下

午，我们一到达亚特兰大就给海丝的房间打电话，告诉她的陪同我们已经到达，并准备与她们共进晚餐，地点则根据她们的方便任选。陪同告诉我们，海丝一回来，她就会转告海丝。可她并没这样做。当我们已经饥肠辘辘，不得不放弃在房间等待而外出就餐时，我们看到许多参赛的小姐们正与她们的亲属漫步在海滨的木板路上。海丝打来电话，打听我们是否已经到达亚特兰大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毫无疑问，要横穿整个城市相聚，对于任何一个亲属来说都为时过晚了。

直到周五下午，全家没有一个人能得到机会与海丝见面交谈。斯蒂芬妮拦住一位亚拉巴马州小姐竞选委员会的官员，向他诉苦。她含着眼泪解释说，梅丽莎极渴望与海丝见见面，哪怕有一点点时间也好，因为梅丽莎那一周正好从空军回来度假，她已有一年没见到妹妹海丝了。这位官员耸了耸肩，说他帮不了这个忙，然后告诉斯蒂芬妮去找海丝的陪同谈谈。

在美国小姐彩车游行之后的那天晚上，斯苔希、梅丽莎和我终于获准进入海丝住的旅馆，我弟弟吉姆和他的妻子迪贝自愿开车送我们横穿这个城市。但当我们给海丝房间打电话时，根本没人接电话。我只好告诉服务台我是谁，并说我知道海丝肯定就在旅馆的什么地方。终于，其中一个服务人员得到回音。几分钟之后，那位陪同下楼来，在大厅对我们说海丝根本不能见我们，因为她一直在坚持跟她的教师上舞蹈课。这位陪同并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已事先同莫妮卡联系过。她告诉我，海丝那晚并不想排练。

当这位陪同看出我决不会就这样离去时，终于让步，允许我们上楼，去海丝的训练房见她“几分钟”。若不是我极力要求会面，梅丽莎和斯苔希整整一周都不会有任何机会与海丝见面。

尽管组织竞选亚拉巴马州小姐的官员对我家的态度早已使我们心灰意冷，但整个一个星期我始终把这种情绪藏在心底，我甚至对比尔和他的新夫人被允许购买“父母亲厢”特殊票也没有提出抗议。这种票本是此次竞赛专门分配给各州获胜者的双亲的。我不愿引起争吵，唯恐影响海丝，怕她因此而丧失获胜的机会。

现在回顾往事，我可以真诚地说，上帝早把一切都安排得无懈可击。假设当时我买到了那张父母优惠票，我虽然可以坐在所有参赛者的家长之中，从头到尾观看这一竞赛。但这些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而现实是，我正同这个世界上自己最爱的人们在一起，被他们簇拥着，得到他们的支持，和他们共同度过了我平生最兴奋的四个夜晚。一百万美元也买不到我在1995年美国小姐竞选中的美好记忆。

到周六晚上，这种预计的兴奋气氛难以置信地渗透了整个城市，感染了亚拉巴马州代表团，尤其是我们家庭的全体成员，那激动的程度的确令人难以言表。

离广播的时间还有几分钟，上万观众仍在自己的座位附近徘徊张望，寻找着朋友，继续着关键时刻的猜测：究竟谁能赢？台上传来简单的说明，告诉听众在电视广告的间歇时间里，在哪儿可以找到电视监视器。

就在这段时间，我靠近父亲，小声说：“我简直不相信，为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紧张。你知道，每到最后一晚的决赛，我的心总是提到了嗓子眼儿，从没这么轻松自在过。我感到奇怪，会不会是不祥之兆？”

我父亲朝我一笑。“这是因为还没到时间，别担心，你很快就会受到众人瞩目的！竞赛马上该开始了。”

我也回报父亲一笑，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心想：也许他是对的。我敢肯定在竞赛过程中，我会处于精神状态最糟糕的境地。

就在此刻，我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笼罩了，一股暖流从我的头顶开始，流过我的全身，直到脚尖。而且我的大脑同白昼一样清亮。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放松一些，尽情欣赏吧！今晚属于她！”

我没有向任何人流露我的感觉，也没把我听到的话说出来，我不敢，同时，我也没有时间说。

交响乐开始了，竞选现场直播传遍了全国、全世界。

随后的三个小时，与海丝所参加过的任何其它竞赛不同，我能够放松地欣赏这次竞选。当竞赛进入台上答题的阶段时，我稍有点急迫。这场参赛者与主持人的对话，面对的是聚集在会议中心的一万三千名观众、是全世界坐在电视机前的千百万观众。接着，在等待公布最后结果的广告间歇中，在漫长的缓慢宣布第四亚军、第三亚军、第二亚军名次的时刻，我的心又沉浸在紧张的煎熬中。

说实话，直到听见主持人宣布“新的 1995 年美国小姐是亚拉巴马州小姐，海丝·怀特斯通”时，我才真正地彻底地松弛下来。

在这之后，我的确欣赏了几分钟的表演。我注视着已成长起来的女儿，她再一次站在那条长长的闪光的甬道上。这次是她自己戴着桂冠走在上面，向全世界招手。

我被请进后台，同斯苔希、梅丽莎及我的父母亲一起坐在新闻发布会的会场后排。这是海丝成为美国小姐后的第一次官方新闻发布会。直到此刻，我记起自己听到的那个声音，想道：“海丝的梦想成真了，今晚属于她！”

那一晚真是疯狂而又绝妙。直到第二天早晨一、两点钟，新闻发布会和两、三个公众招待会才结束。海丝回到她在哈拉斯旅馆的新客房，这里是家庭成员和美国小姐选美组织官员们的一次非正式的庆祝会。

宴会结束后一、两个小时，人们才逐渐散去。海丝和我回到她的卧室，门在我们背后关上了。这是数月来第一次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们互相注视着，欢呼起来。几乎是同时喊出：“真不敢相信这一切！”

我们一起坐在床沿上。海丝开始告诉我，她在这一周里收到的祝她好运的各种电报，“桑迪·帕蒂寄了一封，我还收到一份来自……”她激动地罗列了一长串的名单。

海丝慢慢平静下来。我决定必须把上帝对我的启示告诉某个人。所以我对她说：“海丝，今天晚上我感觉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你知道每次决赛前我的精神都非常紧张。”

她点点头，她非常了解我。

“可是，今晚我却很轻松。就在广播开始之前，我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而且还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放松一些，尽情欣赏吧！今晚属于她！’”

海丝脸上出现惊讶的表情：“妈妈，您恐怕不会相信，就在今晚决赛开始前，我正站在后台，就在这时，也有一股暖流流过我的全身，并且我也听到一个声音：‘放松！跳吧，今晚为我。’而且我整个晚上也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

我不知道海丝此刻是怎样感觉的，但当我们有一种沉默的敬畏之中相互注视的时候，我感到一股清凉的寒气由下至上贯通了我的脊骨。

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女儿刚刚赢得了美国小姐桂冠。

## 第二十二章 美国小姐的母亲

1994年9月17日，这个日子其实只是海丝完成美国小姐之梦的开端。

到海丝任美国小姐的第一个月底为止，她已经受到了美国总统的亲自接见和第一夫人的两次会面，还在亚拉巴马众议员理查德·谢尔比和亚拉巴马州议会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在美国国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发表题为“有志者事竟成”的演说。她还会见了许多国内团体，应邀演讲，介绍她战胜身体残疾的感受和经验，克林顿总统还委派海丝到他的残疾人就业执行委员会去工作，她还与教育部长会了面，讨论她今后可能为教育部门工作的方式。

《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纽约时报》及其他许多全国性出版物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新美国小姐的长篇特写。海丝数度在国内穿梭往返，到各地公开露面，向各种不同的观众发表讲话。

从第二个月开始，事情就更加热闹了。

人们最吃惊的是海丝本人以及她的关于神灵启示和保佑的讲话。在四个月内，美国小姐选美组织(MAO)宣布，海丝是美国小姐竞选史上受到邀请最多的美国小姐之一。

海丝在作为美国小姐的服务年期间，要完成令人惊愕的总计超过二十五万英里的旅行。感谢设在新泽西州的美国小姐选美组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总是十分及时地将海丝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旅行计划复印件寄给我。海丝每隔一天就去一个不同的城市，所到之处，她都于新闻界会面。我知道她有时甚至在这个城市吃早餐，到另一个城市吃午餐，而晚餐再换下一个城市，她每个月只有一天休息日。当我从头到尾看完一张海丝的日程表以后，常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躺下来睡个大觉。

看到我的家人、朋友和熟人无数次地对我表示他们的关切，询问我如何妥善处理海丝成为美国小姐后的各种关系：“你是如何支撑下来的？达芙妮，放她走想必是很困难的！你不想她吗？”等等，我感到很有趣。

我发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我在海丝离家上大学时所讲的一样：“当年我送仅仅十一岁的弱小女儿离家外出上学，整整三年我的心如刀割一般，与这样的感受相比，海丝作为美国小姐的这一年，无论怎么紧张忙碌，也都无足轻重了。”

现在海丝已是一个成年女子，她一直都在梦想成为美国小姐，我知道她已作好一切准备。的确，我很惦念她。但这也只有一年，我知道工作结束后她会回到家里来，变成一个比现在经验更丰富的人。因为我认识到海丝的美国小姐冒险活动，像她在聋儿中心学校具有转折意义的三年一样，会丰富和开拓她的眼界，对她今后人生发展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在过去那些年里，全家集中了那么多的时间和感情来帮助海丝实现她的梦想。我从来未停止过这样的想像——作为一个美国小姐的母亲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对我来说，突然间受到公众的注目，当然是很令人兴奋的，但它也有反面的教训。

我最初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一点很小的引用错误都可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美国小姐竞选期间，当海丝被问及她耳聋的原因时，她和我说的都是：在海丝十八个月时，当她刚注射完白喉、百日咳、破伤风三联预防针(DPT)后不久，她患了一场严重的热病（我们确实从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无任何联系），在她住院以后，病入膏肓之际，为挽救她的生命所用的药物导致了她的

的重度耳聋。

后来，有一位记者在报道中省略了用药的问题，结果造成殃及全国的后续故事，引起读者强烈反映：新的美国小姐和她的母亲说，她的耳聋“是因为一剂 DPT 注射引起的”。

海丝和我两人都曾尝试反驳那篇报道，我们再三说明我们从未讲过是 DPT 注射导致海丝耳聋这样的话；我们也从不相信 DPT 会导致耳聋。但是，副作用已经发生。

在以后的几周时间里，常规预防注射率大幅度下降，致使全国各地的卫生官员都发出警告。美国儿科学会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原来为海丝治病的医师们的声明，指出 DPT 并未损伤海丝的听力。我被要求参加公共事业宣传通告，以便澄清问题，保证儿童的预防接种。接着，我们开始听到反对预防免疫派方面对我的指责，说我改变了事实的真相，将自己出卖给卫生部门。

有几个月，我不断收到争论儿童免疫问题的两派人们寄来的措词激烈的信件，这样的后果简直令我难以置信。

此外，我的简短的“好莱坞经历”也让我从中有许多领悟。正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很多制片人看中了海丝和她的故事，想让她拍电影、电视。竟然还有两个人送来了合同。但是，几乎所有的电视电影制片人全都只对比尔和我的婚变细节感兴趣，其中一个人居然说：“卖给我你们离婚的全部真相！”当我告诉他们以下两点时，他们顿时失去了开始时的兴趣。1) 我认为海丝父母的离婚不是她的故事的焦点；2) 无论出多少钱，我也不愿重新揭开老伤疤，也没有兴趣以自己家庭的伤心事来引起社会轰动。

他们大概把我看成什么都不懂的乡巴佬。一份建议的合同书上有这样一条：“制片厂有完全的创作自由，可以任意编写故事以达到‘戏剧性的效果’。”如果这条还算好的话，在同一个合同中还包括另一条，指出如果任何人对电影的内容提出诉讼，我个人必须承担所有的法律诉讼费用。无须赘述，我当然没有签订任何这样的合同。

我猜想，今天已经没有人对摄制乐观积极的、鼓舞人心的电影感兴趣了。我为此深深感到吃惊。

当聋哑社会的许多人对于海丝作为美国小姐公开露面时，大多使用口语而不用手语提出批评而爆发起争论后，我同样没有吃惊。他们指责她将自己出卖给有听力的人的世界。有些人竟然在国内新闻报道上公开抱怨道：“讲话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口头的习惯……有听力的人给了她那么多的信任。”她“不属于有声世界，也不属于无声世界……但是，她的手语技能证明她是在一个有听力的人们的世界里长大的。”根据这些批评，他们认为：“耳聋人的特征来自使用美国手语，上聋儿学校，并出生于聋人家庭。那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海丝令人失望的原因。”

我认为海丝对这些批评的强烈程度吃了一惊，而且感到有点伤心。一位有听力障碍的杂志撰稿人甚至指责我“虐待儿童”，因为我试图教育一个聋儿学会听到和明白从她背后发出的指令，这件事是何等的“残酷”。

当然，由于我早已长期面对一切有关口语与手语间的论战，而且深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反复无常，所以，我唯一真正感到吃惊的只是，紧随海丝当选 1995 年美国小姐而来的这些争论和问题，不过是当年我第一次为她的教育问题而探索各种方法时，所有争论的老调重弹。这使我悲哀地看到，顽固的对抗和偏执一直持续到今天。同时也意识到，从我二十年前选择口语方

法至今，情况几乎一成未变。

一方面，我为海丝陷入这场论战的漩涡，感到难过。同时，又为她决心面对这些批评，并且继续让聋人社区分享她的经验的作法，而感到骄傲。我认为正是女儿年幼时，我为她所做的抉择塑造了今天的她。我知道，由于耳聋，她生活在有声世界里，就必须永远面对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她的口语训练，她还要面对无声世界的特殊挑战。

我的祈祷是：希望人们（有听觉的和耳聋的双方）都能看到海丝自己的本色。我希望他们理解并欣赏这样一个现实，即海丝作为美国小姐使得她能够继续实现另一个更有价值的梦——成为一个联系我们这两个世界的桥梁。这样，全国乃至整个地球上的有听觉的和没有听觉的人们彼此将会有更好的理解和正确的相互评价，并且相互学习。

尽管存在上述的各种争论，但我认为海丝任美国小姐的这一年一切都还不错。当然，是有过一些棘手的事，但是，这一年依然充满激情，而且始终是十分有趣和精彩的，令人难忘的好事仍然占多数。

作为美国小姐的母亲，我获得的最大补偿是，当我目睹自己的女儿对那么多人的生活产生极为积极的影响时所得到的欢乐。无数人曾告诉我，他们从海丝的故事和经历中得到极大的激励。尤其动人的是孩子们的来信，他们说海丝倡导的“有志者事竟成”为他们指明了方向，使他们意识到人不应该被自己的残疾所禁锢。正像一位身体残疾的女孩写给海丝的信上所说的那样：“自从听到你在这儿的讲话以后，我在学校里才第一次感到被人接受了。”

海丝取得美国小姐的称号也对我们的大家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我们共同分享她的快乐和经历时，感到相互间联系得更紧密了。

美国小姐梦的实现，为我打开了回忆的闸门，与众多的人们交流和分享我们的过去。就是写这本书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权——追溯、回忆，并且重新体验许多我早已长久忘却的快乐往事。

我提醒女儿们，她们必须留下她们孩子小时候事情的书面描述或日记，因为这些事很容易被遗忘。我曾经希望为我的三个女儿都这么做，但是我实际上却没做到。

只是由于海丝耳聋，才迫使我为她保存了这样详细的记录。有了这些记录，加上很多人愿意充满善意地与我分享他们所能回忆起来的往事，我才能再现这个故事。把它作为送给海丝的礼物，同时也是奉献给上帝的颂同。上帝曾经教导我们怎样去做，在他的帮助下，有志者事竟成！

我将永远把这句话铭记在心。

我知道，过去曾有多少次人们认为我异想天开。前几年，我为海丝买一台 CD 唱机时，从一位售货员那儿就得到过一个有代表性的反应。朋友们曾经告诉我，CD 唱片的音质远远超过录音带的声音。我希望海丝用 CD 唱片能够更好地听到和欣赏到音乐。当我逐一验看着陈列的几种不同型号的 CD 机时，售货员似乎一直很殷勤热切地回答着我提的所有问题，直到我说起是为耳聋的女儿购买圣诞节的礼物。

“你要为耳聋的女儿购买一台 CD 唱机？”

我迎着售货员脸上的怀疑目光，试着解释道：“她喜爱音乐。我想比起录音带来，她可能更欣赏 CD 唱片。”

“好……的。”这位女士回答道。但是，我知道她一定认为我是发疯了，可能在想是否该叫商店的保安人员。

她并不是这些年来唯一的一个对我的努力表示怀疑的人。许多专家、医生、学校行政人员，甚至某些家人和朋友都认为我对海丝的期望以及她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根本不切实际。

这些人不懂，我之所以能面对怀疑和障碍继续前进，是因为我早已看到了海丝的未来。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的远见，在过去这些年里，我所有的依靠就是上帝的指引。

在我们得知海丝耳聋以后的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当我不知所措、一筹莫展时，上帝与我同在，鼓励着我，引导我去丹佛的多琳·波拉克诊所。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耳聋的孩子竟然能够在有声世界里进行实实在在的交流。从那天起，我所期望的海丝的未来，便一直呈现在我的心中。

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遇到最大的挫折、心情最为沮丧时，我更能感到他的存在。他时时刻刻提醒我，为我描绘出海丝的将来，赋予我前进的决心。

今年，我曾无数次回忆起当年我对海丝的梦的设想。纵然我曾不断地对她说：“是的，你能行，海丝。有志者事竟成！”但是，已经实现的一切仍然让我难以置信。有时候我想掐一下自己，让自己确信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

紧接着，我从国内杂志的封面上见到自己女儿的脸庞，从收音机里听到她熟悉的声音，或是在电视联播上看到她在接受采访，我知道我们两个人的梦想都已经成为现实！

这就是她，我的海丝，1995年的美国小姐。

